

括苍史志

二〇一九年第一期

(总第二十四期)

(半年刊)

顾 问：胡伟华 卢 进

主 审：陶旭峰 郭晓波

主 编：吴祥宇

执行主编：叶剑平

编 辑：周 率 章 程 蓝 芳

刊名题字：毛传书

主 办：中共丽水市莲都区委办公室

丽水市莲都区史志办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括苍史志》编辑部

地址：丽水市莲都区解放街 51 号

邮编：323000

电话：0578-2028942

投稿邮箱：261119397@qq.com

准印证号：浙内准字第 K067 号

印刷日期：2019 年 6 月

印数：800 册

排版印刷：丽水明天出版印务有限公司

电话：0578-2263248

目录

专题策划

- 浙西南革命：中央红军长征的战略策应 余群勇 周德春 /4
山东南下干部入丽 钟春雷 /8
五四运动在丽水 周 率 /28

三亲回眸

- 丽水县自卫总队起义的回忆 胡允孚 /34
解放丽水的回忆 童国贵 /43
日本三岛市访问纪事 吴刚戟 /45
回忆在杭州西冷宾馆做警卫的日子 叶水法 /54
我所经历的丽水电影发展史 龚禹鑫 口述 周率 记录整理 /57
丽水中学迁建纪事 吴立南 /61

人物撷英

- 金逢孙先生二三事 蓝志龙 /70
红色律师黄景之 括 苍 /75
悠悠军营六十载 默默年华铸丹心 罗 豪 /82
一切为了村民 任迎春 /90

史海钩沉

政界和学界联手点燃了“五四”导火索 95

流年碎影

“处州”命名缘由再议 杜浣溪 /101
浙江抗战的金融奠基石 孙卫武 /106
浮生手记——流亡碧湖 骆憬甫 /114

括苍夜潭

孙多慈在丽水的尘影往事 叶剑平 /123
莲都乡村建房风俗 王永健 /127

莲城旧影

中苏蜜月期的花衬衫和“布拉吉” 丽 影

浙西南革命： 中央红军长征的战略策应

余群勇 周德春

1935年春，红军挺进师临危受命，肩负起抗日先遣队策应长征的艰巨使命，挺进浙西南，建立根据地，掀起革命高潮，有效吸引并长期牵制国民党大量兵力，直接减轻

了长征中红军主力的军事压力。浙西南革命为策应长征这一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历史转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先遣队北上掩护红军主力战略转移

1934年5月，由于“左”倾错误的影 响，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准备进行战略转移。为掩护中央及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6月下旬，中革军委令红七军团返回瑞金，改编为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行动。

中央为何令先遣队北上行动？时任先遣队参谋长的粟裕曾回忆道：“中央派出这支部队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

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朱德在1973年12月回答军事科学院提问时也证实了这一说法，“是（红军主力）准备退却（战略转移），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掩护）”。

1934年7月7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开始执行北上任务。先遣队浴血转战，横跨闽浙赣皖四省。其间一度转战到浙西南，占领庆元

县城,夺取竹口大捷,歼敌300余人,俘敌200余人,活捉国民党庆元县长,随后转战至龙泉县境内。在先遣队的艰难转战中,中央不断电令指挥先遣队夺取水口,攻打福州,提出先遣队不要在闽北苏区停留,全力破坏敌人后方交通,攻占遂安,

并以遂安为中心建立苏区,欲使先遣队的行动起到立竿见影的掩护作用。

10月17日,在先遣队的掩护下,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长征。

挺进师入浙策应红军主力长征

1934年11月,转战至闽浙赣苏区的先遣队,接到中革军委11月4日电令,要求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对外仍称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编为第十九师,“仍出动于浙皖赣边新苏区,担任打击‘追剿’的敌人与发展新苏区的任务”;红十军编为第二十师,“执行打击‘围剿’敌人与保卫苏区的任务”。由此,先遣队完成掩护任务后,中央又令其增加兵力,继续北上行动,执行发展新苏区、保卫老苏区任务以策应长征。

但是,由于先遣队兵力依然过小和“左”倾错误影响,1935年1月,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地区遭敌重兵包围进攻,指战员损失大部,方志敏等主要领导人被俘后牺牲,仅参

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先头部队突出重围,北上行动失败。

此时,长征中的红军主力处于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之中,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广大白区的工作均陷入困境,国民党军队继续以堡垒战分割东南各省苏区,对红军进行分进合击,闽浙赣苏区和红军游击队处于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进剿”之中,中国革命面临严重危机。

粟裕、刘英率部转移至闽浙赣苏区,随即接到闽浙赣省委传达的中央指示: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迅速组建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

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由此，挺进师临危受命，肩负起先遣队未尽的历史使命，从战略上策应红军主力长征。

中央指定挺进师的行动地域为浙江。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后院。在国民党倾力“围剿”红军主力时，在其“素称平安之区”的浙江燃起革命烈火，即可触痛其中枢神经，达到策应红军主力长征的目的。也正因为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所以浙江的革命斗争环境特别恶劣：浙江自1922年建立中共组织，至1927

年6月建立中共浙江省委，在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省委屡遭破坏、先后换了10任书记或代理书记，其中8位书记和15位委员以上领导人牺牲，迫使中央于1929年4月撤销浙江省委建制，以免继续遭受更多的损失。挺进师入浙前，党在浙江曾先后发动和领导了遍及50多个县的60余次武装斗争，但均遭镇压，全省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对于500余人的挺进师来说，在毫无依托的情况下，要进入浙江行动，无异于“垂饵虎口”。

1935年2月，挺进师从赣东北出发，踏上挺进浙江的征程。

掀起浙西南革命高潮

1935年4月，历经艰难转战的挺进师，在庆元县斋郎地区以500之众迎击3000余敌，取得大捷，从而打开进入浙西南的通道。挺进师乘胜迅速挺进浙西南腹地，在松阳县境受到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等领导的当地进步群众组织欢迎，获得了群众依托，使挺进师如鱼得水，获得发展。接着，挺进师“集中以打击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和群众工作，在浙

西南实行武装割据，创建革命根据地。

挺进师的武装斗争，砸碎了浙西南人民脖子上的枷锁，人民纷纷投身革命，踊跃参加革命组织，恰如时任挺进师师长的粟裕所回忆：

“红军所到之处，都有大批群众簇拥着，复仇的呐喊声、胜利的欢呼声山鸣谷应，日夜不绝。”在浙西南人民的支持下，挺进师迅速燃起浙西南革命烈火，在全国革命形势

转入低潮之时掀起了浙西南革命高潮。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地方游击队以及农民协会、互救会、妇女会、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各地党组织、苏维埃政府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到处是分田分地的繁忙热烈场面，挺进师发展到 1000 余人，扩编为 5 个纵队。

浙西南燃起熊熊革命烈火，深深触痛了国民党当局的中枢神经。国民党浙江省当局的喉舌《东南日报》惊呼道：“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浙，以目下形势而论，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前途实堪可虑！”面对后院起火、红色堡垒筑到家门口、地方武装对付不了挺进师的境况，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抽调中央军入浙，调集以第十八军为主力约 7 万兵力“清剿”浙西南。罗卓英任军长的第十八军，下辖 4 个师，装备精良，人员充实，训练有素，战斗力强，控制和欺骗民众的手段极其狡诈；其师、团长黄维、霍揆彰等后来成为国民党军中的名将；第十八军又是长期在江西“剿共”的老手。可见，为了对付挺进师，国

民党当局可谓下了血本。

9 月中旬，面对数十倍的强敌进攻，挺进师采取“敌进我进”方针，留下第二、第五纵队在根据地内坚持斗争，主力迅速跳出敌人包围圈，挺进敌后吸引、调动敌人，并伺机开辟新的根据地。9 月 25 日，挺进师主力突破敌人封锁线，进入浙闽边境活动。但国民党军主力不为所动，除派出约 5 个团的兵力追堵挺进师主力外，仍将几十个团的大部队死死围住浙西南。

国民党军的“清剿”，自 1935 年 9 月 19 日发动进攻，至 1936 年 6 月两广事变爆发才结束。在长达 8 个月的反“清剿”斗争中，挺进师以少量兵力抗击了国民党军大部队的进攻，不仅歼灭了敌人的部分有生力量，而且牵制了敌人几十个团的兵力，掩护了挺进师主力南下浙闽边开辟新的游击区，打破了国民党妄图于 11 月 20 日前将挺进师“肃清”的计划。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有效吸引、调动了“围剿”的国民党军队，减轻了红军主力长征的军事压力，实现了挺进师战略策应红军主力长征的目标。

山东南下干部入丽

钟春雷

1948年10月，中共中央根据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作出抽调干部南下接管新解放区的战略决策。华东局于1948年12月召开各战略区党委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把中央分配给华东局的1.5万名南下干部的任务全部交给山东解放区。渤海战略区积极响应中央和华东局指示，各地委、县委、区委层层发动，动员各级各类干部报名南下。在报名、政审、批准和统一编队基础上，南下干部于1949年2月参加华东局党校统一组织的短期培训，于3月24日出发南下。经过4月21日渡江战役，5月上旬，8000多名南下干部进入浙江境内。当时温州、丽水、衢州各地已经解放，5月19日晚，由山东德州地区抽调组成的山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三支队第一大队全体人员由省委安排到达衢州，开

始接管衢州专区，其中由庆云县（时属河北省）抽调组成的第一大队第七中队的101人于5月27日到达遂昌县（时属衢州专区）。

7月中旬，经省委安排，第四大队干部一分为二，一部分留温州，另一部分到丽水。在四大队党委书记、政委彭瑞林，党委委员、宣传部长刁筠寿，副大队长傅光汉带领下，四大队二、四、五、八中队全体人员及九中队（直属中队）的40多人，共528人（含后勤人员）被安排到丽水专区工作。加上当时属于温州专区的青田县南下干部36人和属于衢州专区的遂昌县南下干部101人（6月调回衢州14人），以及当年先接管上海、再于9月到达丽水的山东渤海战略区清河专区（后并入淄博专区）派出的三支队三大队南下干部和济南华东大学学

员等 45 人，减去原宣平县已划归武义县区域南下干部 54 人和 6 月遂昌调回衢州的 14 人，在今天丽水市范围内，有当年南下干部 642 人（含后勤人员）。

一、精心组织，挥师南下

渤海战略区位于今山东省西北部，区域大多在今山东省境内，也包括今河南省、天津市部分范围。为了摸索经验，渤海区党委于 1948 年 11 月开始在一地委（今德州市）抽调南下干部，组成渤海三支队第一大队，集中阳信县何家坊（渤海区党委所在地）进行整训，之后南下益都进华东党校学习。被抽调的庆云县（当时属河北省）南下干部编入渤海三支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1949 年 2 月，渤海区党委就抽调南下干部向所属的四个地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高度重视，做好这一工作。当时的四地委（即惠民地区，现山东省滨州市、东营市）南跨黄河下游，辖惠民、阳信、无棣、沾化、滨县、蒲台、利津、垦利等 8 县，均系老解放区。在组织南下干部宣传发动过程中，地委和所属各县县委都分别召开各级干部大会，进行动员，自愿报名，要求各县都要分别准备好留任和南下

两套班子，同时要求在解放战争中因部队北撤在山东解放区工作的干部原则上都要南下，南下的干部一律不准带家属。这些干部包括党务、政府、军事、民运、经济、财政、银行、贸易、机要、通讯、新闻、教育等各个方面。按照各县实际情况双标准条件，落实抽调南下干部任务。

四地委所属县、区、乡干部和青年学生热情高涨，争相报名，为了解放和建设新中国，他们甘愿舍小家，为大家。当时，华东局、渤海区和四地委机关，分别驻阳信县的商家店、何家坊和河流店三区，党政军机关干部多，还有随华东局北上的华东工作团千余人，加上阳信县的县、区、乡三级干部，报名人数很多。渤海区党委和四地委把阳信县作为南下干部宣传发动基点县，以点带面。随后，地区机关和沾化、滨县、垦利等县干部纷纷报名。经组织审查批准，各县张榜公布南下干部名单。阳信县、惠民县被批准的干部大大超过一个中队的编制，只好将部分小队编入其余的中队；沾化县的赵文祥、房树杰等家庭独子原已报名，但未被批准，又纷纷找到组织恳求南下，第二次得到批准。他们中被选定南下的同

志，多数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县、区骨干成员；大多数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最小的不到20岁，年长的彭瑞林当时也不过37岁。

被批准的南下干部集中于渤海区党委所在地何家坊，进行统一编队。中共中央华东局成立了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区从区级党政军各领导班子中选配5位领导干部组成南下区党委（即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三支队党委）班子，由渤海战略区党委副书记刘格平任第三支队党委书记兼政委，军区副政委周贯五任支队长。四地委抽调的干部组建了第三支队第四大队。第四大队由渤海区党委委员、四地委书记彭瑞林担任党委书记兼政委，渤海区第四专署副专员李铁锋任党委委员、大队长，阳信县委书记王文长任党委副书记兼副政委，渤海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杨信任党委委员、军分区司令员，高青县委书记王耕野任党委委员、组织部长，蒲台县委书记刁筠寿任党委委员、宣传部长，蒲台县县长傅光汉任副大队长。四地委所属8个县的南下干部各编一个中队，中队领导由有关县区级领导干部组成。各中队根据具体情况下设若干小队和服务性

班、组，其中：阳信县南下干部被编为二中队，沾化县南下干部被编为四中队，惠民县5个区、阳信县3个区和滨县县级机关抽调的南下干部被编为五中队，蒲台县南下干部和阳信县一小队被编为六中队，垦利县南下干部被编为八中队，地区机关的南下干部编为第九中队（直属中队），军分区的南下干部、战士与直属中队协同行动。

1949年2月25日，第四大队1200名干部踏上南下的征程，从阳信县到济南市399里平川大道，徒步行军，一路晓行夜宿，经数天到达济南北郊泺口附近的鹊山火车站，稍息数日后，乘敞篷货车、闷罐车途经泰安、兖州等城市，翌日清晨抵达微山湖畔的沙沟火车站。华东局党校就设在附近的村庄里。渤海区第一大队1000名干部也随华东局机关南迁来到这里学习。党校学习的宗旨是：围绕如何接管城市主题，提高南下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 and 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性和自觉性，明确干部南下的任务、目的与要求。学习结业后，穿上人民解放军军装，挥师南下。

当时百万解放军大军已集结在长江沿岸，加紧渡江准备。3月24日，为了配合大军渡江作战，渤海区第

四大队提前结束学习，赶赴长江前线随军渡江筹粮，其余大队随后随军南下。下午4时许，四大队集合于长沙沟火车站，乘火车顺津浦线向南开拔，夜半到达江苏徐州。25日下午乘火车继续南下，至28日进入安徽蚌埠。3月31日，四大队转由淮南铁路继续南进，次日拂晓到达合肥。队伍在合肥住了3天，经四大队党委与华东局前线指挥部联系，由华东局与总前委有关部门决定，四大队跟随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第二十七军和二十五军过江。从合肥去长江前线300余里，全靠步行，日行程80里。4月9日，四大队顺利抵达巢县城关宿营。接着，四大队正式编入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所属第二十七军和二十五军。各中队编入军下面的师，小队分配到师所属的团、营和连队，大队部暂跟兵团司令部行动。4月11日，大队由部队同志带队出发，进驻运漕以北的村庄中，进行战前准备：一是学习政策，学习《约法八章》《中央关于新解放区筹粮工作的政策》等；二是精简行装，三是每人必须自带6市斤炒熟的大米，以备渡江行军、作战吃不上饭时临时充饥。4月19日凌晨，四大队各中队、小队分别离开原来的建制，到达沿

江驻地的各自岗位和部队一起临江待命。由于前方就是战场，而长期步行给各中队随军的女同志（尤其是怀孕的女同志）、体弱有病的男同志带来体力上的困难，大队部决定女同志及体弱有病的男同志共30余人暂编一个小队，由七中队兼管，刘波负责，暂留安徽蚌埠，以便于照顾，待大军过江后再过江。

4月20日，国共谈判已告破裂。当日下午7时，九兵团第二十七和第二十五两军各梯队开始向江边运动，四大队1200余名随军干部紧跟其所属梯队进入阵地。夜幕降临，晚8时许，根据中共中央向江南进军的命令，部队开始抢渡长江。随军干部紧随部队同舟前进。21日凌晨，守敌的前沿阵地已全线崩溃，九兵团两军主力迅速涌上南岸，乘胜追击。天亮，第二十七军先头部队已进至繁昌，第二十五军很快攻下三山。四大队的全体干部与解放大军一起，一路上吃炒米步行行军。在渡江战役中，四大队有10多人先后光荣负伤。

过江后，部队所处的都是新解放区，粮食供应不可能再从大后方调运，只能就地解决。筹粮，就成为随军干部的首要任务。筹粮工作，必须乘部队休息、宿营或停下来围

歼敌人的时候，抓住时机外出筹粮，或边行军边筹粮，确保部队军需供应，随军干部日夜兼程的奔渡筹粮，保证了野战部队的粮草供应。

5月3日，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进入杭州，这是，四大队部分分散在三野部队各师的中队都收到华东局电令四大队归还建制的通知，于是各中队相继告别了所在部队，开赴杭州集中，筹粮工作即告结束。5月上旬，第四大队恢复了原来建制。由于从安徽蚌埠开始至浙江湖州吴兴县都是步行行军，四大队南下干部十分疲倦，经与浙江省军管会联系，省军管会安排4辆汽车把四大队南下干部接到杭州，安排在杭州城北卖鱼桥、拱宸桥一带休整。与此同时，由庆云县南下干部组成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三支队第一大队第六中队全体人员也和四大队人员有过相近的南下经历，并于5月初进入浙江境内。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三支队第四大队的南下干部抵杭后，中共浙江省委决定，大队党委副书记王文长即留省政府工作，司令员杨信率原军分区机关工作人员到绍兴组建军分区。除此之外，第四大队全部分配到温州工作。5月中旬，第四大队干部乘火车去金华，刘波率领

的暂留安徽蚌埠的30多人也抵达杭州归队，分别回到各自中队，一同到达金华。此后，从金华开始一路步行，经永康、缙云、丽水、青田去温州。行军途中，发生一件趣事：在经过金华婺江小木桥时，一条20多斤的大鱼跳到木桥板上，第二中队的同志喜出望外，齐心协力，马上抓到了这条大鱼，大伙一起抬着大鱼步行到永康县城，吃了一餐美味的大鱼餐。从永康出发经丽水到达青田温溪后，再转乘小船顺瓯江而下，四大队全体干部抵达温州，开始边学习、边等待分配工作。

7月中旬，省委根据温州、丽水专区的实际，决定由李铁锋、王耕野率第一、三、六、七4个中队及九中队（大队部）20余人留温州专区分配工作；彭瑞林带第二、四、五、八4个中队及九中队40余人到丽水专区分配工作。浙南特委书记龙跃陪同彭瑞林一行从温州乘船逆瓯江而上到青田温溪告别。随后，彭瑞林带领的队伍健步进入青田县城，第二天顺利到达丽水县城。

山东庆云县南下干部组成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三支队第一大队第七中队（原为第三中队）人员由衢州专区分配，已于5月27日先期到遂昌县工作。

二、南北干部会师，建立新政权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解放南京后，转战皖、苏、浙，追击国民党溃败之军。5月1日，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第十一、十二军和第五兵团第十六军分路进入浙江，在浙西南地下党组织和革命武装组织的配合下，在不到10天时间里，就解放了浙西南全境。5月8日，遂昌县城首先解放。5月9日至20日间，处属八县和温州专区的青田县县城全境解放。随着丽水县城5月10日的解放，浙西南地区党的领导机关——中共处属特委，于5月14日抵达丽水城关镇，中旬建立了政权组织——处属专员公署，特委、专署的办公地点在城区孔庙。由处属特委书记、浙南人民解放军第三支队政委傅振军任专员，处属特委委员、浙南人民解放军第三支队队长宣恩金为副专员。从此，浙西南地区人民政权的雏形已经形成。各县人民政府在此时也相继宣告成立。

由于丽水是山区，行政区域大，解放后百废待兴。新的考验摆在处属特委和各县委的领导面前，其中最缺的就是干部，需要相当数量的干部，充实到各级党、政、军领导

班子中去，从事政治、军事、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工作。6月，省委决定任命浙南特委委员、组织部长、浙南游击纵队副司令员兼温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郑丹甫为特（地）委书记（因故未到任），傅振军改为副书记，并从浙南特委（温州）派出一部分干部来到丽水工作。地委一方面请求省委安排一定数量干部来丽水工作，另一方面办好短期青训班，招收进步青年通过短期学习到各县工作。南下干部的到达，为补充、健全专区、县、区各级党、政、军领导班子提供了大量的干部资源。

同年6月，经衢州地委任命，组建成立了新的中共遂昌县委，原一大队第七中队政委崔玫光任县委副书记，中队长张芳春为县委委员、副县长。温州专区的青田县，由于南北干部会合较早，四大队第六中队中队长田云涛5月担任县委执行委员、10月担任青田县长。

7月中旬，彭瑞林、刁筠寿、傅光汉带领的528名南下干部（含山东当地招收的后勤人员）抵达丽水，与中共处属特委领导傅振军、宣恩金等胜利会师。7月15日，彭瑞林从杭州开会返回丽水后，在丽水县城天妃宫召开了誓师大会，宣

布了5个中队的工作去向。除彭瑞林等大队部的领导留在地委、专署机关外，第二、四、五、八中队和第九中队（大队部）的分配去向如下：

第二中队125人，由中队政委杨景云带领40多人到松阳县工作，中队长宋江萍带另一部分人员到丽水地委机关工作，副中队长白华带少数人员到云和县工作，另有少数人在丽水县工作；第四中队124人，由政委许铁夫带大部分人员分配在丽水县工作，中队长江巩带少部分人员在丽水地区公安处工作；第五中队108人，由政委晨光带领62人到宣平县工作，中队长李宏带另一部分人员到云和县工作，副中队长孔鲁留地委宣传部工作；第八中队117人，由政委崔振华带领56人到缙云县工作，中队长王子欣带57人到龙泉县工作；第九中队（大队部），即地、专机关干部，除留在温州20余人外，40多人留在专署机关工作。当时庆元、景宁两县没有分配南下干部。8月，因庆元、景宁两县剿匪等任务较重，地委决定派九中队政治教导员田烈带3人到庆元县工作，10月，地委派丽水县委委员、宣传部长、原四中队宣传部长张万祥夫妇、二中队李维隆夫妇等4人

去景宁县工作。与此同时，应浙江省委请求，中央华东局决定从上海派出筹建华东革大的200名南下干部到浙江省工作，其中有45人被安排到丽水专区，第七（丽水）地委决定把他们充实到景宁、庆元、云和3县。留在温州专区的第四大队六中队的南下干部，由中队长田云涛带领36人分配到青田县工作。

7月22日，省委决定，处属特委改为浙江省第七地方委员会，彭瑞林被任命为七地委代书记，傅振军为副书记，宣恩金为丽水专员公署专员，刁筠寿为地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傅光汉为专员公署副专员。在地委机关，南下干部分别在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和工青妇等机关工作；在专署机关，南下干部分别在秘书室、人事、民政、财政、粮食等重要部门工作，并在银行、邮政、电信、贸易、医院、学校等部门派出指导员和骨干。

第四大队各中队南下干部分配到丽水专区各县后，也于同年7月成立新的县委、县政府，其领导班子成员由南下干部和本地干部组成。四大队第四中队政委许铁夫任中共丽水县委书记，四中队党委委员、组织部长刘冠军任县长，四中队副中队长柳林任副县长；四大队

第八中队政委崔振华任中共缙云县委书记；四大队第二中队政委杨景云任中共松阳县委书记；四大队第五中队政委晨光任中共宣平县委书记；四大队第八中队中队长王子欣任中共龙泉县委副书记；四大队第五中队中队长李宏任中共云和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同年8月，建立中共庆元县委，四大队第九中队党支部书记兼教导员田烈任中共庆元县委副书记（主持工作）、县长。当时，景宁县没有南下干部，县委领导班子仍由本地干部组成。至10月份，南下干部张万祥到景宁任中共景宁县委副书记。南下各中队的组织、宣传、民运部长、秘书，一般在各县担任组织、宣传、民运三部和秘书处的领导职务。各小队的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小队长和组织、宣传、妇女、青年等干部在各县下属的区委、区政府和县委、县政府所属部门、单位担任相应领导职务。

在浙南人民游击总队第三支队（原浙江壮丁抗暴自救军第三总队，即地委武工队）基础上，浙江省军区第七军分区建立，受浙江省军区和七地委（丽水地委）的双重领导，下辖1个警备团和丽水、缙云、龙泉、云和、庆元、松阳、景宁、宣

平8个县大队和29个区中队。第七军分区由傅振军兼任司令员，彭瑞林兼任政委，南下干部黄益元、熊飞、杨秀幸分别担任副政委、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同时，浙南人民游击总队第三支队第二大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丽水县大队，刘冠军兼大队长，许铁夫任政委。1949年7月至8月，各县都在县区武工队的基础上建立县大队，除遂昌、青田县设专职大队长、政委或由当地干部兼任外，担任县委书记、县长的南下干部分别在其中担任大队政委、大队长；担任各县下属的区委书记、区长的南下干部分别在其中担任区中队指导员、中队长，还派出一些南下干部担任县大队、区中队其他领导职务或者骨干。至此，解放初丽水地区各级党、政、军领导机构的组建已告完成。

三、南北干部紧密协作，做好解放初期丽水的各项工作

1949年5月，刚刚解放的丽水山区很不太平。水南的俞崇书部、丽东与缙云县交界处的蔡洪登部、碧湖郑献南部、赵万宗部等土匪包围着丽水县城，他们经常趁夜晚之机，伺机进城制造枪杀、爆炸、杀人、抢夺的事件。为了保卫地委、专署

机关驻地孔庙的安全，除地委警卫队（武工队）外，还从温州调来一个武装排驻守梅山背，负责地委、专署机关和领导干部进出的保卫工作，应对突发事件。为接管旧政权，建立新秩序，地委、丽水专区各县县委和遂昌、青田两县县委认真落实省委统一部署的剿匪、反霸、生产、征粮、减租、发动和组织群众“六大任务”。在重点开展剿匪的同时，发动广大群众开展减租反霸斗争，进行征缴公粮和生产度荒工作。

当时的丽水山区有武装土匪 40 余股，匪徒 8000 余人，集结于偏远山区的县与县交界地区。他们中有潜伏下来的一批国民党残余势力、当地的恶霸、流氓地痞和一些仇恨新政权的其他势力。他们相互勾结，遥相呼应，成为一股与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长期作对的势力，并伺机反扑。其中势力最大的是陈迪化部。陈迪化（原名陈培章）在浙江解放前夕在宁波接受浙东义勇总队司令、国民党国防部少将陈庆尚委任，担任“国防部青年反共救国军浙东义勇总队十一支队支队长”，后来到丽水，搜罗国民党军队李延年在丽水的残余势力，发展成员 1200 多人，在宣平畎岸进行整编，其活动区域分布于丽水、青田、缙云、宣平、

松阳等县山区；还有活动于浙闽山区的陈启新部、遂昌与江山交界的王中道部、与温州有关联的青田土匪、海匪等，其中王中道部与江山县国民党骨干人员勾结，成立“中国青年救国党”和“中国青年救国军”遂昌县机构，收集社会反共人士和蒙蔽群众 1000 多人。自解放初至 1950 年 8 月，丽水全区遭武装土匪行动队袭击、伏击、围攻、烧杀等 27 次，先后遭土匪杀害的干部、群众 300 余人，杀害地方武装人员 35 人。尽早彻底、干净地消灭丽水山区的土匪，是当时第七（丽水）地委、专署、军分区和公安机关以及各县县委、政府的首要任务。

1949 年下半年，第七（丽水）军分区、各县大队和全区公安机关紧密配合，山东南下干部积极参与，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大股匪特。7 月，通过公安机关周密布局，抓获并处死了陈迪化部的行动队长陈智中，丽水县城的恐怖活动有所减少。11 月，通过黄弄战斗，击毙、俘虏和打散土匪 300 多人，抓获了前来丽水“视察工作”的“浙东义勇总队司令陈庆尚，剿匪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至 11 月底，全区先后自新的土匪共计 1020 人。从 1950 年开始，在地委统一领导下。丽水军分区各

独立营和全区公安机关进行分散驻剿，重点消灭分散各地的小股武装股匪。陈迪化等一批匪首先后被抓获。至4月，有400多名土匪向我公安机关和区乡组织自首，缴械投降。

从1951年开始，在地委领导下，开始跟踪追剿、肃清残匪。在这期间，发生了丽水县碧湖高溪、遂昌县湖山姚岭等激烈的战斗，丽水县大队碧湖区中队中队长刘祥岭等南下干部在残酷的剿匪斗争中牺牲。至1952年6月，全区武装土匪基本肃清，共歼灭武装土匪7979人（内含击毙704人、俘虏3019人，自首投降4256人）。

在这期间，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一起，组织群众，开展反霸斗争，惩处了一批长期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恶霸地主和反动官员、绅

士；积极组织农业生产，开展减租减息、反“黑田”运动，使原丽水专区内的良田面积从原来的90多万亩增加到130多万亩，从而保证了群众对征粮的积极性。丽水专区从1949年11月到1950年2月间，完成征粮4061.32万斤，从1950年开始，由于开展土地改革，对省下达5500万斤任务有了较好的完成。遂昌县在1949至1951的三年征粮中，入仓粮食分别达到1490.86万斤、1140.87万斤和1318.2万斤，占衢州专区下达该县任务数的98.7%、97.1%和98.7%。征粮支前工作的开展，有力地支援了大军对西南、南部各省等地的解放。与此同时，公安机关开展清除丽水境内的反动会道门和邪教组织，开展禁毒、禁赌和禁娼活动，净化了丽水风气，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丽水建立做出了贡献。

附：

山东南下干部入浙名录

(丽水地委、专署、丽水县)

	姓名	性别	籍贯	南下前所事工作或职务	南下后工作单位或职务
丽水地委、 专署	彭瑞林	男	山东益都	渤海区党委委员、四地委书记	地委代书记、军分区政委
	刁筠寿	男	安徽含山	山东蒲台县委书记	地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
	傅光汉	男	山东临淄	山东蒲台县县长	专署副专员
	宋江萍	男	江苏邳睢	山东阳信县党委委员、粉刘区区委书记	地委秘书处主任秘书
	伏庆祥	男	江苏睢宁	华东支前委员会第三兵站宣传股长	地委秘书处秘书科长
	马汝明	男	山东利津		地委秘书处秘书科文印股长
	马振恒(马川)	男		山东阳信县城关区文书	地委秘书处秘书科文印股文印员
	马玉庆	男	山东阳信	山东阳信县水落坡区青救会主任	地委秘书处秘书科交通股机要员
	王哲夫	男	江苏邳县	山阳信县老朋友关区边家乡乡长	地委秘书处秘书科交通股股长
	姜宝华	男	山东阳信	山东阳信县温店区税务组税务员	地委秘书处秘书科交通股收发员
	武道顺	男	江苏		地委秘书处秘书科交通股武装班班长
	李绍南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二区(黄昇区)区委干部	地委秘书处行政科副科长
	朱廉	男	安徽泗洪	山东阳信县粉刘区委组织科科长	地委秘书处行政科科长
	孙士章	男	江苏宿迁	山东阳信县土改队队长	地委秘书处行政科总务股股长
	苏振杰	男	山东阳信	山东沾化县粮食局会计	地委秘书处行政科总务股股会计
	曲文亭	男	山东阳信	山东阳信县温店区文书	地委秘书处行政科总务股股会计
	高之钰	男	山东无棣	山东渤海区四专署(惠民专区)财政科财政行政干事	地委秘书处行政科总务股副股长
	王文杰	男	江苏邳睢	山东阳信县职工会主任	地委秘书处行政科招待所所长

	姓名	性别	籍贯	南下前所事工作或职务	南下后工作单位或职务
丽水地委、专署	劳家训	男	山东阳信	山东阳信县城关区北辛乡副指导员	地委秘书处行政科招待所指导员
	马中全 (马好政)	男	山东阳信	山东淮海战役支前担架营文书	地委秘书处行政科招待所文书
	吴耀东	男	江苏泗洪	山东阳信县温店区区委书记	地委组织部干部科长
	张少杰 (张绍介)	男	江苏邳睢	山东阳信县粉刘区粉刘乡党支书	地委组织部干事
	刘凯	男	江苏邳睢	山东阳信县水落坡区宣传科长	地委组织部干事
	苑杰 (苑书荣)	男	山东阳信	山东阳信县温店区民政助理	地委组织部干事
	孔鲁	男	江苏泗洪	山东阳信县城关区区委书记	地委宣传部宣传科长
	王浩	男	江苏泗洪	山东渤海区四地委宣传部干事	地委宣传部干事
	陈洪	女	浙江余杭	山东阳信县河流区曹家乡乡长	地委宣传部干事
	翟福山	男	山东阳信	山东阳信县城关区民政助理	地委宣传部干事
	韩雪萍	男			地委青年委员会干部
	孙杰	女	上海	山东阳信县粉刘区组织干事	地委青训班工作人员
	余萍	女	安徽铜陵		工农大众报社采通股长
	王宝轩	男	江苏泗洪	山东阳信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专区工会办事处副主任
	孙长荣	男	山东	山东渤海区四地委警卫队彭瑞林警卫员	地委警卫队(武工队)指导员、彭瑞林警卫员
	徐德海	男	山东招远	山东渤海区四专署警卫班(阳信县公安局派出)	地委警卫队(武工队)一班班长
	蒋某	男	山东	山东渤海区四专署警卫班	地委警卫队(武工队)二班班长
	薛宝顺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政府通讯员	地委警卫队(武工队)警卫
	刘春剑	男	山东	山东渤海区四地委彭瑞林警卫员	地委警卫队彭瑞林警卫员
	郭友梅	男	山东蒲台	山东渤海区四地委通讯班通讯员	地委警卫队刁筠寿警卫员
田福江	男	山东蒲台	山东蒲台委警卫班傅光汉警卫员	地委警卫队傅光汉警卫员	
刘洪泽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乡干部	地委警卫队(武工队)警卫	
郭孝贤	男	山东	山东渤海区四地委战马饲养员兼彭瑞林警卫员	地委武工队司务长	

	姓名	性别	籍贯	南下前所事工作或职务	南下后工作单位或职务
丽水地委、专署	陈宝德	男	山东	山东阳信县公安局公安队队员、王宝轩通讯员	地委警卫队（武工队）警卫
	韩振昌	男	山东	山东渤海四专署警卫班	地委警卫队（武工队）警卫
	戚德平	男	江苏	山东阳信县委警卫班警卫	地委警卫队（武工队）警卫
	张广美	男	山东	山东阳信县温店区孙家乡乡长	地委武工队队员（剿匪）
	吴胜义	男	山东博兴	山东渤海行署医院干部科科员	专署秘书、财粮处长
	李正贵 (李剑英)	男	山东平原	山东渤海区第四（惠民专区）专署文书	专署秘书处文印员
	吴兆华	男	山东蒲台		专署会计室会计
	董华太	男	山东利津		专署文书室档案员
	荣溪君	女	山东宁津	山东渤海区四专署文教科科员	专署文书室收发员
	吴佩之	男	安徽明光	山东阳信县粉刘区宣传科长	专署民政科民政股长
	于平安	男	山东惠民		专署人事科干部股长
	曲九道	男	山东莱西		专署人事科干部股副股长
	焦月如	男	山东广饶		专署民政科副科长
	延志远	女	山东广饶		专署民政科民政股长
	商德照	男	山东沾化		专署民政科干事
	李长秀	男	山东广饶	山东阳信县粮食局副局长	专署财政科科长
	郭丽华	男	山东惠民		专署财政科会计股会计
	解龙照	男	山东商河		专署财政科会审股审计员
	钱锷	男	山东江都		专署财政科会审股会计
	张广仁	男	山东沾化		专署财政科保管股副股长
张春照	男	山东蒲台		专署财政科保管股会计	
刚建华	女	山东藤县		专署财政科保管股会计	
王建民	女	山东		专署财政科保管股会计	
朱元珠	男	江苏邳睢		专署财政科税收股股长	

	姓名	性别	籍贯	南下前所事工作或职务	南下后工作单位或职务
丽水地委、专署	徐 忱	男	山东乐陵		专署财政科税收股副股长
	孙政光	男	山东无棣	山东无棣县海枫区委文书、渤海区四专署财粮科干部	专署财政科会计股会计
	王汝怀 (藩)	男	江苏淮阴	山东渤海区四专署财粮科干部	专署财政科会计股副股长
	刘 希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渤海区四专署财粮科会计	专署财粮科会计股股长
	段村夫	男	山东寿光		专署粮食局副局长
	谢景武	男	山东滨县		专署粮食局粮征干部
	赵吉云	男	山东		专署粮食局储运干部
	戴清河	男	山东乐陵		专署粮食局储运负责人
	隋立楷	男	山东广饶	山东渤海区四专署财政科税务股会计	专署粮食局会计
	高玉坤	男	山东无棣		专署粮食局秘书
	孙守仁	男	山东莱芜		专署粮食局干部
	朱振华	男	江苏睢宁	山东阳信县劳店区区长	专署文教工作负责人
	江 巩	男	安徽合肥	山东阳信县县委委员、公安局局长	专署公安局副局长(主持工作)
	柳 林	男	安徽天长	山东沾化县公安局局长	专署公安局副局长
	慎伟生	男	浙江诸暨		署公安局秘书科长
	赵荣和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一区区委书记	专署公安局保卫科长
	王春祥	男	山东沾化	沾东沾化县三区(永丰区)干部	专署公安局一科副科长
	王玉林	男	山东阳信	山东阳信县商店区道王乡支书	专署公安局一科民警
	傅凤龙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委通讯班警卫员	专署公安局副局长警卫员
	傅凤田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委通讯班警卫员	专署公安局民警
冯学圣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四区(泊头区)通讯员	专署公安局民警	
郭思彦 (郭俊卿)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公安局政工队班长	专署公安局公安队民警	
霍安居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委通讯班警卫员	专署公安局公安队民警	

	姓名	性别	籍贯	南下前所事工作或职务	南下后工作单位或职务
丽水地委、专署	崔云溪	男	山东利津	山东沾化县七区（新千户区）区委负责人	专署公安局城区分局局长兼丽水县公安局副局长、城区区委副书记
	李协三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七区（新千户区）干部	专署公安局城区分局社会股股长
	房树杰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五区（富国区）文书	专署公安局城区分局交通股股长
	姚登仑	男			专署公安局城区分局二股股长
	刘敬凯	男	山东阳信	山东阳信县曹集区粮库工作人员	专署公安局城区分局交通股股长
	朱树德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五区（富国区）区委组织科副科长	专署公安局城区分局户籍股股长
	杨绍仙（杨绍先）	男	山东阳信	山东省阳信县曹集区公安分局办事员	专署公安局城区分局办事员
	刘本舜	男	山东阳信		专署公安局城区分局办事员
	张维钧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委炊事司务班负责人	专署犯人改造院所长
	李 勇	男	山东淄博	渤海区专属实业科科员	专署贸易公司负责人
	田有典	男	山东惠民	山东阳信县洋湖区民政助理	专署贸易公司管理员
	孙洪明	男	山东阳信		专署贸易公司人事干部
	蔡全书	男	山东乳山	华东工商干校学员	专属贸易公司出纳员
	魏广学	男	山东乐陵		专署贸易公司员工
	刘先泽	男	山东无棣		专署贸易公司员工
	刘子福	男	山东利津		专署贸易公司员工
	侯殷义	男	河北清丰		专署贸易公司员工
	祁中元	男	安徽盱眙		专署贸易公司员工
	王 钟	男	山东阳信		专署机关卫生所所长
	崔秀亭（崔如岭）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公安局卫生员	专署机关卫生员
	姜桂蓉	女	山东阳信	八路军驻山东阳信野战医院医护人员	地委工作队（驻丽水县城区）队员
贾秉清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四区（泊头区）代文书、区委组统干部	丽水地委干训班代理秘书、地委工作队（驻龙泉）队员	
段永成	男	安徽泗洪	山东阳信县温店区民运科长	地委工作队（驻龙泉县）队员	

	姓名	性别	籍贯	南下前所事工作或职务	南下后工作单位或职务
丽水地委、专著	张世平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四区（泊头区）武装部干事、公安员	地委农会办事处组织干事
	秘天堂	男	山东阳信	山东阳信县洋湖区弄救会主任	地委工作队（驻丽水县）队员
	董维德	男	江苏铜山	山东阳信县城区粮库收发员	地委工作队队员
	叶文忠	男	山东阳信		地委工作队队员
	杨学礼	男	山东阳信	山东阳信县委宣传部干事	地委工作队队员
	邳景林	男	山东无棣	山东阳信县劳店区某乡民兵队长	地委工作队队员
	杨秀章	男	山东宁津	山东渤海区第四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	丽水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韩岐山	男	山东	山东渤海区四区军分区首 长警卫员	丽水军分区首长警卫员
	纪有伦	男	山东济南	济南华东军政大学学员	丽水军分区文工团干部
	唐守元	男	江苏泗洪	山东阳信县委民兵（武装）干事	省工会丽水办事处办事员
	郭玉梓	男	山东博兴		人民银行丽水支行副行长
	王明东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委组织部干部	处州医院党支部书记、指导员
	王文斗	男	山东蒲台	山东垦利县卫生院中医学徒	处州医院药剂员
丽水县 ^①	许铁夫	男	河北藁城	山东沾化县委副书记、组织部	县委书记、县大队政委
	刘冠军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文教科科长	县委委员、县长兼组织部长、县大队长
	徐立祥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委组织部干事	县委组织部组织、统计干事
	傅秀英（傅恒）	女	山东无棣	山东无棣县委工作队队员、车镇区妇救会主任	县委组织部干部干事
	张维森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三区（永丰区）区公所统计干事、文书	县委宣传部干事
	马洪英	女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委民运部妇女干事	县委民运部妇女干事
	仲侠	女	江苏睢宁	山东阳信县城关区妇救会副主任	县委民运部妇女干事
	李新德	男	江苏泗睢	山东阳信县某乡长、乡支书	县委民运部工会干事

①解放初期，丽水县属丽水专区。1986年，国务院批准撤丽水县置丽水市，仍属丽水地区。2000年，国务院批准撤消县级丽水市，设立莲都区，以原县级丽水市的行政区域为莲都区的行政区域。

	姓名	性别	籍贯	南下前所事工作或职务	南下后工作单位或职务
丽水县	贾荣彬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四区（泊头区）干部	县委宣传部干事
	李盛峰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县政府会计	县委会会计
	路永琰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三区民政助理	县委秘书
	周玉发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三区（永丰区）干部	县委工作队
	王长发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委警卫队警卫员	县委警卫队刘冠军警卫员
	杨桂芳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委警卫队班长	县委警卫队（武工队）队员
	吕宝峰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政府司法干事	县政府武装科干事
	李玉珂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一区（沾城区）干部	县政府秘书室文书
	查乐	男	安徽涇县	山东沾化县财政科股长	县财政科科长
	苗文藻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政府会计	县政府财政科科员
	李金尧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财政科会计	县政府财政科会计
	柴玉亮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三区（永丰区）区公所会计	县财政科税征员
	路尊林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三区（永丰区）税征员	县财政科税征员
	丁荣泉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四区（泊头区）税务干部	县财政科税务所所长
	周连江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五区（富国区）税务副站长	县财政科税收股长
	杨群	男	江苏宜兴	山东沾化县财政科干部	县财粮科科员
	徐汉卿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县机关	县政府文教科科员
	聂同信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一区（沾城区）财粮干事、粮库出纳	县政府收发、民政科科员
	刘春太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县机关干部	县新华书店经理
	张介青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民政实业科科长	县粮食局局长
	宗开三	男	山东垦利	山东沾化县五区（富国区）粮库主任	县粮食局副局长
	隆占汉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五区（富国区）干部	县粮食局粮征科副科长
	樊玉 (樊文斌)	男	山东阳信	山东阳信县公安局公安队排长	县公安局公安队队长
张自强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委通讯班通讯员	县公安局侦察股副股长	

	姓名	性别	籍贯	南下前所事工作或职务	南下后工作单位或职务
丽水县	赵洪君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一区(沾城区)干部	县公安局侦察干事
	姜少礼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二区(黄昇区)武装干部	县公安局民警
	吴同玉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七区(新千户区)组织干事、县委工作队队员	县农会干部
	韩学典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二区(黄昇区)民运干事	县工会干事
	冯 炯	男	江苏顺宁	华东工作团驻山东阳信县队员	人民银行丽水县办事处营业部副科长
	王景祥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医院护理员	县卫生院副院长
	张长安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农救会主任	城区区委书记
	王萃芝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文教科干事	城区区长
	刘 波	女	安徽泗南	山东阳信县粉刘区委区委委员、民运科长	城区委副书记
	王洪利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五区(富国区)委宣传科长	城区区委组织科长
	吴清亭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一区(沾城区)某乡指导员	城区区委组织科副科长
	张世杰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六区(益和区)宣传干事	城区区委宣传科长
	王信臣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五区(富国区)	城区民运干事
	王廷山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五区(富国区)财粮干事	城区武装干事、城区青委副书记
	郝长明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五区(富国区)农会干事、乡长	城区武装助理
	王继武(吉五)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富国区)五区	城区文书、财粮助理
	高秉祥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某区粮库调保员、会计	县粮食局城区粮库副主任
	宋立德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粮食局干部	县粮食局城区粮库会计、副主任
	马学荣	男	山东博兴	山东沾化县粮食局干部	县粮食局城区粮库供调股副股长
	张巨祥	男	山东蒲台	山东沾化县一区(沾城区)农会主任	岩泉区委副书记
	刘福林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一区(沾城区)农会副主任	岩泉区委组织科长
	巴殿春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七区(新千户区)农会干事	岩泉区民运科长
	吴骏祥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粮食局会计股股长	岩泉区副区长
丁明连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一区(沾城区)武装干事	岩泉区武装干事	

	姓名	性别	籍贯	南下前所事工作或职务	南下后工作单位或职务
丽水县	吴玉英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一区(沾城区)区公所村经费会计	岩泉区财粮助理、区粮库主任
	胖化民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一区(沾城区)班长	岩泉区粮库保管员
	崔盈三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四区(泊头区)粮库保管员	岩泉区粮库保管员
	耿凤岐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委警卫队警卫员	岩泉区领导警卫员
	袁长泽	男	山东长清	山东沾化县一区(沾城区)区委副书记	江南区委书记
	赵宝璞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一区(沾城区)	江南区委宣传干事
	耿海东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一区(沾城区)青年干事、主任	江南区委民运委员
	李岱保	男	江苏高城	山东沾化县三区(永丰区)武装干事	江南区武装干事
	李文询	男	山东寿光	山东沾化县一区(沾城区)武装干部	江南区武装(委员)助理
	刘同太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三区(永丰区)粮库主任	江南区民政助理
	刘玉甫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三区(永丰区)区委民运科长	江南区农会主任
	赵文祥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二区(黄昇区)区委副书记	太平区委书记
	于维果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二区(黄昇区)区委组织科长	太平区组织委员
	王剑峰 (王明仙)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三区(永丰区)	太平区组织干事
	王维新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二区(黄昇区)助理	太平区民政、武装助理
	郭文灿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二区(黄昇区)宣传干事	太平区委宣传科副科长
	张洪田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二区(黄昇区)助理	太平区民政助理、副区长
	王凤仪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二区(黄昇区)农救会干事	太平区农会干事、主任
	赵荣和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六区(益和区)区委副书记	碧湖区委书记
	王家范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六区(益和区)副区长	碧湖区区长
	李金斗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六区(益和区)财粮助理、组织干事	碧湖区委组织委员
	李阅文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六区(益和区)武装干事、某乡指导员	碧湖区民政助理
徐克荣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六区(益和区)民政干事、区粮库主任	碧湖镇武装委员(武装助理、区武工队长)	
李级三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六区(益和区)农会主任	碧湖区财粮助理	

	姓名	性别	籍贯	南下前所事工作或职务	南下后工作单位或职务
丽水县	丁章照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六区（益和区）某乡指导员	碧湖区民运委员
	赵希华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五区（富国区）各联合会第二副主任	碧湖区宣传干事
	杨宝珂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五区（富国区）某乡长	碧湖区农会主任
	郑云桥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三区（永丰区）粮库保管员	碧湖区青委干事
	吕希五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委警卫队警卫员	碧湖区粮库保管员、主任
	刘祥岭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委警卫队警卫员	县大队碧湖区中队中队长
	李兴汉	男	山东沾化	山东阳信县河流店区委委员、宣传科长	碧湖区领导警卫员
	曾澄清	男	江苏泗阳	山东阳信县商店区粮库保管、财政助理	曳岭区委书记、区长
	张玉阁	男	山东阳信	山东沾化县二区（黄昇区）宣传干事	曳岭区委组织科长
	李树生	男	山东惠民	山东惠民县谋区武装干事	曳岭区宣传科长
	谢洪福	男	山东惠民	山东惠民县李家庄区某乡乡长	曳岭区农会主任
	马光瑞	男	山东阳信	山东阳信县商店区联防队工作	曳岭区农会干部
	王希彦	男	山东阳信	山东阳信县河流店区团干部	曳岭区青委会副书记
	马希平	女	山东阳信	阳信县商店区妇女干事	曳岭区妇联主任
	高振堂	男	山东惠民	山东惠民县李家庄区某乡乡长	曳岭区财政助理
	杨洪庆	男	山东滨县	山东滨县县委通讯班长	曳岭区财政助理
	邓国民	男	贵州	山东滨县二区崔光磊（区委书记）通讯员	曳岭区中队队长
	蔡光春	男	山东阳信	山东阳信县商店区农村积极分子	曳岭区武装干事
	刘子彬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四区（泊头区）区委负责人	南明区委书记
	苑希贤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四区（泊头区）组织干事	南明区组织干事
	王兰春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五区（富国区）区委副书记	县府秘书、苏埠区委书记
	韩立昌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七区（新千户区）助理	
王春生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一区（沾城区）农民干事		
朱会祥	男	山东沾化	山东沾化县四区（泊头区）		

五四运动在丽水

周 率

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并波及全国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等多种形式进行的五四爱国运动，至今已步入第一百个年头。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对近现代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不仅传播了新文化新知识和马列主义思想，它还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

五四运动中，在北京的一批处属（原处州府所属各县）学生，也参与了在天安门的集会游行和火烧赵家楼等行动，其中就有当时在北京中国大学读书的缙云横路章人王惟英和在盐务学校读书的缙云靖岳人丁绍鹤。6月3日，为营救被捕

◎處州同鄉會之通電

各報館各省議會教育會農商會及各團體。青島失敗。東魯垂危。國家存亡。千鈞一髮。自各志士羣起救國。呼號奔走。均以勸用國產。不買日貨爲外交後援。一時自北而南。勢如潮湧。足見人心未死。國事尙有可爲。然我國人之熱度幾何。祇恐事過情遷。不數月而漸歸消滅。此日人所以有五分鐘之時間笑我也。爾等鄙見。不用日貨固爲今之急務。而組織公司仿造。尤當合力圖謀。無力者儲金一元。數目不嫌其少。殷富者投資百萬股。分不嫌其多。集腋成裘。衆擎易舉。所謂救國。所謂實業。皆不外於是矣。否則日言抵制。終非持久之道也。旅滬處州同鄉會魏爾等叩發。

《处州同乡会之通电》，选自1919年5月24日《民国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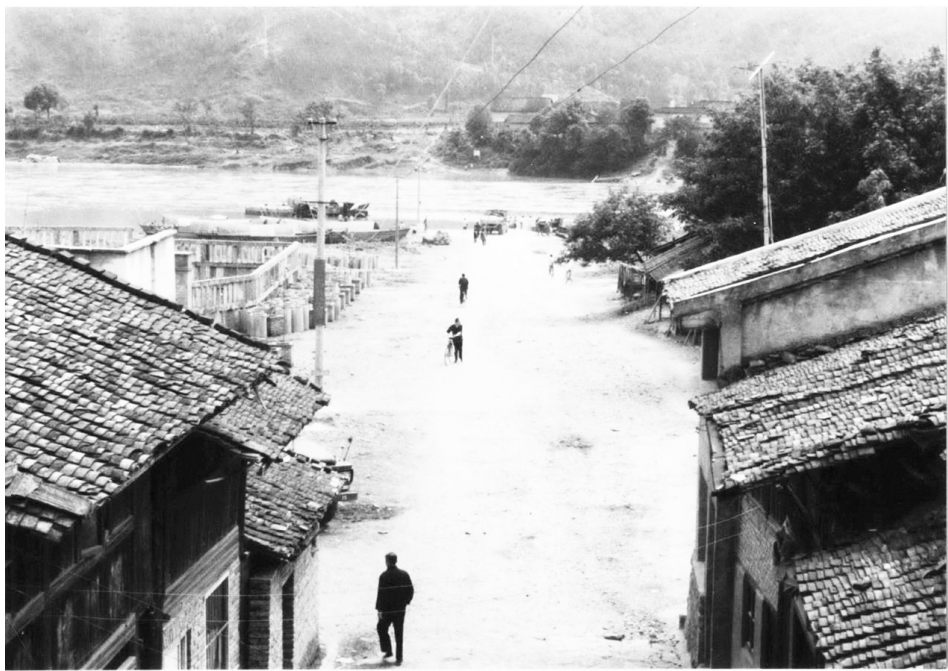
学生，王惟英参加救国宣传队伍，到正阳门天桥一带向市民宣传，被推为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在参加与北洋政府的谈判时，被军警拘禁于前门外右区署。当局为逼学生们屈服，将学生们被与死囚一起绑赴刑

场，陪斩两次，但这些青年学生宁死不屈，以绝食相抗。在全国各地学生和爱国工商业者的响应和支持下，最终迫使北京当局释放被捕学生。

旅居外地的处州人也对发生在北京的爱国运动，给予了积极的响应。1919年5月24日，旅沪（上海）处州同乡会通过《民国日报》通电全国，除号召使用国货，拒用日货外，还呼吁组建中国人自己的公司生产国货，号召有识之士出资兴办工厂，以实业救国，希望“无力者储金一元，数目不嫌其少，殷富者

投资百万股，分不嫌其多，集腋成裘，众擎易举，所谓救国，所谓实业，皆不外于是矣。”

6月，五四运动从大中城市，波及至浙西南山区的处属各县。在丽水的浙江省立第十一师范、第十一中学与处属十县联立女师、处属联立蚕桑学校等积极响应“五四”爱国运会，在丽水宣传五四运动，并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师生们罢课游行、分发传单，在梅山背、大水门溪滩等地烧毁日货，成为浙西南山区得“民主与科学风气之先者”。为平息这场“五四



“五四”运动中，丽水爱国学生焚烧日货的大水门外溪滩（摄于20世纪80年代）

民國八年六月五日上遂昌各機關函

遂昌高等小學校學生部暨教育會商會農會公鑒敬啟者
倭奴借據青島吾國在巴黎力爭無效諸君想已早聞知
北京大學生痛憤國恥怒譴國賊提倡抵制日貨愛國熱
心有所同是以全國聞風響應一致進行著等連合多
人組織十人團一以提倡國貨抵制日貨抱上海十人團同
一宗旨積極進行每於假日就地演說知諸君共為國民
一份子愛國具有同情用特專函通知期成一致諸君
乎吾中華倭奴通商之命脈也此其銷路立見其困尚
能長此偪吾嗚呼日貨不銷是倭奴就窮之日人心不死
即國魂未逝之時願諸君相熱誠共雪國恥不勝翹企
之至此請函安伏祈垂察

遂昌留括學生葉蕃等三十人叩

《留括學生上遂昌各機關書》（1919年6月5日）

学潮”，在丽水的省立第十一师范、省立第十一中学等学校提前放暑假，让学生返乡，希望以此能分散学生力量，尽快平息事态。

但当这些受五四爱国思想影响的在学生返回家乡后，他们尤如“星星之火”，将五四运动的“火种”带到处属各地，使五四运动的风潮迅速遍及各县城乡。

缙云五云镇的县立第一小学、

鼎湖的县立第三小学、壶镇的县立第四小学、新建的在文小学师生和从外返校的缙云籍学生二百余人，在县城西乡多公所集合，成立缙云学生联合会，推选陈恍、应作良等9人为总干事。师生们经与缙云县长汤赞清、商会会长叶玉生交涉后，举行游行，呼口号、贴标语，声援北京学生。学生们组织起来检查城内所有商店，开始时一发现日

货就烧毁，后来考虑到商铺的经济成本问题，采取登记日货，要求卖完后不准再进日货，因此各商铺老板也较配合抵制日货。

叶蕃、范治、叶芹等34名遂昌籍留括（丽水）学生返乡后，效仿上海的抵制日货组织“救国十人团”，成立“遂昌十人团”，并向各学校、教育会、商会、农会等机关寄送了《留括学生上遂昌各机关书》，提倡使用国货，开展抵制日货行动，并“每于假日就地演说”，唤起民众觉醒、同仇敌忾。与此同时，遂昌县城内的高等小学师生在大礼堂召开全校爱国运动大会，由从外地返乡的学生范应登台演讲，他慷慨激昂，痛斥了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的卖国行为，台下听众无不义愤填膺，群情激奋。会后，学生三五成群回乡向家人亲友邻居宣传爱国思想，呼吁抵制日货。遂昌大拓镇，地处偏僻，风气不开，杭州、丽水等地的学生回乡后，就到镇学堂向学生宣传大城市的情况，传阅带回的进步刊物，提倡新文化，宣传新思想。学生们还上街游行，并捣毁寺庙中的佛像，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反封建精

神。

从省立第十一中学、第十一师范两校返回松阳的学生，接到暑假回乡同学会的通知，与松阳毓秀小学的教师，召集各机关、学校和返乡学生齐集孔庙明伦堂，有几位曾留学日本的教育界人士，上台介绍日本的情况，揭露日本将劣质商品倾销给中国，换回中国粮食的行径，号召大家抵制日货，严防奸商将粮食外运。大会上决议成立松阳各界爱国会。会后，大家来到大街上游行示威，学生队伍到南门码头民船上检查日货，将查获的日货盖上检查戳记，不许再运行销售，如下次再查获日货则要没收烧毁。一次，日货检查队在一民船上查获地主徐登清的几百石大米，大家怒不可遏，要找徐登青问罪，徐登青闻风逃往外地。经过一个暑假的检查，松阳市面上的日货逐渐减少，直至绝迹。

两名温州学生来到青田县城的敬业小学，宣传五四运动，发动2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张贴切标语，并检查商店、码头，没收、烧毁一批日货。

通过这些检查烧毁日货的行动，使抵制日货逐渐深入人心，即使在

●浙人魏蘭之言

各報館轉四萬同胞公鑒。湖自內
 爭以來。六七兩年。北京政府。已
 借日銀三萬零三百二十萬。其運河
 借款六百萬金圓。何不在算。國權
 喪失。條約奇危。鐵務礦山抵押殆
 盡。按日銀一元。昔值華銀一元三
 角。今則賤至六角有奇。借債者莫
 不日金幾何他日償還。除利息外
 無形之利。已加一倍。現在南北
 議和。已有善後借款四萬萬。地丁
 抵押之說。八年預算。又有內國公
 債二萬萬。以爲抵借日金二成之議
 約而減。埃及以借債而亡。朝鮮以條
 約而滅。我國舊債之多。且無論矣
 即以新債而論。條約之苛虐如此
 借款之抵押如此。其能不步埃及
 朝鮮之後塵哉。猶未已也。債愈多
 則利息愈增。而今而後。誰能保無
 再借外債之舉。事急矣。國將不國
 矣。我同胞其猶睡而未覺乎。嗟嗟
 中華民國者。乃我四萬萬同胞共有
 之國。固非彼等少數人之私有產也
 之國。固非彼等少數人所能負擔也
 之國民。非彼少數人所能受禍也。
 中國淪亡。我四萬萬人民受慘禍。
 非僅彼等少數。淪爲奴隸也。孔子
 曰。既往不咎。又曰。往者不可諫。
 來者就可追。我同胞如果甘爲亡國
 之奴也。則已矣。如其不甘。速即

《浙人魏蘭之言》，选自1919年7月2日《民国日报》

1919年后，抵制日货的行动还持续在处属的一些地方开展。1923年，龙泉县城的县立完小和养真小学的高年级学生组织成立青年学生联合会，在进步教师的指导带领下，上街演讲，张贴标语，抄查商店里的日货，把抄查出来的白糖、草席、海带等日货，投入瓯江或当众在街头烧毁。学生联合会还多次组织高年级的学生到济川桥等地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两校学生还轮流到码头值勤，严格检查船只，发现日货，尽行没收。安仁、小梅、八都、道太等地学校的高年级学生也纷纷响应。

在五四运动推动下，浙西南各地各地民风渐开，进步青年积极寻求救国救民道路。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云和人魏兰，在7月2日的《民



松阳钟楼脚下的进步社团“启新社”旧址

国日报》上发表公开信，表达他的救国救民思想。在信中，魏兰揭露了北洋政府以国家的铁路、矿产、土地税等为抵押，从日本等国借款，使国人背负沉重债务，认为“借债越多，亡国愈速”，“今者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学商各界同心协力不一月而国贼去”，“欧约签字，因宜力争也，而四万万之地丁借款，尤宜力争，三万万之日金速筹还也，……伏望四万万同胞同心同德，速挽狂澜。”

新文化新思想也逐渐进入封闭的山乡，青田进步知识青年积极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1920年，青田县教育界将国文统一改为国语，各教科书一律改用白话体。松阳学校的教师开始教授白话文，学习注音字母，县政府文教科购置了一台留声机和一套汉语拼音唱片，供民众学习国语。1922年，曾受五四思想影响的浙江医专毕业生宋仲敏回乡在松阳钟楼脚有设医院，并组织一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

成立了“启新社”，购置《新青年》《解放》等进步刊物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利用晚间学习传播共产主义思想。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启新社”成立反帝委员会，上街下乡宣传帝国主义的暴行，在城隍庙演出新话剧，将所得收入和募捐所得五百余元汇至上海反帝运动委员会，作为支援上海工人罢工费用。1922年，青田县果行小学冲破封建伦理的束缚，改校名为果行女子小学，专收女生入学。青田阜山乡村师范学校等许多新式学校就是在新文化运动推动下各界捐资创办的。

在五四运动和进步报刊的影响下，处属一大批知识分子赴外地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许多进步青年奔赴广州报考黄埔军校，涌现出麻植、蔡鸿猷、季步高、李逸民、吴玠、孟卿、唐公宪等一批优秀的青年革命家，为中国早期革命做出重大牺牲和贡献。

丽水县自卫总队起义的回忆

胡允孚

1947年冬，我在国民党陆军总部，不久就调到南京国民党第九训练处。九训处是美蒋重整新兵的部门，得到美国顾问重点帮助，美式装备齐全。南京国民党第九训练处处长陈沛，办公厅主任张慕槎。下辖人事、情报、训练、后勤4个组，还有一个干部学校。我任训练组副组长。全组有各兵种的科长、参谋等50多人，这些人都是我介绍来学习的校级军官，所以较熟悉。其中张慕槎是我同乡，又是上下级关系，还有赖绍峰、吕调阳等人和我的关系更密切，他们都是和我一样不满现状的老战友。我们几个人能经常接近，相互说些知心话、心里话，谈对当时形势的一些看法。

国民党第九训练处成立不久，就开往广东曲江县，由于美国顾问



老年张慕槎

过不惯小城镇的生活，又开驻广州市。1948年，广东也和全国一样“山雨欲来风满楼”。东江纵队、西江十万大山里的民主联军都很活跃。而国民党只有一个从前线败下来的64师、两个新兵旅、两个新兵总队、5个保安团，除保安团其他部队都在整训。在当时大好形势的影

响下，再加上我们本来对国民党的现状又不满，于是我就和赖绍峰、吕调阳商量，决定就近找东江纵队。由赖绍峰去找东江党组织，我和吕调阳在九训处组织力量。正在准备中，陈沛被免去处长职务，由钟彬接任，同时我的副组长职务也被钟彬免去，调为教官。我们这次打算就落空了。

正当我受到钟彬打击而怒不可遏之际，这时因党组织受到破坏而到我处避难的胡元光（我堂兄），他了解我的处境后，就大胆地向我介绍了浙南地下党活动情况，而且还谈到我原来的几个老师和同学现在都是浙南党的领导干部，并且鼓励我回乡参加活动。由于胡元光对我的鼓励和启发，我又和赖、吕二人商量，决定分开活动，谁先找到党的组织，就由谁负责通知其他人集中。我就决定回浙南，赖绍峰到广东东江，吕调阳暂留九训处，以便联系其他人。我回浙南前，向陈沛、张慕槎辞行时，老张要我留下通讯处，并说国民党有可能在浙江成立绥靖区，要我作好思想准备。我一听就明白，老张这时已经是话中有音了。当时我又喜又怕，喜的

是支持我行动的人越来越多，怕的是万一不成功。

11月中旬，我到了瑞安县城，胡元光就赶来接我了，他告诉我老家的情况，并说许多地下党员都欢迎我去，此时我的心情异常激动。在瑞安住了几天，张慕槎忽然从丽水来了一个急电，要我速去丽水。到丽水码头一上岸，我就看见了张慕槎上任丽水县长的布告。我觉得很奇怪，他怎么会当这个县长呢？我见到他时直发笑，他抢先说“我们学刘、关、张吧！”我迟迟才说：“条件太差啊！考虑考虑”。继而又谈了其他许多事。张慕槎还告诉我，陈沛已被派任南京卫戍司令部副司令。他似乎暗示，在陈沛处当幕僚难已成事。

张能断然地说出心里话，这说明他也实在下决心了，也充分说明他是相信我的。当然我也认定可以放心与他同患难、共甘苦。当时我对他开玩笑说：“你第一次跟19路军反蒋没有成功，第二次反蒋会成功了吧！”他笑了笑，我们谈不久就休息了。当夜我思索了很久，决定从明天开始，先把丽水的情况弄清，同时急电文成胡元光来丽水，

要他即去找中共浙南特委会。

丽水是个小山城，情况容易了解清楚。政权机构除县府外，还有专区的行政公署。军队除县的自卫队外，专区的保安司令部有两个独立营，总人数不过1400人左右，战斗力差。国民党和青年党的头子经常磨擦，关系很紧张。党、政、军三方面概括起来6个字：“腐朽，混乱、无能。”同时在弄清丽水的情况过程中，还发现警察局有个李默庵集团军在抗战时期留下的武器库，有大批的步枪等，看来武器不成问题。

很快，胡元光就从浙南特委会回来，并且还带来了特委书记龙跃同志的长信，信中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意见。从那以后，胡元光就担任了我们同浙南特委联系的联络员。从此，我们能够保持在党的领导下，开始做起义的准备工作的。

开始时，我们只能以自己团的名义搞一些活动。决定由张慕槎担任总团长，我担任副总团长，以詹玉书、潘和海、胡绍采、胡国光、胡元光、王绍钗、赵振中、胡建中等人为骨干，调整干部，淘汰老、弱、残，扩大编制。人员来源有广

州国民党第九训练处，诸暨、金华方面和文成方面的民兵（我以扛枪为名，把大批民兵充实我们的部队，并作为骨干使用，在这方面我事先没有经过上级党组织的同意，是犯过错误的，同时也感到浙南党组织对我的谅解）。招来的人都是与老张和我有关系的，比较可靠。在整顿部队的同时，我们建立了修械所、修理所，并千方百计地向省保安处请领枪支弹药，以装备部队。当时，我们的确搞得很热闹。我经常带部队出城，一是麻痹敌人，经常出入久之，不使人生疑，二是熟悉了解地形。专员兼区保安司令朱沛霖还认为我不错，要我担任黄村指挥所的主任，指挥丽、缙、青3个县的武装，当时我是多多益善，就是怕抓不到手。

部队虽然经过了整顿，除干部外，大部分人员没有战斗经验，要吃掉两个独立营困难很多，而且武器又多，需想法运走。因此决定由胡元光与浙南特委联系，要求派个原建制不变的徒手营，暗中分散来丽，掺入我部，由我们配给武器装备，以便壮大队伍力量。当时龙跃同志答复说，要经过特委扩大会议

通过才能派来。

丽水这个地方，是专员公署所在地，交通较方便，是金华到温州的中途站，情况复杂，有许多应付工作要做。这方面的工作我是不会做的，而只有老张来承担，所以他被应付工作拖住，我多做些起义方面的工作。我们经常碰碰头，商量一下，分头去干。我们之间是互相关心，相互鼓励的，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早日做好准备工作，举旗起义。我们的计划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党的武装支持下消灭专区保安独立营，消灭专员公署，席卷全丽水地区。

就在积极准备起义时，郭医生带来了中共浙东临委会马青同志给路南党代表卜明同志的一封信交给

张慕槎。内容大致是“张慕槎开明，可以争取。”老张问我怎样？我说，送去交给卜明，仍由郭医生送去。我判断是试探。过了两天，卜明同志果然派来了吕尔明同志到我部担任联络工作。当时张慕槎因母病回家，由我出城将吕东明接到太平区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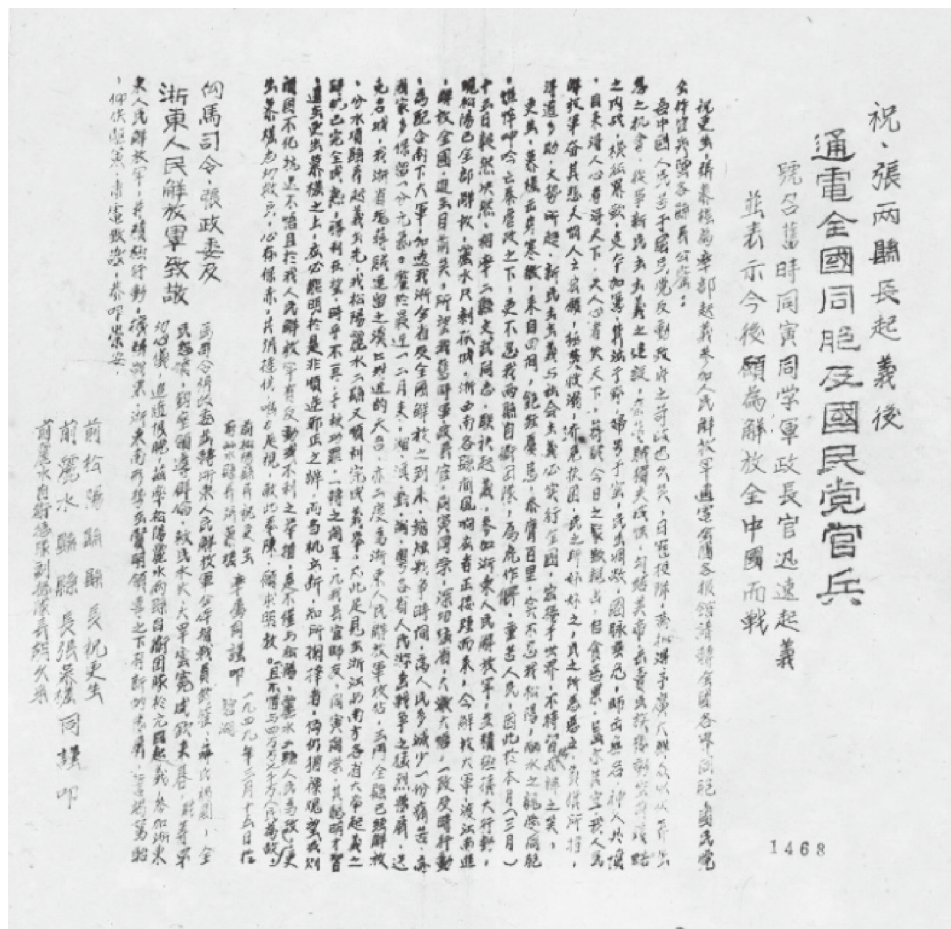
我们同外部的联系是逐步增加的，特别是文成方面，一来就十几、二十多人，目标大，怕出意外，我就把领导机构迁至碧湖龙子庙，同外部的联系改放在碧湖镇。这样离城远，较安全。况且更便于同南边的浙南特委联系，北边靠近路南党组织，两边又是祝更生部。同时，也就形成浙南、浙东联成一片的大好形势，有利于我们的起义准备。



丽水县自卫队起义地——碧湖龙子庙

1949年3月14日10时，我在碧湖接到丽水朱沛霖的电话问：“松阳方面有消息没有？”我说：“外面有谣言，说出了什么事，我还不十分清楚。”他又说：“再查一查。你现在将部队向丽水靠拢。”听了沛霖电话中的语气，无疑地他已在怀疑我了。当时摆在我面前的有三种办法：一是按朱沛霖的指挥，把部队向丽水撤去。用这个方法起码

会丢掉部队，我个人可能被扣；另一方法则是按兵不动，仍驻原地，他也可以给我扣上不服从命令的帽子，我个人也可能被扣；这两个方法都不能用。这时，外面传说纷纷。碧湖区区长魏再恩也告诉我说：“外面有谣言，对我们不利，应采取措施。”看来只有“走”这条路才是上策。我想，现在正做准备工作，怎么可以如此急忙的走呢，许



松阳、丽水起义后，起义部队印发的布告

多重要的人物，如广州九训处的赖绍峰等人，浙南方面的人都还没有来，在路途中的人也不少，张慕槎因母丧还未回，在浙南联络的胡元光没有消息，许多武器弹药还没运出来，家属不能安排，特别是还没有给丽水地区的反动势力保安司令部所辖的部队、机构以歼灭性的打击。这样会给以后带来许多麻烦。怎么办？在这紧急关头我也只好采取果断行动。于是，我在3月14日下午1时决定：除郭医生外，其他人员全部拉走，并给有关方面和张慕槎加急电报“胡允孚叛变”。电告丽水的屠泽民主任秘书即刻来碧湖。要王绍钗继续运送武器弹药，明运改为暗运。暗中派人通知家属离开原驻地。部队夜里10时开始向宣平移动，由吕东明同志带路，15日拂晓，我们胜利地到达了丽水以北的老竹附近。我们看到了卜明同志率领的久经考验的应飞部队早就到达，松阳祝更生部队，也先我部队到达。我们胜利会师了！同志们迎面上来，紧紧地握着我的双手，并从心里发出“欢迎、欢迎”的笑语。我们的心是多么的激动。我估计，这时那些没来得及跟我起义的同志

也会接到急电而安全地转移。我的心中也轻松、愉快了，只是还觉得不够理想。

16日，党决定改编我们的部队。我率领丽水方面的武装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丽、缙、永、武人民游击支队。我任支队长，中共丽水县委书记张之清同志任政治委员，陈仿尧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吕东明同志任大队教导员，周一平同志任武工队长。祝更生率领的武装改编为丽、松、宣、遂支队。祝更生同志任支队长，林艺圃同志任政治委员。在浙赣路南组织党领导下的一支人民武装就这样壮大起来了。部队改编后，党对部队的教育、改造非常重视，很快的在连队里建立了党支部，对部队进行了全面的政治思想工作。

3月18日，蒋介石派国民党11师配合区保安司令部大肆向丽水、缙云、松阳一线进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采取分散隐蔽、偷袭、夜袭的办法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我们能坚持战斗，部队除伤亡外（大队长詹玉书等40余人伤亡，屠泽民、王绍钗同志被捕牺牲），没有逃跑的，

战斗打散了，也能集中起来，有的离队好几天，还会找到部队，士气高昂，宁愿战死也不让敌人占到便宜。这是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党的威信很高，党员干部做到以身作则，带头艰苦奋斗。我第二次见到卜明同志的时候，正患感冒。卜明同志把他仅有的两只用自己口粮换来的鸡蛋交给我，我坚决不要。以后他又给了支队的军需主任，军需主任也没有收，结果两只鸡蛋没人要，我们感动得流下泪来。在作战中，张之清同志总是背一条小棉被，我就没有习惯背，有时我们合盖，有时他索性不盖，让我一个人盖，像这样动人的事例，举不胜举。

为对付敌人的围剿，我和张之清同志各带一部分人员，分开活动。支队政治处主任陈仿尧同志和我一起，他对丽水北乡一带的情况很熟悉，当地人民对他很热情。我们和敌军 11 师在丽、宣一带转来转去，敌人每个排都配有步话机，我们有陈仿尧代替步话机，很灵，他带我们走的不是路的路，忽隐忽现，神秘莫测，弄得敌人精疲力尽。

为了有利战斗，更好地打击敌人，党组织决定由我和吕东明同志

带领一个大队去浙南，会同浙南纵队反围剿。我接受任务，内心很不平静，舍不得与同艰苦共患难的战友分开。我们相处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共同战斗的生活，使我们的心连在一起。尤其是卜明同志还以党组织的名义，写信给龙跃同志介绍我入党，真使人感到党对我的无比关心和温暖。4月13日，从武义出发，经宣平、松阳、龙泉、云和、景宁 6 个县境，到达中共浙南特委会驻景宁办事处。21 日早晨，办事处的电台收到总部军委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后，驻地里里外外、军内军外、村里村外顿时沸腾起来，战士们没有爆竹，就用步枪代替朝天鸣放，虽然弹药紧张，我们也不好制止。经过 10 多分钟热闹，才慢慢安静下来，大家在一起畅谈以往和将来。他们说，这样的情景，真是一辈子也只会有一回。

部队休息一天后，22 日继续向温州方向前进，经泰顺、文成、平阳、瑞安，于 4 月 25 日前后到达中共浙南特委会所在地—永嘉上蝉。在浙南特委会的领导下，我们立即投入了解放温州地区的战斗。

补充回忆

1949年3月14日，丽水自卫总队全体人员以及县政府部分职员共510余人，从碧湖开赴曳岭游击区宣布起义，共携带轻机枪9挺、步枪500余支、手枪10余支、手榴弹5000多颗、子弹50000多发。

我原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上校部员，1947年冬调任陆军第九训练处训练组副组长。张慕槎原任陆军第九训练处办公室主任，接任丽水县长后，约我到丽水组织武装起义。我于1948年11月到达丽水，任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担负组织起义工作。当时县自卫总队只有200人左右，素质又差。第一步的工作，除取得同共产党的联系以外，必须抓好部队的整顿、武器的配备等工作。扩充力量的主要来源：一是从广州第九训练处来20余人，大多数是军官，如大队长詹玉书，参谋长潘和海，中队长朱光淳，碧湖区长魏再恩。原九训处中校参谋赖绍峰到缙云即被国民党逮捕杀害（因我已起义）。二是从铁路沿线招来抗战时期流落的蒋军官兵。三是从文成县招来的民兵，其中有骨干也有普通民兵，大部是鲤村、大岙、玉壶等地人，约230余人。起义后担任大队副的胡绍

采，担任中队长的胡建中，担任军需主任的胡国光，军械股长王绍钗（在抢运武器中被捕杀害）等人都是，对起义的作用也大。四是本地找来的国民党军队散兵，约10余人。

武器的主要来源是：国民党李默庵集团军在丽水没有被运走的武器库，朱沛霖的独立二营以及我部的步枪，大多取自这个武器库。我们装备只能靠自己找米下锅，办起了修械所，修理损坏、缺零件的机枪、步枪。除这个来源外，还向省里请领。当时景宁、缙云等县，省里分配给他们的枪支弹药，因无钱购买，都不要，我们就克服困难要来了。起义第二天，我们还把存放在丽水的武器弹药偷运出来，军械股长王绍钗运了两船的枪支弹药，在丽水至碧湖的途中连人带船被敌人（特务营）劫走，王绍钗就是这样被捕杀害的。

我和地下党的关系较密切。我的老家是文成县的山区，也是地下党活动的地方，因此我同浙南特委书记等同志来往较早，1948年11月间，由我的堂兄胡元光（原系中共党员，后脱党）介绍，同浙南特委龙跃同志取得了联系。以后也就由胡元光担任我与浙南特委的联络员。不久，我们又派丽水县府的郭少英到路南党代表卜明同志处联系，从此，吕东明就担任

我们和路南党组织的联络员了。

当时丽水专署有两个独立营，约1000多人，战斗力不强，但比我们这个部队是强些。我们打算先消灭两个独立营，然后再解放各县，因此向龙跃同志建议，派一个原建制不变的徒手大队，潜入丽水，由我们装备。用里应外合的方法，消灭专署、保安司令部以及两个独立营，然后席卷全区。当时龙跃同志答复，要召开扩大特委会后决定。

当时浙南特委在永嘉的山区里，距丽水600里以上，一次来回需10天左右。自从同路南党代表卜明同志取得联系后，党对我们的指示、教育更及时了。

我们准备起义的全过程，是十分秘密的，我们和浙南特委的联系，从未同任何人说过，就是对张慕槎也未说起过。同路南党代表卜明联系，也同样严守秘密。在起义以前，和松阳的祝更生见过两次面，只谈有“倒戈”的打算，我和党的联系情况，从未同他谈过。除接受党的指示以外，从未同任何其他个人或单位有过书信上的来往。只有党才有权指示我。

我们起义后，国民党很快就调11师来追剿我们。在曳岭新屋村是我们的第一次战斗。从那以后，我们就分开活动，由张之清政委率第一大队向

北，大队长是詹玉书，教导员是戈天择。由我率第二大队向缙云方面走，大队长由胡绍采代理，教导员由政治部主任陈仿尧兼任，另一个特务中队也在我调动。我所率的部队同敌11师接触过3次，死亡六七人，被俘10余人（包括区政府的人员）。由于部队都是民兵，队伍散得开，也能收得拢，有越打越强的趋势。张之清政委所率大队也同11师打过一次不小的仗，死伤较大，大队长詹玉书同志阵亡。

后来以卜明同志为首的路南党组织，决定派我带一个大队去浙南，联合浙南纵队开展反清剿，我于4月20日到达浙南特委景宁办事处。因我们苦斗了较长时间，比较疲劳，同办事处主任张金发同志商量后，决定在景宁办事处休息一天，并电告在永嘉山区的浙南特委。事情很巧，第二天一早（22日），我们就在电台里收听到中央军委、解放军总部发出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5日左右，我们到达了浙南特委会所在地，从此就在浙南特委的领导下战斗了。

解放丽水的回忆

童国贵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天险，乘胜追穷寇，解放全中国。

渡江后，二野三兵团11军33师，在兄弟部队的密切配合下，进军浙

江，追击国民党李延年残部，并配合当地游击队解放浙西南各县。大军进入浙江后，即分兵数路，追歼逃敌。11军33师和12军34师，进军屯溪、遂安、直捣金华。32师



解放初期的丽水县军管会旧影（继光街）

解放宣平、遂昌、松阳等县。33师与34师并肩作战，沿金丽公路追歼逃敌，势如破竹。几次遭遇战，打得残敌丢盔弃甲，辎重遍地。33师配合34师解放永康县时，歼灭敌人两个营，解放缙云县时，生俘敌军300余人。33师的98团，解放丽水城时，几阵激战，我军战果辉煌，俘虏敌军800余人，缴获敌吉普车10多辆，其中有敌兵团司令李延年自用的小吉普、小卧车各1辆。武器弹药更是不计其数，残军溃逃时，自行烧毁大型卡车100多辆。

5月9日，33师的97团在团长张庆和同志率领下，首先占领了丽水城郊两座山头。10日夜，98团在团长尹书信率领下，冲入丽水城内，一举围歼企图顽抗的敌军，解放了丽水城。33师进城后，与当地游击队进行了会师。师政委高治国与政治部主任即与当地党组织协商，筹建了丽水城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政治宣传工作，维护社会治安，使全城迅速恢复社会秩序。



丽水群众欢迎解放军进城（宣传画）

继丽水城解放后，97团马不停蹄，人不休息，连续作战，机智、勇敢的张庆和团长，一马当先，率团继续追歼逃敌，先后解放了云和、青田两座县城。

33师在圆满完成任务后，即集中松阳县，进行一周的部队整训。嗣后，全师拔离浙江，奔赴新的战场。

日本三岛市访问纪事

吴刚戟

1992年2月丽水市（县级）组团访问日本，据说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县市单独组团出国访问不仅在丽水地区是第一次，在浙江省也是头一回。丽水人自豪地说，山区政府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也有资格组团出国访问了。

丽水过去是封闭的，很少与外界打交道，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中，文化意识守旧，新观念很难传入。然而，今天与过去不大一样，自从被列为开放城市后，竞争意识大为增强。丽水人不但与各兄弟省市县的经济文化进行合作交流，而且放眼世界向国际扩大自己的影响。无疑，市政府派团出访，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次访问，是应日本静冈县三岛市奥田吉郎市长、日本国立历史

民俗博物馆福田亚细男教授邀请。代表团一行5人，丽水市副市长魏克禄为团长，市文化局长吴刚戟为副团长，成员有市政府办公室主任郑有理、金笔厂厂长刘敏春、羽绒厂副厂长黄筱林。通过考察访问，将增进丽水市与三岛市、佐仓市的相互理解与友谊，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寻求两市之间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进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

丽水市赴日本访问代表团于1992年2月26日启程，当天上午在市政府门口举行了欢送仪式，市委书记张福新、市长朱大鹏等有关领导为代表送行。

2月29日，天晴，上午9时，我们一行5人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登上乘坐的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MU923号客机。上午9点10分从上海起飞，飞机于东京时间12点40分安全地在日本国成田国际机场降落。前来迎接我们代表团的福田亚细男教授与小林忠雄副教授。向我们表示欢迎，我们能在日本见面难以控制自己的兴奋。两位先生争着拎我们的行李，领我们出了机场门厅，乘坐两辆豪华的小轿车上了高速公路，飞快前往东京市郊千叶县佐仓市内的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宾馆。丽水市访日代表团全体人员下榻在这里。

3月1日，天晴。丽水市代表团正式访问三岛市。

上午9时代表团在福田亚细男教授亲自陪同下，从佐仓车站上车，经新干线东京车站去三岛市。中午12时19分，我们到了新干线三岛车站，在三岛车站受到三岛市政府国际交流系长关野康先生、三岛日中友好协会和欢迎委员会代表后藤正治先生及其夫人后藤纯子、三岛市乡土馆学员衫村齐以及欢迎丽水市访问团的有关人士的欢迎。12时30分，日方在田代餐馆宴请招待昼食（午饭）。

在三岛市访问时间计划安排有

3天，时间紧内容丰富，午宴后我们不休息，立刻参观三岛市民文化会馆，赶到三岛市民文化会馆已是下午2时正。

参观了三岛市民文化会馆，去三岛市乡土馆途中领略了乐寿园。

三岛市乡土馆在乐寿园里面，四周树林茂密参天，环境幽美。我们参观展览实物，全是一些有关三岛市乡土民俗、自然历史方面的内容。从中领略了三岛市的民俗风情，文化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由乡土馆一位女副馆长和陪同我们的该馆学员衫村齐先生介绍情况。通过参观，我们具体了解了日本民族同中华民族的民俗文化渊源相似之处及其不同之点。日本文化受中国大陆影响很深，日本在贞观之年三岛市历书就与中国唐朝所用的历书基本一样，当时日本所用的文字就是汉字，后来日方将汉字加以改造。乡土馆的馆藏文物保护极好，并不惜工本修复制作，可见三岛市对文化教育之重视程度令人敬佩。

佐野美术馆也是这一天参观的计划，这是一家个人举办的美术馆。由佐野隆一翁于1966年（昭和41年）创办开馆。展览馆展出展品主

要是一些日本古代的绘画、工艺品、青铜器、陶瓷器，展品定期交互替换展览。我们参观时展出除艺术品外，主要展出的工艺品是日本刀与酒器，有日本不同时代不同形状的精品。佐野美术馆副馆长渡边妙子女士在接待我们参观展览后，又于下午4时陪同到附近庭园式的隆泉苑举行了座谈，并热情地介绍了日本的茶道，以日本茶道传统方式请我们品茶。

下午5时，天色已灰暗下来，我们离开独特难忘的隆泉苑，到达了三岛市宿食中心——普拉茶宾馆。安顿好住宿，接着进行日本家庭访问。我们代表团5人分别被邀请到有关市民家庭访问。分配我去一户知识分子家庭，驾驶小轿车来接的是这个家庭的女主人池上久二子女士，她会几句中国话，正在学习中文，男主人是一个效率技术研究所的所长池上岩。晚上6时，三岛市街道店面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已闪亮，轿车穿过街中心，奔驰在环城的马路上，开出城郊看行驶方向，往农村去。天漆黑，只有借助车灯才能看到道路两旁一闪而过的建筑与景物，但十分模糊，难以看清。

大约过了三四十分钟，车子停住了，女主人请我下车，说她的家到了。我看了看周围环境，旁依小山，山上树林繁茂，她的寓所单门独户，是一座花苑式的小别墅，没有城市的繁华与喧闹，这里却是恬静与安谧。她的丈夫听到车子响声，走出门外前来迎接，向我表示欢迎，请我到屋里做客。在客厅与她丈夫交谈不多时，女主人从厨房拿出丰富的佳肴酒菜，就招呼丈夫请我入座。彼此边吃边交谈，虽语言不通，但他夫妻俩能认识中文字，我就借助于笔写。我听不懂，他们也就写汉字，相互间沟通了感情，产生了友谊，双方真诚希望中日能永久和平友好相处下去。只是觉得晚上时间过得太快，到9点来钟我要离开时，他们感到惋惜。夫妻俩开车将我送回宾馆已10点多钟，相互热情道别分手了。我们代表团几位同志大体都遵照原定返回时间，按时回到了驻地。

3月2日，天晴转阴。上午9时从普拉茶宾馆出发，赴日本国一级自然保护区柿田川涌水参观，柿田川在静冈县清水町，与三岛市临近。柿田川涌水发源于富士山，由

富士山一带降雨雪的地下水流汇合而成，属日本一级自然保护河川狩野川水系。柿田川涌水无菌、无杂质，水质同矿泉水一样，当场取水可生喝，年间水温保持 15℃左右，夏凉冬暖。在实地看到柿田川的河川的水，确实清澈见底，这里的环境与自然保护监测工作实属达到一级最高的护理标准。

10时30分，去三岛市一农业专业户考察园艺设施和西红柿无土栽培技术。农户主人小野先生在现场向我们介绍了具体情况，并摘下一个个又大又红的西红柿给我们品尝。家中所储藏的西红柿保鲜技术也很好，取出存放半年一年的西红柿品尝，味道也与新鲜摘下的没有不一样。

于11时30分，我们代表团准时到达三岛市役所（政府），市役所房舍并不高，外观一般。三岛市长奥田吉郎和市政府的官员们排成两行整齐队伍，一律穿着黑色西装、系着领带，在门厅欢迎我们丽水市代表团的访问。向我们一一鞠躬握手后，奥田吉郎市长带领我们上二楼会议室。会议室主席台上挂着中国日本的国旗，会议室桌上插

着中国和日本的小国旗，对面墙上写着热烈欢迎中国丽水市代表团访问的字样，气氛庄严、隆重。三岛市长奥田吉郎、市会议长白方圭一、市教育长長野富夫、市企画调整部长杳见正见，在会议室拜会了我市代表团。奥田吉郎市长首先致欢迎辞，并赠送我代表团纪念品，在同我市代表团亲切交谈中介绍了三岛市经济文化发展情况。丽水市代表团长魏克禄向奥田吉郎市长转交了我市市长朱大鹏邀请贵市组团访问丽水市的信，致了答谢词，并代表丽水市政府赠送了青田石雕纪念品，介绍了丽水市有关情况。三岛市与丽水市相仿佛，有美丽的青山、绿树、河流，有悠久的历史，有神奇的名胜古迹，是一个文化旅游资源极为丰富的城市，工业、农业、商业发展趋势良好，发展前景广阔。在相互交谈中增进了两市之间的了解与友谊，双方表示今后在经济文化领域方面要相互开展交流，愿意两市结为友好姐妹城市。奥田吉郎市长还表示接受朱大鹏市长的邀请，在适当的时间派出三岛市代表团访问考察丽水市。会晤时间虽短促，但内容充实，收效不少。

会晤后，双方合影留念，三岛市政府招待我市代表团昼食。

下午1时左右，我代表团在日方有关人员陪同下，对三岛市农村谷田地域和箱根用水进行了考察。三岛市对农田设施建设十分重视，土地保护与水利建设卓有成效。

下午3时，去秀丽多姿、风光宜人的芦湖游览。

下午4时，去箱根山方向的火山地带大涌谷观赏。我们在一路上看到危险禁区，都有木牌示意，游人谁也不敢越雷池半步，大家自觉按规定路线走，走上大涌谷的口中，只见山底下涌出泉水在翻滚，冒着的热气往上升，好似到了神话世界。山上只有一家小店，有用热泉水煮熟的鸡蛋供应，据说这里的热泉温度高达摄氏85至90℃，鸡蛋放进去很快被煮熟，并传说吃了这里的热泉鸡蛋能消灾降福于人，到这里游览的人们一般都买上几个吃吃，我们当然也不例外。在返回的路上，大家特别兴奋，深感大涌谷值得人们观赏，令人难以忘怀。

晚上6时，三岛市政府与日中友好协会、欢迎委员会为丽水市访问团设宴招待，并举行欢迎会。三

岛市政府出席的官员有议长、教育长、部长、课长和各民间群众团体负责人，各界人士代表共30余人出席了宴会与欢迎会活动。市长奥田吉郎致词热烈欢迎丽水市代表团来三岛市访问后，三岛市日中友好协会和欢迎委员会代表接着致词表示热烈欢迎，日本小姐还向我们每个人献了花。丽水市副市长、访问代表团团长魏克禄致词向三岛市政府、各团体、各界人士表示亲切慰问和衷心感谢。欢迎会上，中日双方多次敬酒，相互祝愿，希望两市在今后加强交流和友好合作，通过政府与民间之间交往要增进友谊，结为姐妹友好城市。

3月3日，天阴。上午9时参观三岛大杜。大杜的御祭神是大山祇神、事代主神，总称为三岛大明神。大明神是日本三岛创建之神，也是富士山原始保护之神，开创伊豆国的国魂之神。参观三岛大杜，尤为可喜的，我们观赏到整片樱花齐放。

上午10时，离开三岛大杜，来到三岛市理光缝制株式会社考察。该社社长岩田勇光向我们介绍了基本情况后参观了厂房、机械化自动

化生产的流程。

上午 11 时，我们准时到了三岛市政府，与该市商工课的官员们进行有关经济问题的恳谈。参加恳谈会的有三岛市商工会议所专务牧野征次、商工会议所事务局长峰田静雄、经济部长伊出胜、商工课长齐藤丰明、商工观光系长内藤胜彦等先生。中午 12 时在市政府昼食后，去市中心商场参观。

下午 2 时，结束了在三岛是的访问。当我代表团将要离开三岛市时，三岛市政府国际交流系长关野康先生及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和欢迎委员会的委员及有关人士前来车站送行，先生与小姐们送进车站进入月台还不肯离开，直到列车启动还向我们招手致意。自动高速列车飞快奔驰了，秀丽的三岛市，热情友好的市民们，再见！我们殷切地期待着您派代表团来丽水市友好访问，到那时，我们两市人民一定会再相会！

3 月 4 日，天晴。上午 9 时在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参观。它是日本第一家历史博物馆，也是日本最新的国立博物馆，具有国家第一流设施。通过参观博物馆，使我

明白了日本为何派团组一次次来中国进行民俗文化探索，为何如此重视对中国民俗文化的考察调查；究其原因是为了进行国与国之间的民俗文化的比较研究，为进一步发展日本的经济文化，与欧美各国争夺在东亚的霸权与市场服务。从而启示我们，中国必须十分重视自己的历史民俗文化的考察与研究，同时应该迅速行动去考察研究别国的历史民俗文化，为中华民族繁荣昌盛走向世界作出应有努力。日本大和民族自强不息，奋力拼搏，敢于同美国比高低，争先进的精神是可贵的，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上午 11 时，参观结束，日本国立历史博物馆长土田直镇教授会见我市代表团成员，并相互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赠送了纪念品。会见在座的有该馆民俗研究部长岩井宏实教授、福田亚细男教授、小林忠雄教授等。中午，馆长在佐仓市菖蒲庄设宴招待了我市代表团。

下午 1 时，我们到千叶县佐仓市政府礼节性拜访，佐仓市长菊间健夫会见了我市代表团，会见时教育部长渡贯博孝、市长办公室秘书在座。

下午2时，在佐仓市山田机械工业株式会社考察。我们进入该公司、工厂如同进入花园一样，摆着一盆盆鲜花，四周绿化，空气清新，室内整洁。我们脱掉鞋子参观走了一圈出来外面没有沾上任何污秽，用双手在角落也抹不到灰尘。素有“技术宾馆之称”，环境美化可与逗留宾馆比美的千叶工厂名不虚传。该企业受到日本东京通产局长表彰，多次连续被日本政府制定为中小企业合理化样板工厂。

3月5日，天雨。参观川村美术馆展览与房总村体验博物馆。

上午9时出发，我们到达佐仓市川村纪念美术馆。我们参观所展出的美术作品，还有17世纪画匠画的人物画，有19世纪印象派的作品，还有西欧近代的绘画作品和20世纪新作。

下午1时，冒雨前往佐仓市的房总村体验博物馆参观，房总村是千叶县县立的体验博物馆，是提供市民与青少年接受传统再教育和体验生活的活动场所。总房村内，保持着日本古代的传统建筑式样，在村上有日本古代的商业街，有总屋、武家屋、农家，有果树园、水田，

有作业场中的木工所、锻冶屋，农村歌舞伎舞台等等。现全馆管理人员70人，每年支出各种费用预算折合人民币20亿，每年收入经费在这里十分可观，据介绍收入抵支出还有所盈余。这个再现、实践、体验日本传统生活、风俗民情的房总村，具有极大诱惑力，每年四季招来众多的旅游者及青少年。因为来馆者可以进行各种作业、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等生活的演习，可以学到传统的工艺技术，烹调各类风味小吃，体验各种不同行业，领略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生活礼仪，开展多种的文化娱乐活动，加深传统民俗文化的再认识，从而更好地保持传承传统优秀文化并使其发扬光大，推进现代新文化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晚上6时，我市代表团在佐仓市中国料理餐馆同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民俗研究部的先生们举行答谢宴请，向民俗研究部的先生们辞行。民俗研究部部长岩井宏实教授、朝冈康二教授、福田亚细男教授、小林忠雄副教授、桥本裕久、福原敏男助手等先生出席了告别宴会。

3月6日，天气晴朗。上午8时，我市代表团离开了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驻地，8时56分在佐仓市自动车站上车前往日本国首都东京市。

中午12时许，我们到达后乐宾馆。安排落实了住宿，放下行李，下午我们首先观览了东京最繁华的街道银座的大小商店，接着去太阳城登上最高的顶楼观望了整个东京市貌。去东京浅草神社参观时天已暗下来了。东京浅草神社一带特别富有日本民俗风情，各式各样的小卖、民间特色玩意儿，各种小吃异常丰富多彩。直到深夜大约11时半，我们一行5人回到了后乐宾馆。

3月7日，天晴。这又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中国浙江省丽水市访日代表团结束了在日本国的访问。9时福田亚细男先生与夫人赶来送行了，随后小林忠雄先生从佐仓赶来送行了。福田亚细男先生及其夫人与小林先生于上午10时，从日中友好会馆将我们送到成田国际机场。1点10分东京至上海的客机正式起飞，离开了东京。飞机渐渐地升高向前飞行。我们坐在飞机上，从窗门往

下望，东京远离了。高耸入云白雪皑皑的富士山，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眼底下，居高临下居然看清了她的全貌、她的英姿、她的妖娆。然而，让人留恋的富士山瞬间不见了，但是她已经映入我们的脑海，将永远留在我们的美好记忆中。

下午4时（北京时间），客机到达上海，我们丽水市访日代表团的同志顿时感到温暖，安全地回到祖国的怀抱，每人个由衷地高兴。我们丽水市代表团胜利完成了访问日本的光荣任务，昨天将丽水市人民的深情厚意带给了日本静冈县三岛市、千叶县佐仓市的人民，今天又将三岛市、佐仓市人民的热情友爱带给中国浙江省丽水市的人民。这是多么有意义的行动啊！

中国古语说得好，归心如箭，到达上海的当天下午遇上丽水市政府派来上海虹桥机场迎接的司机同志，我们每个代表心里都乐开了花似的。3月8日下午我们终于回到丽水市。

我们出访时，丽水日报在1992年2月27日头版显著位置刊发了丽水市政府派代表团启程赴日本访问的具体报道。宣传强调了此次访问

的目的与意义。在日本访问三岛市期间，日本静岡新闻报于1992年3月3日又以显著版面登载了丽水市（中国浙江省）代表团来三岛市访问的具体情况，刊出了三岛市长奥田吉郎会见丽水市代表团成员的照片，并以大号标题“以清澈的水为缘开展交流，热切期望进行姐妹都市间的合作”引读者注目。两地报纸反映两地人民的心声。代表团成员访问归来，始终牢记着自己的使命，强烈的责任心驱使着我们及时地认真地写出赴日考察访问情况报告。从1992年3月12日三岛市长奥田吉郎给朱大鹏市长的来信也表明了我们的访问是成功的。奥田吉郎对丽水地区开放、投资环境和丰富的资源，尤其是农副产品非常感兴趣，表示在适当时候组团来丽水访问，进一步推进两市交往。

在访问期间，我们利用休息时间在魏克禄团长主持下座谈讨论多次，具体地分析了日本之所以今天能成为世界上一个经济高度发达和

科技进步的现代化国家，是因为日本人具有特强的竞争意识，他们非常重视教育文化科技事业的发展。在国民经济预算支出中教育文化费用支出占国民收入的1/3，将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摆在首位，从而推动了科技与经济的长足进步。我们重点访问的三岛市，现在是个“水、绿、文化”为特色的城市，对教育文化和环境设施建设十分重视，在建市50周年时所规定的市民宪章明确要求市民努力奋斗，将三岛建设成为一个自然环境美丽，社会风气优良，文化教育发达，经济物质富饶，人民生活舒适，充满光明友爱的城市。在日本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日本人永不满足已有的，他们所追求的、想拥有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东西。

看日本、想中国，访三岛、看丽水，我们要更大胆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括苍有志，瓯江不息；丽水人肯定会有所作为，丽水市当然会大有希望！

回忆在杭州西冷宾馆做警卫的日子

叶水法

1964年1月，我参军入伍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浙江省公安部队驻杭州市北山街103号的警卫连，连队的主要警卫目标是西冷宾馆和花家山宾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修建于杭州西冷桥北侧葛岭山间的西冷宾馆，它以长方形的建筑造型，淡绿的外墙，依山而建，这在当时的城市建筑中，显得鹤立鸡群，特别醒目和壮观。同时，它与周围的胜境又十分协调。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革，如今的西冷宾馆早已不作为警卫重地，改名为香格里拉饭店而对外开放。

当时，西子湖畔的西冷宾馆是浙江杭州对内对外接待重要贵宾的高规格宾馆。1965年3月7日，由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陪同，到访杭州的巴基斯坦总统阿早默德·阿尤布·汗；1965年7月25日，



在西冷宾馆站岗

由朱德委员长陪同，到访杭州的索马里总统亚丁·阿卜杜拉·欧斯曼；1966年6月8日由李先念副总理陪同，到访杭州的阿尔巴尼亚总理穆罕默德·谢胡，他们都下榻在西冷宾馆。我先后担任武装警卫或便衣警卫任务。

每次外国首脑来杭州访问，都是从杭州笕桥机场出发，浩浩荡荡的二三十辆小车，经过杭州城区进入西湖北山街。当车队到达北山

街84号前时，中外元首便从车头插有双方国旗的红旗牌轿车上下来开始步行，代表团成员紧随其后。道路两旁站满了杭州市各界代表近千人，人们挥舞着花束彩带，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以及中外两国友谊的口号，中外元首边走边向道路两旁夹道欢迎的人群频频招手致意。当中外两国元首走上宾馆主楼高高的台阶，再次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气球腾空而起，和平鸽展翅飞向蓝天。

记得欢迎仪式特别隆重的是1966年6月8日，由李先念副总理陪同到访的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当年的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是中国的好朋友和老朋友。省、市政府以最高规格的21响礼炮欢迎他们的到来。当晚，还安排了省、市党政机关干部、部分工、农、商、学、兵代表，陪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一行，在杭州市人民大会堂，观看浙江歌舞团演出的采茶舞等精彩节目。我与十多名警卫战士紧随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执行安全警卫任务。

更使我终身难忘的是，196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里召开，我有幸参与对陈毅等中央领导人的内线近身警卫工作。4月12日，警卫连长曹洪谓通知我到西冷

宾馆的一号别墅，找省公安总队政治部干部科韩家齐同志报到接受任务。曹连长只对我说有重要警卫任务，没有说去警卫谁。这时，我们内心是紧张与兴奋并存，更多的是兴奋。我到了一号别墅，与韩家齐同志各自作了自我介绍，韩家齐同志是三位警卫人员中的负责人。接着他向我介绍了另一位组员。然后说：我们三人警卫的首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同志。而且，陈毅同志就往在一号别墅二楼东侧朝南的一间，我们三位警卫人员就往在下面一间。

陈毅同志和夫人张茜，当时正值陪同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及夫人王光美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回国就直接到杭州参加批判“二月提纲”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就是毛泽东主席在“文革”后期《致江青的一封信》中所提及的“杭州会议”。刘少奇主席及夫人入住三号别墅，与陈毅同志所住的一号别墅相距不足80米。

1966年4月13日，清晨多雾，我在一号别墅门口警卫值班，远处从天桥下走来一高一矮俩人，当他们走到50米开外时，我一眼就认出了是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江华同志，他在省委办公厅保卫科

科长汪龙和的陪同下，向一号别墅走来。我本能地迎面上前了几步，以示迎候。当江华书记与汪龙和科长走了跟前时，我说“首长好”，随后，江华书记便问：“小同志，首长起来没有”？我说，请您稍等，我打电话给首长的警卫。楼上的回复说陈毅同志已经起床洗漱，可以请江华同志上去。

接着，时不时地从楼上传出两位首长的讲话音和开怀大笑声，可以看出他俩的关系相当密切。后来，我从部队老领导口中以及翻阅相关历史资料中得知，他俩在1929年就已经是上下级关系了。当年，朱德同志任红军第四军军长，毛泽东同志是红四军党代表，陈毅同志是红四军政治部主任，而江华同志是政治部秘书，江华和肖克都是1929年参加陈毅同志主持召开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党代会的代表。

第一次近身接触陈毅同志，心情异常激动，内心也有些紧张，陈毅同志乘坐的伏尔加汽车在一号别墅门口停稳后，我立即为他开车门，并用另一只手挡住车门框顶部，以防碰头。然后，赶快拉开别墅的玻璃门，将门拉到90度角，但仍不放心，就双手紧握门把，以防回弹。首长上楼后，内心许久才恢复平静。

一天晚饭后，陈毅同志与夫人

下楼到天桥上散步时，见我在警卫值班，他就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问：“肖（小）贵（鬼），多大了？”我回答21岁，又问：“哪里人？”我说就是粟裕大将曾经在浙西南打游击过的遂昌县人。这时，陈毅同志打趣地说：“噢，那肯定是山娃娃啰。”我说，是的，我出生在山区的一个农民家庭。最后，他又问我什么文化程度，我回答只读过一年初中，他说：“部队就是一所大学校，是一座革命的大熔炉，要好好学文化，学本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陈毅同志的一席简短的问话与鼓励，虽已时过整整半个多世纪，但却几十年来经常回荡在我的脑海，一直激励着我为党的事业努力前行。

1972年1月6日，陈毅同志因肠癌医治无效，病逝于北京日坛医院。当中央广播电台播出陈毅然同志逝世的噩耗时，我正随师机关野营拉练行军在建德县梅城的乡间道路上，我们是从农村电杆上的喇叭里听到的，行军中的师机关干部都放慢了脚步，和我一样心情非常沉痛，为我党我军失去了一位卓越的领导人感到无比悲伤。时光流逝，岁月如梭。在西冷宾馆做首长警卫的日子一晃50年过去了，这种美好的记忆将伴随我的一生。

我所经历的丽水电影发展

龚禹鑫 口述 周率 记录整理

我叫龚禹鑫，丽水县太平区莲房乡季岭根村人（现莲都区雅溪镇季岭根村人），太公时由雅庄村迁至季岭根村。我出生于1936年农历八月，1957年丽水中学初中毕业后在宣平县柳城镇车昌小学担任了一年民办老师，1958年，考入金华师范就读，一年后，转学至丽水师范，时值大跃进，我们在校生，也要参加“大办钢铁”和“大办粮食”运动，忙于炼钢和种田。

师范学校毕业后，我先后在丽水县囿山小学、皂树小学教书，并担任仙渡乡小学老师团支部书记，后被选送至温州行政干校学习会计专业。1964年，我调至丽水县电影管理站（后改称丽水县电影公司）。整个电影管理站只有7个人，既要负责全县的电影管理，又要负责电影院的电影放映。



龚禹鑫年轻时的工作照

当时的丽水城区只有一个电影院，位于丽水城内三坊口文昌阁的丽水人民电影院。这里原来是文昌阁戏院，该电影院始建于1953年，只有750个座位，远远不能满足城区3万多居民的需求。

我在电影公司主要从事会计工作，但因人手不足，也兼职收票、放映工作。

那时，丽水人文化生活比较单一，很少有什么娱乐活动。我们一天要放五六场电影，白天晚上都要放映，特别是“文革”结束后，许多电影解禁，人们看电影的热情空前高涨，电影院 24 小时连续放映，实行停人不停机。文昌阁的电影院已完全不能满足群众的观影需求，在政府的支持



丽水三坊口文昌阁的人民电影院（1959年）

下，1979年在中山街新建了一座电影院，设有 1414 个座位，我还清楚的记得新电影院放映的第一部电影是朝鲜电影《空中飞人》。丽水放映的电影拷贝都由省电影公司统一调配发行，通过公共汽车托运至丽水，电影以《南征北战》《地道战》《万水千山》等革命题材的为主，电影票价在五分至一角，后来涨到两角。观众不仅有城区的居民，还有各学校组织的学生，城郊乡镇的农民。即使团体购票也没有优惠，能购得到票已算是照顾了。许多人因购票排队的时间过长，手里攥的钱都被

汗水浸湿，尤如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我在电影公司担任会计 17 年，1985 年改为从事放映管理工作。

刚开始时，丽水全县只有 5 支农村电影放映队，城郊、碧湖、雅溪、曳岭、丽云每个区各 1 支队，由国家创办。放映电影是一项比较艰苦的工作，一支电影队 3 个人，1 个队长，1 人发电，1 人放映。流动放映设备都需由人挑运，大部分村没有电，还需自带发电机，发电机使用的是汽油与机油的混合燃料，纯汽油容易造成设备损坏。在放映人员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吃百



丽水中山街电影院

家饭，睡千家床，寺院庙宇是我们挡风避雨的地方”。但放映电影也是一项受人尊重的工作，村里为了看电影，都会派人来抢着给放映队挑运设备。从1971年开始，有个别乡办起了电影放映队，后来陆续每个乡都办起遍了电影队，称为“乡办电影队”。80年代初还出现了私人办的电影放映队，全县共有了50多支电影队，基本普及了电影放映。当时有一种8.75毫米的电影胶片，因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携带，方便上山下乡放映。农村电影队的拷贝需到县电影公司租用，支付租金，所收费用大部分上交省电影公司，

丽水县电影公司提留管理费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部分电影被禁，有些还被定为“毒草”，只允许放映《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几部样板戏，但群众看电影的热情依然很高，因为实在没有别的什么文化活动。

在电影院里放映时一般采取双机轮流放映，使用的是35毫米胶片，中间不用停机换胶卷，流动放映一般只有一台放映机，中间需停机换片。

为提高电影放映人员的水平，省电影公司会举办一些培训班，还办有中专学历的电影放映学校。县

电影公司也会对乡村电影队的放映员进行培训，根据技术水平、工作年限，评定技术职称等级。

放电影不仅是文化活动，还是宣传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的手段，在电影放映前经常会放一些我们自己制作的幻灯片或放映一些十几分钟的新闻短片，宣传方针政策。放映员还发挥专长，表演快板或歌曲、戏剧，以多种形式开展宣传。

在我从事三十多年电影工作中，“跑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谓“跑片”就是把电影胶片从一个刚放完的地方马上送到下一个地方去放映。70年代时，丽水城里有三个地点可以放映电影，一个是中山街的电影院，还有一个是万象山脚的地区文艺会堂和四牌楼的丽水戏院，我经常在这三家之间“跑片”。改革开放后，群众观影热情非常高，我们实行24小时放映，许多人半夜还来排队看电影，人停机不停，机器经常因使用过度而发热。记得约在1986年的春节，为了让群众看到电影，我们都没有休息，只要哪里需要，我们就送片上门，我负责雅溪、曳岭片区的“跑片”。一天，在陈村（现属联城街道）放映完后，我带着片子前往老竹，正好遇到散场的群众回家，天气又下雨，我在乘

船过渡时被人群连人带片挤到了水里，我全身湿透，胶片也全湿了，我顾不上自己，只想着如何让群众能看上电影，我买了十几条毛巾，小心地将胶片上的水一点点吸干，通过放映机的热量烘干，才算没有耽误放映，第二天又带着片子翻山越岭送到太平、仙渡放映，就这样在外面四五天，在“跑片”路上过了一个春节，我也没有领额外的加班费，每天只领两毛钱和四两粮票的误餐费。

我于1996年退休后，也没闲着，发挥余热，一直从事文化系统老年协会和体育协会的工作。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随着群众文化娱乐方式的多样化，特别是电视机的普及，走进电影院观看电影的人越来越少，农村电影放映队逐渐解散。如今，丽水市区众多民营电影院如雨后春笋般的开业，国营莲都区电影公司（原丽水县电影公司）也将完成历史使命，丽水的电影事业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群众观影热情重新被唤起。

丽水中学迁建纪事

吴立南

如果让你想象一所学校一百年之后的模样，你可能一时说不上来。一百年，对于一个人来说已不算短；对于一所学校来讲，同样也显得不易。2001年，我站在丽水中学的校园里，看着这所百年名校的风貌，并有幸见证了这所名校的蜕变。

这是一个不大的校园，占地仅65亩。学校坐落在丽水老城区大水门与厦河门中段，大猷街与围山路之间的龙门岭，多好听的一个地名啊，这里原是处州府学，后改名莲城书院、崇正学堂、省立第十一中学、处州中学等。

校园的大门向西开，面向卢镗街，然后接入中山街。卢镗街不宽，但它是抗战时期为纪念抗倭英雄卢镗而命名的。丽水中学的校门也不大，甚至有些局促，但设计精致，

有个性，跟这所百年名校一样耐看。记得2003年时，为了报读丽中，大门外挤满了报名的家长，队伍队排的老长老长的。我的一个同学为了他的儿子能读上丽中，在卢镗街上排了三天两夜，把我借给他的一只靠椅也坐坏了，还好儿子终于被录取了。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了这所沉睡的历史名校，老校园得到了第一次较大的改扩建。1984年，新的教学楼“振兴楼”落成，设有24个教室。1985年，学校用位于如今大洋河小区的学农基地与丽华村置换，将学校南端的原学府塘所在的23亩土地建成运动场。将学校大门前的一段卢镗街也划入丽中校园，使教学区与活动区连成整体。此后，男生宿舍楼和学校西大门也

相继建成。

走进丽水中学的西大门，最吸引人眼球最能震撼我们心灵的，是南楼前的那丛高大茂盛的百年古树——两棵香樟和3棵重阳木，它们向四周伸展开来，撑起了一片历史的天空。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第一次从校门进入，立马就会感受到这所百年名校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积淀的深厚。

当然，心细的我站在振兴楼前，还能发现台阶前“振兴丽中”四个立体方块字。它不是用墨水临时写就的，也不是用石头刻出来的，而是用小黄杨精心培育修剪塑造出来的。它体现了丽中人的良苦用心和全力追求。作为丽中的一个新成员，

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一种图腾式的精神信念如那百年古樟根植于这块土地上。

抗战期间，由于日寇犯境，丽水中学曾经有过5次大搬迁。第一次是1938年的课堂大搬迁。为逃避日寇飞机轰炸，全校师生每天一早，从学校出发，步行15里路到水阁乡五洞殿，在山坡上搭建草棚，坚持上课，到下午4点之后返校。

第二次是分块大搬迁。1939年初，简师部迁到高溪借用祠堂、庙宇、民房上课，设为处中一分部。初中迁至石牛，为二分部。高中部仍留在城内上课。学校一分为三，办学艰难。

1941年下半年，由于日寇加紧



丽水中学老校园

了地面进犯，丽水中学进行了第三次搬迁。高中部也迁往高溪，与简师部一起称为处州中学校本部。办学条件十分艰苦。1942年春，日寇进犯丽水，丽水中学进行第四次长途大搬迁。全校师生跋山涉水，背驮肩扛，带上学校的图书、仪器和档案，步行500多里，举校迁至庆元县大济村庙宇里上课。抗战胜利，1946年，丽水中学迁回龙门岭，回到原址。虽然校园荒芜破败，但是香樟还在，重阳木还在，全体师生还在，学校开始了复建工作。

校友毛士龙先生在丽中百年校庆的回忆录《龙门岭的眷恋》中写道：龙门岭，是一条经文昌阁进入当年处属地区最高学府——处州中



学的小巷，1948年在这里聚集了处属十县到府城求学的三百学子。解放后，几经撤并，这所几经易名的学校1957年正式命名为浙江省丽水中学。1980年经浙江省政府批准为全省首批办好的18所重点中学之一。1996年通过省一级重点中学评估认定，成为丽水地区第一所省级重点中学。

丽水中学一直在努力着，也一直在期待着。

至20世纪末，丽水中学现有的办学条件和办学规模又一次成了丽水中学持续发展的瓶颈。仅仅65亩的校园用地，14899平米的校舍建筑面积，把丽水中学办学规模卡在了24个班范围里。学校设施除了在1997年、2000年先后建造的科技楼、图书馆外，其它校舍如振兴楼（教学楼）、三好楼（行政办公楼）、男女生宿舍楼等4幢楼房都是早年保留下来的砖混建筑，食堂由原来的礼堂加固改造而成，原来坐落在校园东南角的教工宿舍南楼已成为危房。学校的体育设施也十分简陋，1个300米的煤渣跑道田径场，3个水泥篮球场，1个钢管搭建的简易风雨操场。在新世纪里，丽水中学

的办学条件由于没有适时跟上，显得捉襟见肘，落后于时代，已远不符合省一级重点中学的办学标准。不要说与省内发达地区比较，就在丽水地区，也已落后于青田、遂昌、缙云等县中学的办学条件。

丽水中学需要发展。这是时代使然，城市之呼唤，市民之需求。

2000年7月丽水撤地设市，丽水中学发展的机遇来到了。2001年，时任校长陈志勇到任后，等着他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校园改扩建。

2001年11月，为了迅速改善丽水中学的办学条件，扩大招生规模，缓解丽水中学入学矛盾，市委常委会议提出“近期扩建丽水中学”的目标，确保在2002年高一招生达到14个班700名学生，总办学规模达到36个班，1800名学生。规划设计建设规模为总用地面积达到110亩，总建筑面积达到30589平方米，400米标准田径场1个。丽水中学根据实际情况，本着“一次规划，分步实施，尽力而行，优化发展”的原则，启动了丽水中学改扩建工程。

学校成立了扩建办，紧锣密鼓地开展老校区的改扩建工作。最艰

难的是教学楼改造，工地与教室就隔一墙，用时任校长陈志勇的话讲，就是螺蛳壳里做道场。经过近三年的奋战，一期工程于2002年4月5日正式开工，2003年3月1日竣工验收；在原校园内改造原教学楼2253平方米，扩建教学楼3173平方米；拆除原南楼危房，建造了陈列馆（兼行政楼）1397平方米，新建学生公寓4010平方米，总投资1194万元。二期工程于2004年11月20日开工，2005年12月5日竣工验收，在校园西北侧围山路以南大众街以东征收拆迁房屋面积5545.105平方米，占地面积5646.21平方米（计8.47亩），征收费用1214万元；扩建食堂及学生宿综合楼11073.78多平方米，工程投资960多万元。拆除原老旧礼堂（已改用食堂），对校园绿化景观进行了全面的改造。除了400米标准田径场由于东面民房拆迁困难未能实施外，基本完成了原址改扩建任务。丽水中学在走过了她坎坷的100年之后，旧貌换新颜，重新焕发生机。

由于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丽水中学经过校园改造和扩建，教学条件和校园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

善，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受到市民的广泛关注。而城市化建设的快速推进和社会经济发展，广大家长和初中毕业生对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的需求越发强烈。可以说，丽水市区以及一些县市的在校初中生以及他们的家长，几乎都有报考丽水中学的愿望。2003年夏天，学校大门外排了三天两夜的报名长队使丽水中学经受了无能为力之痛。2004年丽水中学实际办学规模达到50个班级，2500多名学生，严重超出了丽水中学现有的承载能力，是丽水中学暂时的无奈之举。丽水中学扩建后校园实际占地只有48979.76平方米（合计73.47亩），生均用地面积为19.59平方米，远低于《浙江省等级重点普通中学评估办法（修订稿）》中规定的省一级重点中学生均占地面积35平方米的标准。此外，丽水中学目前的学生宿舍、师生用餐、艺术教育、体育教学等硬件设施再次出现了短缺现象，远达不到示范性高中学校的各项指标要求。

为了扩大丽水高中优质教育资源，切实解决广大初中毕业生就读丽水中学难的问题，缓和社会矛盾，

实现省政府提出的“至2005年全省要基本普及高中段教育的工作目标”（指平均85%以上比例的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段学习），丽水市教育局组织丽水中学对学校扩容进行了方案比对研究。考虑到龙门岭周边民房密集，拆迁成本高，提出了丽水中学迁建方案。方案一：组建丽水中学教育集团，保留龙门校区公办学校36个班级，新建一个民办新校区60个班。方案二：实行丽水中学整体搬迁，规划建设规模96个班级，一期工程60个班，二期工程36个班。

2005年4月5日，丽水市委市政府召开了专题会议，决定丽水中学实行整体搬迁。2005年4月10日，市政府印发《丽水中学丽水职业高中迁建项目建设专题会议纪要》（〔2005〕19号），决定丽水中学为迁建项目法人，并负责迁建工程。浙江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浙发改社会〔2005〕646号文件批准丽水中学迁建项目建议书，并把该项目列入省重点工程。

丽水中学迁建工程选址在丽水市区城北，北环路以北、弄和村以西、新爱弄水库（即今绿谷庄园）

以东的白云山南麓坡地上。时任市委书记楼阳生亲自到弄和村后半山上勘察选址，正值傍晚，阵雨从白云山上下来，大家来不及躲避，淋湿了衣服。后来大家说起这件事，设计人员说这场雨淋了也值啊，选了一块风水宝地。所选用地，东边有弄和坑流过，西边与大猫窟相隔一条山梁，南侧底洼处积水成塘。可谓左青龙，右白虎，后玄武，整个地貌正符合了中国传统的勘舆风水学思想。一期工程按 60 个班级规模实施，总用地面积 200 亩（其中，

代征用地 25 亩），每班 50 人，共 3000 名在校生，全部实行寄宿制管理，总投资概算 1.8 亿元。

丽水中学迁建一期工程由浙江工业大学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设计。为了能建设一座与“百年名校”相匹配的新丽水中学，时任校长陈志勇带领我们考察了长三角一些高中名校的迁建项目，拟定新校区设计以“百年名校”为立足点，本着“整体规划、分期实施、适当超前、追求品位”的原则，把丽水中学新校区建设成为一所具有风格独特，



丽水中学新校园

校园文化深厚的园林式、现代化、有特色的丽水窗口学校，为争创国家级示范性高中奠定基础。校园总体规划根据坡地特点，渗透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现代建筑特色，体现了园林建筑风格。

校园分五大功能区，一条主轴，多层梯段，多级广场，合理预留山体 and 二期用地。构筑多样空间，提供多元多级的交流交往场所。

校前区及中心广场庄重雅致，天然山体与人造水景相互渗透与融合，借莲花荷叶结合山地设置跌落式水景，跌落式花坛，以丰富竖向空间景观，表达出莲城书院、丽水莲城之历史文化概念。同时体育活动区、校前广场区、宿舍区的建筑入口前均提供了形式不等的室外广场，力求景观和建筑的融合和相互呼应。校前形象广场、图书馆、门楼、文化广场等这些主导空间为中心景观带，使校园的绿化景观主题重点突出；而建筑组群间的庭院式绿地通过一些元素手法使学生参与其中，达到步移景换的视觉效果。

丽水中学迁建工程建安工程分两个标段，通过公开招投标分发包建设。时任市长刘希平代表市政府

为迁建项目与国开行签订了贷款协议，为项目落地提供了资金保障。2007年10月18日，丽水中学迁建工程正式开工，2009年8月10日顺利竣工验收。建成后，新丽水中学用地面积为116521.42平方米（计175亩），校舍总建筑面积76134平方米，有400米标准田径场1个，篮球场7个，排球场5个。建筑单体有：行政楼、3幢教学楼、实验楼、风雨操场、图书馆、4幢学生宿舍、教工宿舍、师生食堂等。

作为丽水中学迁建工程的参建者心里有苦也有甜。苦的是项目开头和结尾两件大事。土地征收工作是我们最薄弱的一堂课，缺乏做村民思想工作的经验。工作一开始，我们在村里几乎找不到说话的人，连征收办的老李同志也不受待见。陈志勇校长有句话叫做办法总比问题多。他非常了解村民的心思，叫大家不要急于求成，发挥做教师能说会道的长处，耐心做农民的思想工作。一回生二回熟，在他亲自带领下，不但把问题一个个解决了，还与村民们交上了朋友。清场时虽然有个别村民上来闹事，但经过村干部和街道办事处同志的劝解，顺

利完成了征收工作。

2009年，江滨区块旧城改造开始，丽水中学龙门岭老校区亟待置换给原江滨中学。可是，丽中新校区的绿化工程没有完成，特别是学校的出入道路被北环路建造后很难设计出一个便捷合理的方案。后来经与规划、交通部门再三协商，只能从北环路开挖一个豁口，通入紫金北路。可是这个工程没有哪个单位愿意承担，最后还是作为学校的配套工程落在了我们头上，由丽水中学自建。时间那么紧，任务那么重，事情那么复杂，既要挖公路凿坚岩又要回填沼泽，既要造路又要搭桥。审批、设计、协调、施工，日夜加班，路面的沥青还没来得及铺设，那边老校区已催着腾空移交了。风尘扑扑，风风火火，和着学校的绿化、水电，一边建，一边搬，一边用，一边改。最后还是按时开学了。

作为一名丽水中学迁建工程的建设者，最感欣慰的是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肯定。丽水中学迁建工程建筑规划设计方案优秀，功能齐全，设计造价节约，整体效果得到社会好评；施工符合规范，质量

评定合格。基本体现了既定的“经济、安全、美观、适用”的建设宗旨。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最宝贵的是我们的建设理念创新，建节约型项目。根据迁建工程山地特点，按梯级规划布局，场地平整挖高填低，土石方内部调整、内部消化，节约造价。改室外车棚为架空层，提高土地利用率。改体育馆为风雨操场，优化体育用房使用功能，兼集会和教学功用，提高了它的利用率。将计算机教室并入图书馆，兼用电子阅览之功用，扩大图书信息的综合性利用效率。建立厨房配置新概念，取消高能耗的油炉设备，分解为电能、空气源热能为主的厨房供应源，节能减排，降低运营成本。2010年，丽水市政府授预予丽水中学迁建工程为“撤地设市十周年30个精品工程”之一。

丽水中学迁建工程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筹建历时5年，2009年8月顺利交付使用，为江滨旧城改造和原江滨中学的撤并，以及新处州中学的成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使丽水中学教育教学硬件设施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为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奠

定了基础。丽水中学与同批次同规模的丽水市职业高级中学迁建工程的完工，缓解了丽水市区高中段教育的入学难矛盾。特别是丽水中学的迁建完成，成为了丽水中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也迅速扩充了市区普通高中的优质资源。

2012年12月，丽水中学迎来了建校110周年庆典，海内外共三千多名学子齐聚丽水中学，共商母校发展大计。丽水中学由此确定了“崇正尚智图强”的新校训，并明确了“以品为要、循道而行”的办学理念，以及培养“有情怀、有素养、有意趣”的高品质丽中学子的育人目标。

随着办学条件的全面改善，在教育教学改革的积极推进中，丽水中学的教育教学质量得到了全面显

著的提升。学校先后获得全国“和谐校园”先进学校、浙江省特色示范校、浙江省美丽文明校园等称号。学校高考竞争力不断提升。2011年以来，丽水中学高考一段上线人数实现了八连升。在2018年的高考中，全市高考总分前三名，丽水中学占据了兩名，一段上线人数达到453人，一段上线率超过62%。吴奇安、梅楚楚、陶乐天、肖旻煜昊等一批同学先后分别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录取；卢项尉、王叶晶等同学被中科大少年班录取。

丽水中学跨过了一百年的坎坷岁月，以崭新的姿态跻身于新时期的改革浪潮中，在市委市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下，从此得以向更高更远的目标迈进！

金逢孙先生二三事

蓝志龙

2018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3周年，各地都以各种形式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丽水市美术馆、市博物馆联合举办了抗战木刻运动史料展览，其中展出了金逢孙先生捐赠的大部分史料文献，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也牵动了我对金先生生前及去世后的许多回忆，今应莲都区史志办要求，将这些事写出来，让更多人了解著名艺术家金逢孙先生的往事。

文星陨落·浩气凌空

2005年2月16日，春节长假后第一天上班，我刚到办公室还未坐定。吴品禾主席急冲冲地进来告诉我：文联老顾问，金逢孙先生去世了，市委宣传部把金逢孙治丧事宜交给文联操办，这事交给你了。

听完吴主席的这番话，我先是一怔，自己年前还去市二医院看过金先生，还好好的呀，当时，我见他侧卧于病榻，因为长时间卧床，腰椎部位长了褥痔，神志也有些模糊，有时连自己子女都不认识。金先生之子金文志见我进来，就凑近先生耳边说，问他是否认识这位来看你的同志。我连忙向他问好，问他身体如何，他告诉我说，过几天就没事了。为了不影响他休息，我向家属了解了一些病情的事就离开了。现在闻讯先生病逝，未免感到有些突然。领导要我来负责操办治丧工作，心中不由一阵紧张。

我稍事镇静下来，立即按常规办事程序理了一下思路：

1、得马上去金家表示哀悼，并征求家属对治丧工作的具体要求；

2、应立即建立一个由领导、家属及相关人员组成的工作小组；

3、马上安排了解金先生情况的人员起草悼词，再由办公室人员起草刊发讣告。

当日下午，我们按家属的三点要求开始操办：一是出殡时间定于2月19日上午；二是联系金先生原单位贵州省某学校，向省政府办公厅、省委统战部、省文史馆、上海鲁迅纪念馆、中国美协以及与金先生一起参加过抗战木刻运动，目前还健在的老同志发出讣告。三是负责前来参加悼念活动的外地客人的

接待工作。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一个地方上的退休老人去世后，要与这么多著名机构和个人发生联系。同时也从中了解到金先生不为人知的一些信息，比如他是丽水市唯一的省文史馆馆员。他的逝世受到党、政、文艺界的关注，使得治丧工作非同寻常，不能有半点闪失。

我们首先碰到的困难是有的联系对象打不通电话，金先生已退休30多年，原单位知情人也已基本退休，杨可杨等老先生的电话也一时很难接通。我们费了整整一昼夜，



1933年上海MK木刻研究会部分成员合影（左起后排一为金逢孙）

终于通过各种渠道，与这些单位和个人取得了联系。如期落实了将来丽水参加悼念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从讣告发出日起，陆续收到省委统战部、省政府办公厅、省文史馆、上海鲁迅纪念馆、中国美协版画艺术研究会、贵州省某学校及杨可杨、万湜思等单位和个人发来的唁电。省政府办公厅、省文史馆、上海鲁迅纪念馆送来了花圈。省文史馆、上海鲁迅纪念馆派专人前来参加悼念活动。

2005年2月19日，悼念活动在丽水市殡仪馆举行，追悼会由我

主持，吴品禾同志致悼词。整个过程庄重肃穆，在悼词中，吴品禾主席对金先生在抗战木刻、民间美术搜集保护，以及对丽水美术事业发展所作的历史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得到了家属和参加悼念活动人员的一致认可。

德艺双馨·艺林楷模

金先生离开我们不觉已十多年了。回想与金先生的历次交往，心中仍然充满仰慕之情。

上世纪70年代末，我还是个懵懂的美术青年，1978年春在丽水举



金逢孙与夫人郑月圆

办个人小型展览时，曾得到他的莅临指导，原以为这样一位美术界名人（当时是丽水唯一的全国美协会员），一定架子很大，很难接近，想不到在徐君陶老师的引见下，他是那样的平易近人，他不仅爽快地答应前来参加开幕式，而且送了我一张富有他个人风格的《风雪黄山》山水画（可惜那张画在一次搬家时遗失了），对我的鼓励实在是太大了。

后来，我与金先生陆陆续续有过很多次交往，最有意义，最深入的交往还是2002年我调丽水市博物馆工作的那段时间。我到市博物馆上班的第一天，同事即向我通报了本馆正在进行的，关于接收金逢孙捐献文物和艺术作品的工作，同时要在近期为金逢孙出版《MK木刻画选集》。我心中暗自庆幸，一接手博物馆就有贤人来捐献文物，同时也从内心感谢馆里的同志所做的大量前期工作，更为有这么富有公益心的老艺术家而感到自豪。2002年5月18日，市博物馆在洞天楼举行了隆重的“金逢孙抗战文物和艺术作品捐献仪式”，市政府、市文化局领导参加了捐赠仪式，并先后

讲了话。对金先生无私奉献精神和抗战木刻的重要历史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表示要重视捐献的后续工作。不久，在市政府和上海鲁迅纪念馆的支持下，《MK木刻画选集》在省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实现了金逢孙先生积压心中70多年的夙愿。

关于编印《MK木刻画选集》的历史，还要上世纪30年代初，当年在上海艺术专科学校求学的金逢孙，积极参与鲁迅倡导的MK木刻画社团活动，并于1934年初承担《MK木刻画选集》的出版印刷事务。但就在1934年5月22日，即将付印的前夕，放在同学周金海宿舍里制好的画册模版被巡捕房抄走了，出版印刷工作流了产，好在送给鲁迅先生审阅作序的样本被鲁迅先生保存了下来，现收藏于上海鲁迅纪念馆，因而得以重新出版。《MK木刻画选集》的出版，使金先生心中那块积压了70多年的石头落了地，他终于完成任务了。从此，他的爱国热情更高了，他常说：“我老了，木刻刻不动了，画也不能画了，我只有把自己多年积累的东西仔细整理一下，捐给国家……”就

这样，他又陆陆续续捐出了几批东西，总共有 515 件套之多。此外还向上海鲁迅纪念馆捐出了一批珍贵的文献资料。

名称	组	件
木刻运动文物、文献	89	111
木刻版画、拓片	55	55
素描、速写	39	246
国画	67	70
题字、书刊、杂志	31	83
剪纸、皮影	317	317
合计		515

无私无欲·史册留名

金逢孙先生退休早，工资不高，生活一向清贫简朴，他不象当今一些所谓的“名家大腕”，满脑子装得是金钱物欲，他在世时，我常去他在梅山背和晚年在白云小区的住所，那都是尺不盈丈的斗室。只要有三人以上进入便转不过身来。房间内没有豪华的装修，更没有奢侈的陈设。最显眼的就是两架子排得满满当当的书刊画册。他一生创作过许多画作，有不少作品都在应酬中送人了。平时也有人上门求购，但售出的都是一般的作品，而把精品力作都留下来捐给了国家。

金先生一贯乐于提携后学，对每个向他求教的人，总是海人不倦，精心指导，且不收任何报酬。七八十年代，丽水地区的美术力量还相当薄弱，许多热爱美术的有志青年往往求教无门，都希望能得到一位学识全面、见多识广老师的指导，金先生就毫不犹豫地承担了这一角色。在他的悉心指教下，美术爱好者一个接一个地走向成熟。同时，他还凭借自己早年在上海艺专、北京荣宝斋、全国美协的学习和工作经验，为丽水群众美术的发展和队伍建设提出了许多好建议，好思路，被地区文联聘请为艺术顾问。

景秀山明的丽水大地孕育了一代又一代质高气正的文艺先贤，金逢孙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辛勤耕耘，不为仕途安享，只求以文教化，宏扬中华文脉。他有崇高的理想，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他的生命虽然有限，但他的精神却永远垂青于丽水文艺史册。

红色律师黄景之

括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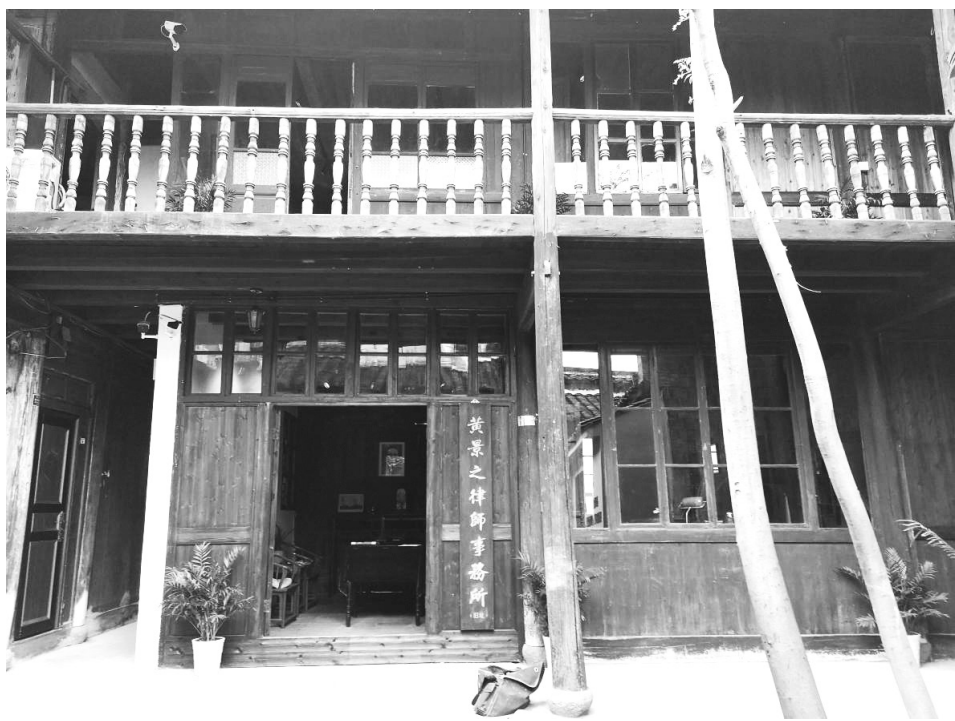
黄景之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历史上，有位被称为“劳工大律师”的工人运动领袖施洋律师。他是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总罢工的领导者之一，为革命牺牲是年仅34岁。在我们丽水也有这样一位与施洋律师经历相似的红色律师黄景之，他不忘初心，追求真理，放弃优越生活，不畏艰险，为了掩护浙江省委机关而献出

生命。

不忘初心 追求真理

黄景之出生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谱名开潮，字景之，学名希宪，其父亲黄品琳，为国学生，母亲杨氏。丽水县碧湖吴山坳村人（现莲都区碧湖镇大林村）。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黄景之跟随丽水碧湖一带著名的塾师高鹏学习传统启蒙经典，高鹏思想开明，尤受“戊戌变法”之影响，思想较进步，他勉励黄景之要追求进步，希望他将来能学习法律，以宪政改变中国社会，因而为少年黄景之取学名“希宪”。在高鹏的悉心教育之下，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黄景之考中丽水县学第一名秀才。



黄景之律师事务所旧址（2018年摄）

少年时的黄景之目睹旧社会的不公与黑暗，尤受启蒙老师高鹏的影响，从小关注地方利弊、民生疾苦，就立下为天下不事打抱不平的志向。清光绪末年，黄景之考入杭州的私立浙江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律。民国元年（1912），黄景之毕业后回乡，在丽水城内的府前创办“黄希宪律师事务所”，后又租用花园弄2号作为律师事务所办公室和一家人居住的场所。该宅的房东为戴炎，在外从事工程师工作。因院内有两个小花园，而被称为戴家

花园，这条弄堂也被丽水人称为花园弄。黄景之凭借扎实的法律知识和律师业务水平，很快成为浙西南一带著名的律师，在社会上有了较高的声望，1922年，当选为丽水县议会议员。同时，律师职业也为黄景之带来丰厚的收入，一家人过着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30年代初，黄景之还特意买了一架德国产蔡司相机用于家人的留影。

为民维权 不遗余力

黄景之作为一名执业律师，平



黄景之使用过的公文包和怀表

日急公好义，同情弱势群体，深得丽水百姓称赞。抗战前夕，庆元有一农民的土地被地方豪强所强占，农民为此不停上诉，直至浙江省高级法院，还是判处农民败诉。黄景之得知此事后，义愤填膺，帮助该农民将案件上诉至南京大理院，终获胜利。

抗战时期，黄景之长期义务担任由战时儿童保育会浙江分会主办的进步刊物《浙江妇女》杂志的法律顾问，免费解答读者来信，特别是回答关于妇女儿童的法律咨询，维护了妇女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受到广大读者的肯定和欢迎。

1939年第4期《浙江妇女》中有位名为沙雨的读者写道：“黄大律师，我看到你在《浙江妇女》上

解答我们姊妹的法律问题，实在使我感佩。您不仅在法律上作着正义的答复，而且激励了我们姊妹们在抗战上作着正义的答复和应有的认识。”

在黄景之牺牲后，《浙江妇女》杂志社特意刊发了《悼黄希宪先生》，表达对黄景之律师的敬意和缅怀：“本刊法律顾问黄大律师希宪，不幸于五月十八日，因猩红热症，在丽水宋（松）坑口医院逝世。噩耗传来，同人等不胜悲悼！先生丽水人，在丽执行律务，不但法学湛深，且热心公益，身为缙丽路股份两合公司董事，最近对于将缙丽路股款移办生产事务，更竭力赞助。本刊创刊时，即承先生慨允担任法律顾问，按期为各读者解答各

种法律问题，恳切详尽，不惮琐繁，实为本刊生色不少，今意溘然长逝，使社会失一栋梁，本刊读者失一导师，曷胜惋惜，特志数语，以表哀悼！”

接触新知 寻求真理

1938年春，在黄景之律师事务所旁的丽水刘祠街（现刘祠堂背）开设了一家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新知书店，店中有出售马克思、列宁著作，黄景之常出入书店，浏览书刊，买回《大众哲学》《毛泽东印象》《二万五千里长征》《列宁全集》《资本论》等进步书籍。他从这些书中刊里受到启蒙，不断寻找革命真理。中共丽水地下党员、丽水县委书记周源看到黄景之学习认真，同情革命，有一股爱国情怀，于是通过新知书店这个联络点，经常与黄景之聊天谈心，使其逐渐加深对国家、民族前途的认识，拥护团结抗日，拥护共产党的主张。

在地下党的教育和帮助下，1938年7月，黄景之经中共处属特委委员周源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吴樵，意为吴山坳的樵夫，愿为人民当樵

夫。周源曾长期借住在黄景之律师所内，并在此召开丽水县委会议、处属特委会议。

抗战爆发后，丽水成为浙江抗战的大后方，众多机关学校和难民迁至丽水。黄景之就以自己律师的合法身份为掩护，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工作，担任丽水县抗敌后援会副主席，积极为抗战筹措经费，为难民解决吃住。他经常到城区、碧湖等地进行救亡演说，发动各界捐款支持抗日，鼓舞群众的抗战情绪。即使在日军飞机持续轰炸丽水，他不得不回到老家吴山坳村躲避敌机轰炸时期，还每天下午二三点钟，就翻山越岭到十里外的南坑村和地下党员丘昔光两人一起办起了农民夜校，给农民讲解抗日救亡、民族解放等革命道理，夜里又摸黑赶回家。

黄景之关爱革命同志，尽力为同志解决生活上的困难，用自己的收入资助党的活动。有次周源患疟疾发高烧，黄景之知道后，立即去请来丽水的名医为其看病，还亲自买药、煎药，精心护理，直到病全愈。还有一次，丘昔光在南坑村患肺病吐血，黄景之特地回乡，以探望母

亲为名，去看望他，并找当地群众给他买为鸡蛋等营养品，为处在病痛中的同志送去同志关爱的温暖。

在父亲的影响下，黄景之的两位子女也都思想进步，先后参加革命工作。独子黄学圃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从小就有报国之志，考入省里第十一中学后，取字“稼轩”，立志要像宋代民族英雄辛弃疾（也是字“稼轩”）一样精忠报国。中学毕业后，毅然报名参军考入军校，在南京国防部兵工弹道研究所任中尉，1939年参加长沙会战遭遇日寇细菌战而殉国，年仅29岁。

1938年底，黄景之介绍在碧湖省立联合中学师范部读一年级的女儿黄素姬认识了碧湖儿童保育院的护士，地下党员、丽水县委书记蒋洽的夫人毛钦征（白天），在毛钦征的介绍下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并被推选为省立联合中学“民先”小组的组长。

为党工作 不幸牺牲

为便于领导全省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5月，中央东南分局指示撤销闽浙边临时省委和



黄景之妻子周玉梅与女儿黄素姬（40年代）

浙江省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刘英任书记。9月，中共中央批准浙江临时省委转了正式省委，刘英利用“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0月10日，通讯处被破坏，省委组织部长谢长青、青年部长赖大超等7人被捕。1939年3月中共浙江省委机关秘密从温州迁至丽水。为利于在丽水的秘密工作，便于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省委在丽水城区和城郊设立了10余处秘密机关和交通联络站。其中黄景之律师事务所作为重要的联络站。省委领导刘英、薛尚实、汪光焕等常到黄景之家中了

解情况，在他家与各地的来人谈话，研究工作。省委机关常在黄景之律师事务所召开各类会议，如省妇委会，省委宣传工作会议、省委机关的支部大会等。黄景之以律师身份，利用社会关系和业务上的便利，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财产，为掩护中共党组织活动，为了组织和同志的安全，黄景之夫妻和女儿黄素姬经常冒着风险，轮流站岗、放哨，掩护同志。还冒着随时会被国民党反动派查抄的危险将党的一些重要文件和资料在家中刻写、油印和存放。一次敌机轰炸丽水城，府前一带大街的房子被烧毁，新知书店也有被毁的危险，黄景之冒险从书店中抢出两大箱地下党的文件和材料，搬回家中存放。

1940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在丽水的各级党组织处境日益严峻，党组织考虑到黄景之为党积极工作的情况有所暴露，决定调他去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工作。但因黄景之年过半百，身体虚弱，积劳成疾，痔疮经常复发，为了去皖南途中方便，他决定再次动手术，治愈后立即出发。于时，前往驻松坑口村的浙江省卫生所割治

痔疮，在医治过程中，不幸被国民党特务暗害，于5月18日逝于卫生所，享年54周岁。

黄景之牺牲后，被家人安葬于碧湖镇堰头村（现古堰画乡景区堰头村停车场对面山脚）。夫人周玉梅在在不给组织增加麻烦，毅然带着女儿回到吴山坳老家，靠着几亩薄田养家。

1941年4月，中共浙江省委机关迁回温州。在丽水的三年时间里，中共浙江省委机关加强了全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与上海党组织的联系，建立了与上饶集中营被捕同志的秘密联系，加强了对各地特委的领导、巡视和联络工作；浙江地区的党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壮大，并领导全省各地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潮。至1940年底，全省特委数从1938年底的6个增加到8个，县委（工委）数增加到50多个，党员人数从6700余人增加到近2万人。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像黄景之这样默默为党工作，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的共产党人。

伟大精神 后人景仰

1950年，丽水专员公署专员



黄景之烈士墓

宣恩金亲手写了书面证明，确认黄景之为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1980年，黄景之正式被国家民政部确定为革命烈士。

纵观红色律师黄景之的一生，他从最初的一个希望以宪政救国，以法律主持正义的进步知识份子，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和党的教育，成长为忧国忧民，追求民族解放的共产主义者，并为了这一信仰，放弃优越的平稳生活，不顾个人安危，积极为党工作，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他身上体现了伟大的“浙西南革命精神”。

2005年3月，黄景之律师事务

所旧址与厦河刘英旧居、兴华广货号旧址三处省委机关旧址合并为丽水中共浙江省委机关旧址，公布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8月，丽水市司法局和丽水市律师协会从个人手中租下黄景之律师事务所旧址，布置《省委机关在丽水》《红色律师黄景之》展览，开辟成浙江省律师行业教育基地。12月，经全国律师行业党委研究，报请司法部党组同意，黄景之律师事务所旧址确定为全国律师行业党校培训基地，供来自全国各地司法系统的党员干部学习、瞻仰，接受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

悠悠军营六十载 默默年华铸丹心

罗 豪

抗战胜利之后，国人对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期望落空，国内战争再次爆发。由于独特的历史原因，有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被迫走上战场，拿起刀枪。周洪友就是其中之一。今年已经 92 岁的周洪友，他的生命可以分为截然不同的前后两段，前一段是农民，后一段是军人。在那个时代，谁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任凭时代的巨浪将他们抛起和摔落。但在这千千万万的普通士兵中，周洪友又是独特的“这一个”或少数的“这几个”，就像某些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一样，他显得如此普通而又独特。他的一生，就像一坛穿越几十时光的陈年老酿，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一个人与军营结缘近六十余年，这该是一份怎样的殊荣！



年轻时的周洪友

战争巨轮 改变一生

出生于 1928 年的周洪友，是丽水县雅溪区仙渡乡人（现丽水市莲都区仙渡乡）。仙渡乡是浙西南一个宁静的山乡，宁静得几乎与世无争。周洪友父母早亡，在 20 岁之前，他一直跟随哥哥务农，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他目不识丁，只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在 1948 年 1 月，

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当此之时，解放战争经过两年多的历程后，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根据国共力量对比和整个形势的变化，决定与国民党展开决战。而国民党由于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军队成建制地被消灭或投诚，开始大量从民间抽选青壮年投入到战场上，为其效命。仙渡当地的壮丁原本已经确定，但是保长接受一个被抽到壮丁人家的贿赂，强行用周洪友将他家儿子替换掉了。为此，保长给了周洪友的哥哥20块大洋作为补偿。20岁，20块大洋，一岁一块大洋的价格，使周洪友与过去的生活彻底告别了。

也就在这年的1月，周洪友和其他被抓或被买走的壮丁一起，从丽水出发，被送往浙江中部重要城市金华。不久，他们又从金华起程，到上海坐船前往锦州。当时的锦州对于国民党来说，可谓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随时可能被解放军攻占。周洪友所在的国民党军，师长是海门人，连长是温州人。师长不愿意打仗，他觉得刚刚将日本人赶出中国，整个国家都百废待兴，为什么

还要中国人再打中国人？因此他就经常消极怠战。师长如此，部下更是如此。当时周洪友遇见一个浙江老乡，是兰溪人，已经当了几年兵。他得知周洪友想回家，就谋划着一起逃跑。当时周洪友初到北方，水土不服，生病住院已达半年之久。兰溪老兵就趁周洪友住院之机，带着他一同逃出医院。当时的锦州到处都是国民党兵，他们刚逃到火车站，就被抓住了。抓回去之后，遭到一顿毒打，屁股也打烂了，被关了3个月。这3个月对于国民党来说，战事已经急转直下，不可收拾了。周洪友也借此躲过了充当炮灰的厄运。

后来周洪友所在的部队被从锦州一路南下送到了上海，在上海，他们迎来了解放。周洪友随后几年的简历是：1949年5月，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陈毅29军教导队学员；同年12月，254团警卫连的战士；1950年4月，水手二中队学员；52年8月，85师船管团战士；1952年9月，预科学校学员；1953年1月，海军一航校修理厂学习钳工；1955年1月，海军一航校一团修理车修理当机械员。在福建厦门

时，当时的28军、29军、31军隶属陈毅将军，作为攻打台湾的先头部队驻守此地。在争夺金门的战役中，由于海水突然涨潮，解放军只有木船，无法运送后续援军过海登岛。周洪友他们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民党的游艇包围了金门岛，上岛的一个营一千多名战士得不到援助，寡不敌众人而壮烈牺牲。

此时，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28、29军被调往朝鲜作战，厦门只留下31军和29军的一个团，收复台湾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那时候他们经常开着巡逻船在海上巡逻，已经从进攻变为防守了。由于对海况不熟悉，巡逻船经常会撞上礁石，无法开动。周洪友就和其他战士一起跳下海，靠人力把船推出来。

1951年，周洪友在厦门前线由葛德胜介绍火线入党，入党后志愿书也随即烧毁。在这一年周洪友的《干部功劳事迹登记表》中记载了他的两件事。一件是进军福建时周洪友在教导队，6月部队从上饶出发行军至南平的进程中，大队部年纪很小的司号员腿痛走不动路，掉队了。周洪友看到后，就背着他走

了几十里路，帮助他赶上了队伍。另一件事是，自上饶至南平的路上，不论部队驻在哪里，或停下来吃饭过夜，他都一贯地帮助老百姓挑水、打扫卫生，深受群众好评。周洪友作为一名解放军战士的生涯，很快就结束了，他很快就迎来了几十年的军工生涯。

机械生涯 勤恳多劳

周洪友学习钳工技术并逐渐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机械师是这样开始的：1952年9月进入海军预科学校七大队当学员，学习钳工技术。同年10月入海军一航校一大队当学员，次年1月入海军一航校修理工厂。周洪友学习钳工技术前后不满一年，即于1953年7月进入海军航校锦西场站修理厂，成为一名钳工机械员，一边参加工作实践，一边继续学习提高。

在修理部队中，周洪友一直小有名气。这一切源于他不仅修理技术好，而且肯动脑筋，会想办法，并有一种乐于助人的精神。在工作上，他一直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上级领导有什么指示，他从来不打折扣，必定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

在日常工作中，周洪友总是干劲十足，是修理队里有名的“老黄牛”，工作简直就是他的生命。锦州的冬天气温非常低，要在跑道上迎着寒风开展维修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为了御寒，他们就随身带上干辣椒，身体冷了就嚼两口。研磨飞机发动机的进、排气门的工作是一项非常繁重而往往时间又很紧迫的工作，但周洪友每次都能按时完成任务，从未因为自己的原因而耽误过飞机飞行。他为了保证飞机的飞行，经常加班加点。有一次研磨发动机的汽缸，他已经整整干了一个上午。因为是两台发动机，汽缸较多，他就提出挤中午的时间来干，以确保及时完成任务。车长要求他吃完午饭休息一会儿再接着干，但他吃了午饭后立即投入到工作中去。完成工作任务时，已经大大超过了下午的上班时间。车长觉得他工作时间太长、太疲倦，要求他回家休息。但他仍然坚持工作，一直到下午下班才回去。

除了工作有干劲之外，周洪友还爱钻研业务，改进工作方法，深得领导和工友的肯定与赞誉。有些工作，经他改进方法后，效率得到

大幅度的提升。比如研磨汽缸的工作，是一项很繁重、很容易累的工作，工作一会儿就需要休息，不然胳膊就受不了。自然，这样做做停停，很费时间，工作效率是较为低下的。为此，周洪友就仔细琢磨了一段时间，想出一个办法。于是他在工作之余的时间里，利用报废的汽缸练习左手的研磨能力。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之后，他的左手也能和右手一样研磨汽缸了。这样，他的一双手就能轮流研磨，节省了大量时间，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

周洪友虽然是钳工，但他并不满足于仅仅会干钳工的活。为了帮助其他同志完成修理工作，他主动学习修理螺旋桨的知识。由于他没有修理螺旋桨的基础，于是不懂就问，并不断地观察其他同志的修理工作，认真学习和琢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他就能顺利地完成一般的螺旋桨的平衡工作了。在1954年的换季工作中，周洪友主动提出帮忙维修飞机起落架的工作。他只用了小半年工夫，便熟练地掌握了这项技术。此前，研磨尾轮支架是用螺旋桨起子转着研磨的，很容易发生打偏的问题。周洪友向领

导提出制作一个磨尾轮铜套的工具，使尾轮支架的研磨非常稳固，彻底解决了打偏的问题。

新中国直到1954年才具有自主生产飞机的能力，当时组建空军的飞机基本购自苏联。由于缺乏自主生产能力，周洪友所在训练基地的飞机，原本规定每架飞机只能飞300小时，但是却被他们人为地延长到1800多小时。司令员到基地视察工作的时候，了解到一架飞机要飞1800多小时，就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认为，飞行员的生命非常宝贵，不能让不安全的延时飞行的飞机上天。后来周洪友找到合适的机会进行反映，司令得知事情真相后，不禁大为感动和赞扬。以当时的条件，周洪友和其他同事一起，以自己最大的努力延长飞机的飞行时间。他们凭借自身的努力，硬是将飞机的飞行时间延长到原来的6倍，这简直就是奇迹！

经过四年的学习和实践，周洪友已经能完成一般的钳工技术修配工作，并能研磨M-11发动机气缸及完成对B-501-B-81螺旋桨的一般维修（延长寿命及排除一般故障），能维修RK-1飞机起落架。

1956年，由于表现出色，周洪友被评为“二级技术能手”，技术等级为四级。到了次年裁军时，周洪友复员了。由于考虑到周洪友这样的技术人才的稀缺，领导找他们谈话，留下了包括他在内的9名技术骨干人员。9名技术人员后来又有人陆续离开，只剩下2人，周洪友是其中之一。后来周洪友被任命为小组长，每年会有18个新兵被分配到他的组里接受他的培训。那时候他的组里共分四个工种，分别是钳工、车工、焊工和附件工，周洪友精通钳工、车工和附件工。

50年代末，由于苏联专家突然撤走，造成飞机修理人才的严重缺失，很多技术都无人掌握，飞机部件的维修难以为继。上级的要求是，无论如何，飞机不能停下不飞。当时的周洪友是技术骨干，但是文化知识水平非常低。在参加解放军之前，他是文盲；参加解放军之后，接受了一定的文化教育，文化程度也只是初小。仅凭着这么点文化知识水平，以及一股子不服输的干劲，周洪友开始啃飞机的维修说明书。这些说明书，有拉丁文、阿拉伯文、英文、俄文，周洪友没一个是认得

的。于是他就拿来工具书，一个词一个词地查出来，一句话一句话地去拼凑，一点一滴地弄懂修理步骤和逻辑。最后，在他和工友们共同的努力下，曾经面临变成昂贵的“废铁”危机的飞机，又重新翱翔于蓝天之上，守护祖国的华北大门了。在周洪友1964年的“自我鉴定”书后面，上级给出的意见中指出他的缺点时说：个性较强，有时表现有点骄傲情绪。但是这句话恰好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周洪友出类拔萃的修理技术，即使在强调集体主义的时代，也是值得他自己产生那么一

点具有自我色彩的“骄傲情绪”的。也正因为这句话，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他不是革命样板戏中塑造的“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个性的可爱而平凡的人。当时的支部给他的结论是：工作积极负责，钻研性好，干劲大。

周洪友是新中国第一批飞机修理技术人员，他们在我国一穷二白的时代里，用自己的勤恳和智慧，开拓进取，为我国建立起自己的维修人才队伍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建设的功臣。在几十年的军工生涯中，周洪友多次立下二等功、



周洪友与战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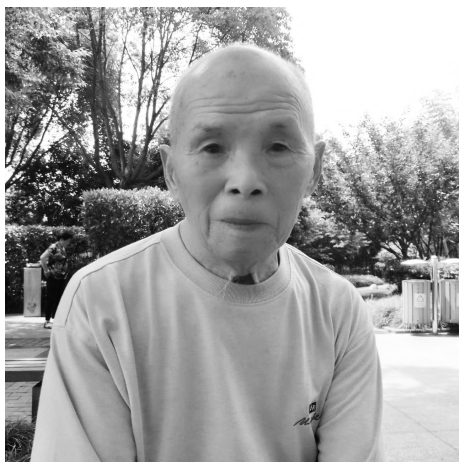
三等功。在他即将离开一航校一团工程大队之前的1980年的一份《职工升级审批表》中，基层意见一栏里有这样一段话，可谓他这几十年工作的写照：周洪友同志思想稳定，工作安心，对工作认真负责，有丰富的航修经验和熟练的专业技术。关心部队的业务建设，积极搞好以老带新，服务态度好。

周洪友是个热心人，常以助人为乐。在大部队大院里，他也是最闲不住的人。每到周末，别人都游玩去了，他却在院子里摆开架势，帮各家各户修理自行车、缝纫机、闹钟什么的。那些家庭机械类物件，到了他的手里，无不迅速恢复往日功能。因为这一手神奇的技术，大院里的孩子都特别钦佩他，和他特别亲近。很多年后，大院里长大的孩子来看望他，想起当年的情景，都唏嘘不已，有的说着说着就忍不住眼泪掉下来。

耿直老兵 一生无悔

周洪友性情耿直，恩怨分明。他一直记得当年害得他远赴险地的保长，说恨不得狠狠打他一顿。但是当他回到丽水后，却听说那位解

放前的保长，已经在文革中挨了批斗，有一天从树上掉落到水中淹死了。周洪友一声叹息，也就不说什么了。周洪友在部队里也是如此，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事当面说，有意见当面提，不会藏着掖着。正因为如此，当年在部队的时候，还有人说他喜欢发牢骚，对上级工作安排不满。周洪友谈起那段往事，也颇为感慨。他说，后来大家相处久了，了解了他的性格，才给他正了名，认为他有时候发点“牢骚”也不是没有道理。周洪友印象比较深的是，当年在部队里，不论大会小会，不论人前人后，只要一心为公，提意见是家常便饭。被提了意见的，不论是将军还是普通战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会记在心上，更不会挟私报复。那时候大家职位有高低，但是人人平等，相互尊重，氛围特别好。周洪友至今还记得，有一次军长到部队看望大家，一个小兵冒冒失失地撞上了，当他发现是军长时，赶紧向军长敬了个礼就慌忙跑了。军长让人把他叫回来，告诉他：我要向你回敬军礼，革命军人，人人平等，你敬我不等我敬你，这可不对。然后，等他端



老年周洪友

端正正地向小兵回了军礼才算完。周洪友认为，部队里这种相互批评、相互尊重的优良作风应当一直坚持下去，它对我党、我军和国家建设都会起到重大作用。

地方生活 闲逸多趣

1984年，周洪友退休后异地安置回原籍，当年即被丽水军分区聘用，直到2008年才离开。前后算下来，周洪友在部队里总共待了将近60年。一个人为部队服务60年，这在我军的建军史上，恐怕是非常罕见的了。

在和周洪友聊天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他对往事可谓如数家珍。尽管已年过90，但他的记忆仍然十分准确，不少地方连他女儿都记混了，

但他仍能准确地说出。在他家里，周洪友还拿出一个银白色的类似于脸盆的东西给笔者看，他介绍说这是废弃的飞机头，被他敲打出来的。这应该是他非常珍贵的藏品了。临走前，周洪友拿出一个盒子，倒出一堆精致的毛主席像章给笔者看，粗略估计足有五六十枚。他说这都是他在部队里自己制作的，还送了两枚给笔者留作纪念。

笔者想，应该是六十年的军营生涯铸就了这样的周洪友，他的真性情，他的一片丹心。告别时，和老人握了手。老人说，有空来玩。笔者想，一定会再来。

一切为了村民

——记里东村村主任李五兴

任迎春

“不瞒你说，我的心情是到了今天，才稍微好一点。”这是里东村村主任李五兴，见到我时说的第一句话。一说完，他的双眼就蓄满了泪水。

我于2015年11月21日，就是里东山体滑坡事件发生后的第9天，在人来人往的里东村委办公大楼里，见到了李五兴。出乎我意料的是，李主任是个一说到动情处就



里东山体滑坡救灾现场（摄于2015年11月）

流泪的男人。下面，就是李主任跟我述说的抗灾经历，期间，他无数次的动容流泪了……

2015年11月13日夜晚10点左右，莲都区雅溪镇里东村村民主任李五兴，象往常一样，这个时间点就坐到床上去看电视了。这是他一天中最为惬意的时刻，也是他人睡前的日常动作，因为他每天睡觉前都要先看会儿电视的。

当晚，他把电视的声音开得很小，因为他的妻子正抱着不满周岁的外甥，在房间里来回走着哄小家伙睡觉。为不影响小外甥的入睡，李主任简直就是在看“哑剧”电视了。

11月13日夜晚10点20分之前，细雨蒙蒙的里东村，跟平时一样，一切都是安宁平静的。

突然，一阵清脆的石头滚落声，从纯粹的单音“唰…唰…唰…”，变成巨大的“滚顿滚顿滚顿滚顿……”的混合音。

这石头的滚落声，犹如一把犀利的剪刀把里东村宁静的夜幕撕裂开来，让李主任心中一颤。

紧跟着，相继传来的就是响亮而清脆的木头等折断声……接着，

进入耳膜的就是一声沉闷而巨大的山石泥土混合压盖的声音……这瞬间爆发出来的一系列声音，让李主任冥冥之中，感觉村庄出大事了……

里东村原名岭东，位于莲都区西北部、雅溪镇东北7.5公里处，是由上半村、下半村等6个自然村组成的。里东村整体村域面积约7平方公里，村庄占地面积150亩。全村现有户籍人口1550人，其中，常住人口600人，外出务工人口950人，姓氏以李姓为主。里东中心村现有住户368户，户籍人口总计820人。穿村而过的金丽温高速公路和丽雅公路，犹如一把撑开的剪刀，把里东中心村的上半村和下半村隔离开来。上半村位于西侧的门前山山体，2012年检测为地质灾害点后，山脚底下13户村民的房子就全都搬离了，只剩下7幢空房。2015年2月开始，政府就进行里东村滑坡治理工程建设了。据了解，2015年11月13日晚当地并没有太大的降雨，平均降雨量只有6到8毫米，但之前的降水量大，截至13日上午8点的数据显示，近24小时平均雨量36毫米，有13个

站点超过 50 毫米。

李主任所在的是下半村自然村，凭借第一感觉，他认为村庄出大事了，就是门前山的山体滑坡了。于是，他就第一时间，穿好衣服，跑到把下半村与上半村间隔开来的金丽温高速公路和丽雅公路的交叉口，发现全长 120 多米的金丽温高速公路涵洞，全都被泥土淤塞了，自然的，丽雅公路也被泥土堵塞了。此时金丽温高速公路，俨然，就成了一堵隔开了下半村和上半村的严严实实的城墙。只见，上半村那边下着绵绵细雨的天空里，火光闪跃，不时，响起一阵阵的爆炸声……

这时，李主任确认上半村出大事了。于是，他就禁不住大哭起来了，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村支委武勇仁，叫他赶快用广播通知全村村民，出来抢险……

紧接着，由于金丽温高速公路和丽雅公路交叉的涵洞口，全都堵塞了，李主任只得爬到下半村山后与高速公路连接的栅栏处，用力撕拉开来，跑到高速公路上去看，下半村和上半村里电线全都断路了，漆黑的天地间闪烁着电线碰撞发出的炸裂声和火花，潮湿的空气里弥

漫着刺鼻的电线烧焦之味……黑暗中，李主任就听到上半村那边传来的，一阵阵撕天裂肺的哭叫声……他用手机电筒一照，发现，上半村靠近西边一侧山体的 10 多幢房子，全都被山体滑坡冲下的巨大的泥土石掩没了，原本从高速公路下面流淌而过的大坑，突然间，被山体滑体的泥石堵塞成为一个堰塞湖，溪水倒流，浸漫了上半村的半个村庄。

这时，李主任站在高速公路上，就打电话给雅溪镇镇长孙海波、副镇长张挺，分别汇报了突发的灾情。领导要求他，第一时间开展转移灾民、组织抢险等工作。

当李主任从高速公路栅栏处，返回到下半村时，发现大坑的溪水，已经倒流到上半村最上游了，且从第一个涵洞口流出，直接流到下半村来了。于是，他就立即跑回家里，抱来一床棉絮，塞在李春祥家的通水口，因为，这个洞口水是直接流到村子中央去的。

面对这突发灾情，李主任觉的转移灾民是最重要的，于是，他就叫当晚留在村里的村双委所有干部和党员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第一时间帮助村民转移。一开始，

大家想到的转移地点，是下半村里处于村子上面的大会堂，就是2015年刚刚建成的农村文化礼堂。当晚，让李主任感动的是，在这危难时刻，留守在村里的村干部和党员，全都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当晚，从村口大道通往大会堂的交叉路口，白天正在进行电线埋设施工，刚挖了一个大洞。为防止人们在转移时跌倒坑洞里，党员武东衡点燃了一根蜡烛，一直站在坑洞旁边给村民们照明指路……当晚，村里85岁的瘫痪老人李志祥，就是第一生产队长李胜和村民李伟平，轮流着背到大会堂的。村中不肯离家避险的87岁李振琢和老伴，夫妇俩就是村里党员干部尽力劝导下才撤离的。虽然，后来根据领导要求，把灾民安置地点改到村庄最下面的李氏祠堂，由于大家齐心协力，全村300多人，全都在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到指定地点。

当晚，正当李主任忙着转移村民时，他自己家里也进水了，家里的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等家用电器等全被水浸泡了，为此，他妻子打电话叫他回家，帮忙把这些物品搬到二楼去。“我哪有时间回

去！”这就是李主任给妻子的回复。于是，李主任家里一楼所有的家用物品，全都被水洪水浸泡了。

第二天，丽水市和莲都区立即启动地质灾害特别重大一级响应，成立了山体滑坡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下设抢险救灾、医疗救护、交通保障等10个专项工作组。李主任作为村干部，先是帮助安置各个工作组的办公地点，如把法律咨询组安排到村民李建兴家办公，把通讯指挥组安排到村民李胜家办公等。看到公安指挥组没有带来电脑，李主任就把自家的手提电脑，拿给他们用。其次，是给村里所有受灾的村民们，及时发放各种生活救援物资。因为那几天寒风冷雨的，气温很低，受灾的村民们特别需要各种生活物资。当然，李主任作为当地最熟悉情况的村干部，最重大的一个任务，就是在受灾现场当救援指挥，具体帮助指导救援人员确认各个受灾家庭所在的准确位置。

灾后的日子里，李主任一天到晚就如“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地忙碌着，有时在村里帮忙发放物资，有时到受灾现场具体指导救援。到16日，即灾后第四天傍晚，

他突然感觉自己两脚迈不开，眼睛红肿得睁不开，这时，他才发觉，自己已经三天三夜都没睡过觉了，也没有吃过一餐饭了，三天来只是在肚子饿时，碰到什么就吃点什么了……这时，村民李光贵看到他红肿的双眼，就送他一瓶眼药水。直到此时，李主任才拿着眼药水回家去休息一下。

作为里东村的村民主任，李五兴很理解村民们失去亲人的痛心感觉，作为一个生于里东长于里东的村民，他更是深切同情村子里那些突然遭遇灾难而离世的乡亲们。每当他想起，曾经跟他一起建设里东村美丽乡村的两个村支委，即58岁的吴志根和60岁的陈君香时，他就心痛的泪流不止。从14日到21日

里，每当记者采访他时，每一次他都会数度出现哽咽难语的状况。为此，在11月19日，即村民遇难的第七天，按照当地风俗，家人要在头七这天举行亡灵祭奠仪式，他非常理解乡亲们祭奠遇难者那份伤悲而急切的心情，最后，通过沟通，让村民们统一集中于村庄的最下面，即下半村的水口处，悬挂着“死者一路走好！”的横幅，以焚烧冥币、祭祀品等方式，进行头七祭奠仪式。

“作为村干部，接下来的工作，如安抚工作、安置工作、重建工作等，没有一样是轻松的。但不管多难多累，我的宗旨就是用心去做！”李五兴说这话时，语气平静又有力。

政界和学界联手点燃了“五四”导火索



五四运动因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而起，众所周知。但这个消息是如何传回国内，又是如何在北大等高校中引起激烈回响的呢？恐怕很多人不甚了了，有些人知道但是介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又不愿意把话说透。那么，“五四”导火索究竟是怎样点燃的？

祸起“安福国会”选举

说起来，这一切的一切要从段祺瑞驱逐张勋，再造共和说起。

段祺瑞再造共和屈经黎元洪之手解散了第一届国会一直没有恢

复，期间虽然段祺瑞跟梁启超、汤化龙的研究系合作，组成了临时参议会作为临时代议机构，但是，对于段祺瑞来说，根本的解决，是选出一个听话的国会。

段祺瑞想要一个听话的国会，而研究系想要在未来的国会中成为第一大党，两下同床异梦，但从表面上看，却是同一个梦。后者设计选举方案，前者下本钱操办。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皖系另起炉灶，第二届国会选举开锣。具体操办者，是段祺瑞门下第一号谋士兼大将徐树铮。

说起来，对新国会的选举，梁启超和他领导的研究系，出了很大力气。研究系的前身是进步党，在民国国会，进步党是除了国民党之外的第二大党，系从晚清的立宪派发展过来的，在各地颇有根基。张勋复辟，梁启超以他那支生花妙笔，在引导舆论方面，给了段祺瑞的支持，随后研究系和段祺瑞的蜜月期开始了。段祺瑞再造国会的意图，也得到了梁启超的大力响应，新国会的体制，乃至选举办法，也是梁启超等人一手设计的。

研究系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

张勋复辟之后，原来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势力，已经不成形了，残余势力，多南下去了广东。新旧交通系固然财力雄厚，但不像一个政党，也没有太大的政治抱负，国内能够称得上是政党的就剩下研究系了。因此有望在新国会的选举中，独占鳌头，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林长民曾对张国淦说过，他们此番动作，就是为了在选举中争多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因此一直对段祺瑞迁就姑息。然而，对于新国会，徐树铮却根本不打算让研究系置喙。徐树铮用了属于传统权术的两手，很轻易地就把研究系击垮了。一是金钱收买，一是利用他能控制的督军强行干预。

这样，经过瘦身之后的国会，安福俱乐部大获全胜，拢共两院472议席，安福系获得335席，占71%，研究系仅得21席，不足5%，中国政治虽然号称黑幕，但其实很透风，研究系中人不是傻子，自然知道自己是怎么败的。梁启超、林长民等人在心灰意冷之余，对皖系失望之极。自张勋复辟以来唯一跟皖系结盟的文人政客集团，从此分道扬镳。

徐世昌用梁启超掣肘段祺瑞

1918年10月10日，在安福国会的操纵下，徐世昌当选为大总统。就任伊始，他便宣称：“今我国民心中之所注意者，目南北统一。世昌以救民救国为前提，窃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

要完成这样的宏愿，对于这位手无实权的“文治总统”来说谈何容易！且不说列强环伺，虎视眈眈，仅凭手握重兵的段祺瑞一句话，顷刻间就可让他位置不保。

虽然徐世昌的总统之位全赖段祺瑞之力，但他并不喜欢做段的傀儡。为了制衡段祺瑞势力对中央政府的控制，徐世昌着力拉拢在政界有广泛影响的梁启超研究系，以及具有强大财政实力的旧交通系。

也就在徐世昌稳步进行政治布局之时，“巴黎和会”的召开给他提供了一次“重新改造中国”的难得机会。欧战结束，美、英、法诸国并不希望一战期间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一个包括各种军事政治力量组成的、对列强各国平等开放的、和平统一的中国，

比一个单纯效忠听命于日本的皖系军阀独裁、南北对峙的中国，对他们更有好处。

而在徐世昌看来，日本一国独大，必将支持段祺瑞武力征服全国、恃威专权，而一个各种力量相互制衡，“以夷制夷”的局面，对他维持统治无疑是最为有利的。

在梁启超的建议下，徐世昌给自己专设了一个外交委员会，原外交总长汪大燮任委员长，林长民为理事长，委员有熊希龄、朱启钤、孙宝琦、李盛铎、王宠惠等，也多为研究系中人。这一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为总统提供有关巴黎和会的政策、方针、措施，处理某些外交事务。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段祺瑞控制下的政府外交有着明显的亲日倾向，徐世昌想以此来制衡段祺瑞势力对外交的控制。林长民建议徐世昌派梁启超赴欧洲，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及记者的身份，与各国著名人士联络，进行会外活动。徐世昌欣然应允，并主动为其筹集旅费。

南方政府代表率先指责梁启超“卖国”

当时中国国力衰弱，外交失败在明眼人眼中已经注定了；但是国内几大政治势力都有自己的小算盘，都希望自己的政敌来背这口黑锅。

最先发难的是代表广州政府参加巴黎和会的专使王正廷，他在四月初发回国内一封电报称：“吾辈提议于和会者，主张废止二十一款及其他秘约不遗余力，推测日本之伎俩仅有二途：日引诱，日用武，然皆与正谊公道相违，必不出此。但吾国人中有因私利而让步者，其事与商人违法贩卖者无异，此实卖国之徒也。所望全国舆论对于卖国贼群起而攻之。然后我辈在此乃能有讨论取消该条件之余地。”

随之国内就掀起了一场针对梁启超的谣言风潮。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致电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闻梁启超在欧干预和议，倾轧专使，难保不受某国运动。本商有鉴于此，特电巴黎公使转梁启超，文曰‘巴黎中国公使馆探送梁任公君鉴，我国之国际和会已经派专使，为国人所公认。君出洋时声明私人资格不涉国事，乃中外各报登载君在巴黎近颇活动，甚谓有为某国利用倾轧

之说，明达如君，当不至此。惟人言可畏，难免嫌疑，为君计，请速离欧回国，方少辨明心迹，特此忠告，勿再留连’等语，即乞转专使，注意大局，幸甚。”

4月5日，广州国会开两院联合会，议决：一、由两院函请军政府，立即下令通缉梁启超，并将其在籍财产没收，另由军政府要求法公使引渡；二、由两院电唐绍仪，请一俟和议复开，即要求北京政府将梁拿交法司，依刑律所定外患处断；三、由两院全体成员通电全国省议会、商会、教育会、各报馆及除日使以外之各国驻京公使，驻广州领事，申明梁在巴黎卖国活动为全国人民所共弃；四、以两院全体名义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请严斥梁启超，并声明两院决定为其后援。9日，广州国会全体成员通电全国，宣布梁启超卖国罪状。

梁启超作为研究系领袖自然不可能坐以待毙，他祸水内引，当然也为了报安福国会选举的一箭之仇，把舆论矛头转向国内的皖系安福国会，以及交通系的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

梁启超祸水内引 徐总统顺水推舟

得到日本逼签消息，梁启超马上电报国内，通知总统府国民外交委员会的理事，也是研究系的大佬——林长民（林徽因的父亲）。据林长民事后回忆，他随后在总统府一科员那里又探得政府同意使团签约的回复，于是立刻在研究系报纸《晨报》上爆料。然而林长民口中所谓的“小科员”不是别人，正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

5月1日，林长民经徐世昌同意，立即通过外交协会致电巴黎，希望中国全权代表不签字。随即国民外交协会成员连夜起草三份文件，进行抗争。随后，林长民满怀激愤写下《外交警告国民书》，于5月2日在《晨报》上发表。文章称：

“呜呼！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以定议于内折冲于外者耶。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任公电，乃证实矣。……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该文刊

发后，北京、上海、山东等地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拒签和约斗争，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收到7000多封国内警告电。

有意思的是徐世昌事后还在段祺瑞面前装得“毫不知情”，还在段祺瑞与“安福国会”面前上演了一出与林长民“割袍断义”的活剧，气得段总长跳脚。

总统府与学界惺惺相惜五四运动终于成行

如果说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的话，那么徐世昌此时则有意点燃了这根引线。

5月2日，国民外交协会理事蔡元培召集北大各班班长和学生代表一百多人开会，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转告在座学生。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和国民社的许德珩、张国焘、邓中夏、段锡朋等很快做出决定：明晚召开全校学生总动员大会，串联北京各大学学生，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集体罢课示威；通电全国，呼吁工商界和市民罢市、抵制日货等等。

当天，在总统府，徐世昌的外交委员会已决议拒绝签约，汪大燮、

林长民将致电代表团拒签电稿送呈徐世昌总统，徐阅后交给国务院准备拍发。不料国务总理钱能训却密电命令代表团签约。恰巧林长民有位同乡在国务院电报处工作，连夜将消息透露给林长民，林当即又向汪大燮汇报。汪大燮得知后十分焦急，5月3日凌晨，他匆忙去找蔡元培。蔡元培听后大为震惊。当天上午，他召集罗家伦、傅斯年等部分学生代表到自己家里，通告情况。5月3日这一天，自晨至夜，蔡元培东堂子胡同的家中人流如梭。他再三嘱咐，在行动时一定要严守秩

序，以免为政府干涉落下口实。5月3日晚，北京各校学生代表在北大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第二天举行游行示威。

由此观之，如果没有当时大总统徐世昌、政界巨头梁启超、林长民、学界泰斗蔡元培等人的密切配合，五四运动大约很难形成历史上那样大的规模。当然世事无常，五四运动最终没有像徐世昌、梁启超等人期望那样只是成为政客手中的武器，而成了一场轰轰烈烈，影响中国百年的事件。

选自《特区青年报》

“处州”命名缘由再议

杜浣溪

今日的丽水市，上古至中古称括苍；隋朝先称处州，后改括州；唐代一度称缙云郡；中唐大历十四年（779）至民国，几乎一直沿用处州，前后达1200余年。

关于区宇取名的方式，明成化版《处州府志》卷第一有云：

古来有郡名也。秦废封建，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或取名于列宿，或立号以山川，或不易封域之旧称，或率循贤人之姓氏。取用不一，名用以殊。

上古取区宇名为“括苍”，其缘由是“立号以山川”：

括苍 因山而名。山在缙云县东七十里，又名苍岭。与台、婺为分界。其脉发自闽建，过景宁，经龙泉，历遂昌、宣平，至缙云而特起，松阳、云

和诸县皆在其盘屈之内。诚一郡之领要（管领，统属）也。（出处同前）

隋唐时，区宇取名为“括州”，则是

以山多栝木为名。木，柏叶，松身。（出处同前）

“缙云郡”的取名，曾有两种说法：

缙，赤白色也。旧志云：昔尝有云出于塘，故名。及见《政和志》又云：古有缙云氏，盖以官名也。（出处同前）亦是“率循人贤之姓氏”：

缙云氏，姜姓也炎帝（神农氏）之苗裔。当黄帝时，任缙云之官也。（《左传集解》引东汉贾逵语）

至于郡名“处州”的取名，

则缘于“列宿”，谓二十八宿（列星），即根据“星宿分野”来命名：

按旧志云：故老相传，隋时因处士星见（现），置处州。

所谓旧志，《名胜志》当是其一。其志有云：

隋开皇九年（589），处士星见于分野，因置处州。

而清《一统志、处州府、山川》亦云：

以郡应少微处士，故山名曰少微，州曰处州。

关于“星宿分野”说，早在上古已有之：

天有列宿，地有州域。（《史记》卷二十七《八书第五·天官》）

《周礼》保章氏以星土辩九州之地，故所封域皆有分星，所以观妖祥、验休咎也。

盖星者，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治乱成乎政，而妖祥见于星象，人事得失

于焉可考。（明成化版《处州府志》卷第一）

《周礼》即《周官经》，为儒家经典之一，是战国时代的著作。

它表明远在春秋战国时代，占星家就根据天界的星宿（星次，即星座）

的区域，来划分地面上的邦国、州郡，使它们互相对应起来。因而，就说某星次是某邦国、州郡的分星，某某星宿是某某邦国、州郡的分野。星宿分野，开初是按列国来分置的。《淮南子·天文训》和《史记·天官书》，曾将二十八星宿对应东周十三列国及汉武帝时十二州的地域之分野。如南斗为北斗之南地域之分野，牛宿为越国之分野，女宿为吴国之分野；后来又按各州郡来分配，如尾箕为幽州之分野，牛女为扬州之分野。

处州……于天文属扬州，斗分为牛女之次，上直少微处士星，故以名郡。

（明·何镗总纂《栝苍汇记》卷之一）

仰观乾象，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之位也。一曰处士，明大而黄，则贤士举。在昔有隋，处士星显，因置处州。然则，吾州素号多士，衣冠文物之盛，得非星分之应耶？（何儋书《应星楼记碑》）

隋开皇九年，我郡治南的大栝山直接对应天界少微处士星座，而

处士星“明大而黄，则贤士举”，“衣冠文物”隆盛，因而，就将大栝山改名为少微山，将古栝苍更名为处州郡。

古代的星象学，又称占星学。它原是探讨天体对生物与无生物的作用，以及它们对天体的影响力。占星家创立的“星宿分野”说，主要是为了观察所谓“妖祥”（吉凶）的天象，以占卜地上所配州郡、列国的祸福。由于当时科学水平与历史条件的局限，古人把天象的变化与人间的福祸紧相联系，误认为天象的变化预示着人事的吉凶。因而迷信所谓“天人感应”与“天象示警”。

在今天看来，“星宿分野”说是与某些宗教迷信相联系的，缺乏科学根据：一是星宿有时“所占度甚广”，过于宽泛模糊，其指配的分野并不准确。有时又过于支离繁琐，不免穿凿附会；二是天体在不停地运行，斗会旋转，星也要移位，其位置并非固定不变。占星家为了配合占星理论而对天象进行占测，其说法难免不根而疏谬，因而并不可信；三是天象与人事没有必然联系，更没“因果报应”之关系。“治

乱非天也”，“治乱非时也”，“治乱非地也”（荀子《天论》），“治乱成乎政”，决定于“人为”。

古人对于“星宿分野”的具体指配，既然有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解释，那末古代作品在写到某个地域时，连带而写到和这个地域对应的星宿，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不足为怪。王勃的《滕王阁序》：“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南郡、南阳、汝南、淮阳、六安、九江、庐江、豫章、长沙都为翼宿、轸宿之分野）地接衡庐”；李白《蜀道难》所吟“扪参（参宿——益州）历井（井宿——雍州，即今陕西及甘肃大部分）”；刘长卿《瓜州驿奉饯张侍御》中的“星象衔新定，风霜带旧寒”等，都是从分野意义上提到这些星宿的。

也正因为隋时处州“郡应天文处士星”（毛桓《游少微阁》）“少微星明则贤士进，遂创贤星楼”（清雍正版《处州府志》卷十六）唐朝就在少微山建起少微星君祠以祀星君；北宋元祐年间关景晖就在处州南园建起少微阁，以对应天上少微列星；过后，才有钱筇“少微阁应少微星”诗句；南宋嘉祐年间，郡

首崔愈在大溪北建起应星桥，还“就桥立屋”；开禧年间，王庭芝造起应星楼；明朝设有德星坊、星华坊，应星坊，通惠门城楼造有少微星君祠，还将处州称为贤星郡……这些都是处州分野星宿说引发而生的纪念性建筑。

新近，看了市报文章和听了《探寻应星楼》电视片的说词：

古人常以天上的星宿来指配州郡，当时江苏浙江一带，处士星分野，所以就以处州为州名。（《“丽水”之名的由来》，2018年10月28日《处州晚报》）《栝苍汇记》明确指出：“处州……上直少微处士星，故以名郡。”怎么能说成“江苏一带，处士星分野，所以就以处州为州名（唐时称郡，宋代叫州）”。这分明是张冠李戴，误将南斗对应的九州之一的扬州与牛、女星（越国、吴国）对应的之分野，作为“处士星分野”：

前汉《地理志》云：吴地，斗分野也，今之会稽等郡。晋《天文志》：自斗十二度

至须女七度，为星纪吴越之分野。《会稽典录》云：上应牵牛之宿。（明成化版《处

州府志》卷第一）

将处州作为少微处士星分野，与台州为三台星分野、婺州为婺女星分野，均是以星宿指配州郡，而不是以星宿指配郡国。

天上的每颗星，同地上的每个官员、各级官员都要有对应，从帝王开始都有对应。……

少微共有四星：处士、议士、博士和士大夫。处士是他自己修行，他不关心社会上的事情；议士[是]要表达出来，议论出来；博士就是专门人才，而且特别有才能，有发明创造的专业人才。士大夫就是通过科举进入朝廷做官的人。（华中师大历史文研究所一位教授语，电视片《探索应星楼》同期声）

这已不属“星宿分野”说，而应给它冠上“星宿分官”说，或“星宿分人”说，似乎更契合。古代民间有传说：天上一颗星，地上就有一个人。人活在世上，天上的星星时刻照看着你。这是古人劝导人们要检点自己的行为，努力行善积德。传说当为无根之游言，实不可信。近现代科学，有以人名命名星宿，那是他们在天体中新发现了星星，

因而就以他们的名字来纪念其科学发现。名称与他们没有对应关系，与其职位与品德并无任何联系。

少微四星的命名的时间，应该是早在西汉。当时取名为处士、议士、博士与士大夫，仅为星座的标识，并不一定赋予很深厚的内涵。处士与其后含义“有才德而隐居不仕者”、“德盛者”无关，更与“他自己修行，不关心社会上的事情”无干系。议士，在古汉语中无词，什么“议士要表达出来，议论出来”，完全是以今解古。博士，古时称“通晓古今，能言善辨之人”，或古代学官名称。所谓“专门人才，而且特别有才能，有发明创造的专业人才”，那是今人的理解，与星座“博

士”是风马牛不相及。士大夫，原指“古代官僚阶层”，“也指有地位有声望的读书人”。说什么“士大夫就是通过科举进入朝廷做官的人”，就在当今解释也不科学，有点想当然。读古文要谨慎，必须了解其出现的时代背景，注意语言环境，看清前言后语。有些内容不宜故作复杂与艰深，作泥古不化的穿凿，将事物牵强附会。

传统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与根脉。尽管精华当中不免杂糅有糟粕，需要我们去批判与剔除，但仍须有虔诚感恩的心素，恭谨敬畏的态度，冷静而客观地对待，千万不能随意任性，横加曲解，以致产生以讹传讹的恶果。

浙江抗战的金融奠基石

——记抗战时期浙江地方银行在丽水印制和发行的纸币

孙卫武

在中国货币史上，在丽水曾印制了中国最小的无纪年官方纸币横式壹分、贰分和伍分，它是在抗战最艰难时期，日寇飞机狂轰滥炸丽水城的烽火岁月里，浙江省政府为应对战时困难命令浙江地方银行在丽水临时印制和发行的零钞，为抗击日寇侵略、筹集战时军备、稳固敌后经济起到了中流砥柱的基石作用。



位于杭州中山中路 149 号的浙江地方银行旧址

一、浙江地方银行南迁情况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者的铁蹄随即踏上了浙江大地，12月初，时任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出于战略考虑，认为“浙省境内，恐难有安全地区。绍兴离杭州太近，宁波、临海、温州均沿海，敌人极易登陆，金华、衢州，有浙赣路可通，丽水地僻浙南，只能在此三地中择之。”为保存实力有利抗日，以浙江省政府为首的党、政、军首脑机关一路南迁金华永康等地，12月24日上午，杭州沦陷。1938年1月，省教育厅、省建设厅、省交通管理处、省警察大队、省战时救护总队等南迁丽水。1941年5月，日寇进犯诸暨，向金华逼近，黄绍竑即发特急密电重庆：“委员长蒋来电，敌寇近窥浙东，分路窜扰宁绍及沿海各区，方岩迫近前方，行政设施难期便利，为谋居中策应，正向松阳撤退，冀协机宜。除分呈外，谨先电，职黄绍竑叩。敬印”，随即，浙江省政府自永康县方岩乡南迁至丽水松阳县。一大批省级机关、学校、工商企业、各民主党派、各界社会名流随后也纷纷南迁涌集丽水、松阳、云和、龙泉、景宁、庆元等各县，至此，

丽水从一座古老的偏隅山寨小城一跃成为当时浙江省战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区浙江省指挥中枢。

杭州沦陷后，浙江地方银行总行随省政府机关南迁，辗转兰溪、永康，于1939年4月到达丽水，随着战事发展，于1942年6月被迫再迁云和、龙泉，直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返回杭州中山路太平坊原址。1947年3月，浙江地方银行改名为浙江省银行。

抗战时期，浙江地方银行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中，战争与国土的沦丧带来的是业务范围急剧萎缩，业务对象大量流失，经营环境严重恶化。空前严峻的挑战中也蕴藏着新的机遇，浙江地方银行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和前所未有的挑战，银行董事会冷静理智地分析了当时的局势，采取了一系列较为正确且颇具开拓性的措施，富有成效地推进了业务的发展，在该行历史上，可以说写下了值得称赞的新篇章，如配合政府全面抗战，兴办战时生产事业，稳定经济金融秩序，发展后方抗日力量，抵制日伪的金融经济侵略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贡献甚巨。

浙江地方银行于1935年在丽

水设立办事处，1938年改为支行，行址在继光街284号。浙江地方银行总行南迁到丽水后，行址设在文昌阁陈诚私宅（今丽水市图书馆附近），全行职员、工、警200余人。同时，普设机构，除将原丽水支行扩为分行外，又先后在龙泉、松阳、青田、云和等县设立办事处，遂昌、缙云、景宁、宣平、庆元等县设立分理处，嗣后，还在丽水碧湖、缙云壶镇、龙泉小梅等地设立办事处。至此，浙江省第七专区（即丽水地区）所属十县都建立了浙江地方银行的分支机构，全面接管省、县金库资金的收支调拨，办理存、放、汇业务，代理中央银行发行和兑付救国公债、同盟胜利公债等债券，辅翊政府推进浙江抗日游击区金融财政之建设，积极抵御敌人金融经济之进攻，一时业务骤增，金融业务空前繁荣。

二、抗战时期的浙江地方银行

浙江地方银行随浙江省政府撤退到浙西南山区丽水后，成为了浙江金融界在抗战中的骨干银行。为了适应战时环境，浙江地方银行在总经理徐恩培的领导下，大胆打破常规，走上了一条特色化的发展道路，为支援浙江抗战起到了中流砥

柱的作用。除一般业务外，由常规的金融业务转为着力开拓经营实业，从事物资贸易，实施农贷等领域，不仅抵制了日伪的金融经济侵略，而且为浙西南部山区经济的发展和后方的物资供应做出了显著贡献。

浙江地方银行原有总管理处及总行两项组织，抗战前总行在杭州对外营业，1942年，日军占领丽水后，浙江地方银行先后撤到云和、龙泉等县。环境变更，为便利管理，1943年1月，经董事会决议，省政府核定，重新修订章程及组织大纲，浙江地方银行自2月1日起，将原有总行组织取消，扩组总管理处总揽全行事务，总管理处由董事长、常务董事、总经理组成，董事长、常务董事未经改选，由董事会推举董事长暂行兼代总经理。总管理处依例不对外营业，惟原有总行及撤退后归并各行处存放款暨汇兑等未了业务，仍暂由总管理处业务部接洽办理，将来视存户需要及手续便利情形，陆续移转各分行处接办。而龙泉办事处也为适应环境，于2月1日扩组为分行，简称泉行，直属本处。浙江地方银行在调整机构的同时，积极恢复业务，其中吸收

存款就是银行的主要业务之一。

浙江地方银行除在浙江省内分设分支行外，还在上海设有分行。在抗战期间，浙江地方银行积极吸收游资、开拓资金来源，以保障银行的其他各项业务顺利进行。

在全面抗战的八年中，浙江地方银行随省政府颠沛流离南迁丽水山区，并一直作为全省敌后金融市场的主力开展业务，为促进未沦陷区经济发展，维持和支撑省级机关开支，支持敌后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在丽水印制和发行的中国最小幅纸币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二次世界大战东、西方两大主战场战事惨烈，国际铜价也因此一路飙升，导致国内铜材紧缺，中央造币厂造币数量骤减，但在市面流通中，铜元却在贬值使用，1939年8-10月间，二百枚铜元只能兑换法币壹元，若要兑换成银元，则需要三百枚铜元，所以老百姓对铜元多有藏匿不出之风，江浙一带市面上辅币不足的现象渐益呈现。

杭州沦陷后，日伪为了从国统区劫掠铜材用于制造军火，暗中支持奸商大量套换铜元、镍币，导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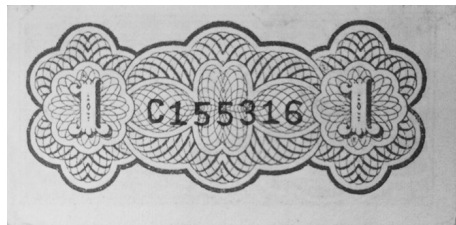
市面上的金属辅币更加匮乏。20世纪80年代末，在日本长崎近海上打捞出二战时期沉船“三星丸”，船上载有三千万枚中国铜元，重约270吨，掠夺数量之巨，令人咂舌。商家为了维持生计，只得以针线、火柴、糖果等小商品代替找零，有的商家甚至还以小面值的邮票代用，但这些应急措施远不足以应付辅币缺乏带来的困难，于是，商家只好自制筹码替代找零，有的商家使用竹条签，上面烫刻商家名称和金额以充找零替代使用，只有少数上规模的商家与公司利用民间锡、镞等材料铸造代用铜币，这些筹码虽受商家资产信用担保，但由于形制不同而无法通用，商民为此怨声载道。

鉴于市面零币短缺，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于1938年2月签发手令，命令浙江地方银行迅速印刷辅币券五百万元，从1939年5月24日开始，先后六次发行辅币券和一元券共2700余万元，以缓解市场辅币券不足，促进国统区与外界物资交流，打击汪伪政权的经济侵略。由于当时纸张来源十分困难，浙江地方银行因地制宜，利用原印钞厂废弃的边角白纸条加以印制，设计了中国之最的特小型钞票壹分、贰分、伍

分面额的横型辅币，于1940年在丽水白云山脚的信大印刷厂承印，同时还委托设址于丽水县浣溪乡沙溪村叶家祠堂的上海大东书局浙江印刷分厂印制一角、二角、五角和直型的一分、二分、五分共6种纸币。自此，浙江地区的辅币灾荒转瞬化解，财经秩序趋于稳定，对推进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支撑作用。

横式壹分券票幅尺寸为50×25mm，横式贰分券票幅尺寸为52×25mm，横式五分券票幅尺寸为54×30mm。票面无纪年，相当于两张邮票大小。

信大印刷厂在印钞的同时，还印制了浙江地方行甲、乙两种储金券，面值有伍拾园、壹佰园、伍佰园、壹仟园，背面印有“存额表”，



浙江地方銀行印制的一分紙幣

即利率表，这是一种抗战时期的后援金融证券，为维持政局稳定，吸收游资，调节金融，充裕资金，以保障抗战军需民食，由政府推出的一种准货币，它产生于财政收支极大悬殊，举债度日和中华民族浴血抗战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为抗战时期的浙江经济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浙江省金融志》载：“1941年4月，日军飞机轰炸丽水，徐恩培因躲避的防空洞塌陷而遇难”，该防空洞在市区西南侧万象山脚处。徐恩培殉难后，总经理一职由原副总经理唐观源（广东香山人，留学生）继任。1942年6月24日，日军小菌江旅团及奈良支队分路进攻丽水并一度占领，浙江地方银行总行已先行撤退云和，后转至龙泉。两家印刷厂均于1942年停业，遣返职工并一度解散隐蔽，直到抗战胜利后该行才重返杭州复业。

在丽水印制的浙江地方银行壹分券为中国最小幅纸币票，是在国难当头，条件极其艰苦、印钞纸张极度匮乏的特殊情况下设计印刷的，因此，它是历史留给丽水最宝贵的金融文化遗产金色名片，值得我们珍惜。

四、浙江地方银行在丽水开办的印刷厂

抗战时期浙江地方银行在丽水开办的印刷厂有两家，一家是信大印刷厂。1940年浙江地方银行在丽水市白云山脚自办信大印刷厂，印制有价证券及一分、二分、五分面额的横型辅币，1942年4月并入浙江印刷厂。另一家是浙江印刷厂。1940年至1942年，总行委托上海大东书局浙江印刷分厂（对外称浙江印刷厂）在丽水县浣溪乡沙溪村叶家祠堂印制钞票，除一元券外，还有一角、二角、五角和一分、二分、五分（分币为直型钞票）等面额辅币。浙江地方银行先后数次发行地纸币，大部分是由上海大东书局雕版印刷。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上海大东书局创始人沈骏声预感到局势的严重，早已将部分设备及材料运往香港，后因抗战后方各省印刷民国法币需要，又从香港分迁到湖南衡阳、江西赣州、四川重庆等地分设印刷分厂。为了承印浙江地方银行发行的纸钞，于1938年初，派姚濼梅、徐志道等业务骨干到丽水择址，在碧湖商贾士绅阙大钧和浣溪乡士绅陈绶的撮合下，选址定在丽水城西沙溪村设立上海大东书局



浙江地方银行在丽水印制的五分币

浙江印刷分厂（暨印钞厂），厂长由姚濼梅担任，随后联系各分厂调派技术工人连同机器设备，当时随迁人员有近400人，共有机器设备如下：12匹马力木炭引擎1部、鲁麟机1台、凸版机二号架2台、四号脚踏架4台、轧光机1台、凹版机8台、裁纸机1台、电镀槽1个、锅炉1台、烘房1座和鹏骑牌汽油汽车1辆。除了凸版机同电镀制版以及发电设备外，其余均是手工操作设备。经过紧张地搬迁、安装，于1938年春开机为浙江地方银行印制纸币。1942年7月上旬，上海大东书局浙江印制分厂由水路转至龙泉县梧桐口临江村，后撤至江西赣州分厂。

印钞厂技术工人由上海同赣州分厂调派而来，其中以宁波、绍兴人为多。训练生、粗杂工、女工则从丽水、碧湖招收，其中不少是丽水启明石印局同织布厂地遣散工人。这家分厂除为浙江地方银行印制纸

钞，也印刷印花税票。厂内部设有两部六组四课三室。两部为生产部、后勤部。六组为凸版、凹版、制版、烘湿、点验、整理。四课为：会计、保管、材料、庶务。三室是警卫、医疗、理发。分工协作，各司其职。印钞版是由该书局地技师，根据银行方提供方案，由技工精心雕刻而成（或银行方提供已制作好的钞版）。经过审查后呈报省政府财政部门核准，印钞厂根据银行指示同批文，开机印制纸币。印钞工是经过严格挑选，印钞用原材料如纸张、油墨均是特别指定地专用材料。印制纸钞，从制版开始到最后装箱发运，共有 40 多道工序。开印时，总行另派监印官王渭滨驻厂监督印制情况。印刷出来的纸钞是半成品，经裁切、打印号码后，再打包运到城内三坊口总行。由印钞厂专职印鉴工在总行的监督下，加盖“董事长章”、“总

经理章”（该两种章平时封存总行保险库内）后才是成品钞票，可以运去各支行发行。

沙溪村的叶家祠堂现惜已毁，白云山脚信大印刷厂具体旧址也因年代久远暂时无法确定，希望有一天能将浙江地方银行生产经营旧址列入丽水抗战遗址群并加以保护和纪念，让湮没在历史硝烟中的民族斗争遗址重现其昔日的风貌。

五、浙江地方银行在丽水印制和发行的纸币品种汇集

抗战时期浙江地方银行在丽水印制和发行纸币共计 11 种，票面简洁精美，深受群众喜爱。特别是横式壹分、贰分、伍分券，是研究浙江抗战史、货币金融史、地方史的重要实物资料。现将浙江地方银行在丽水印制和发行 11 种纸币列表如下：

序号	面值	颜色	年份	票幅 (mm)	图案特征	暗记特征
1	壹角	绿 / 兰	1936 年版， 1938 年印制	95 × 53	雷峰塔	正面：“B” 背面：“B”、“I”
2	贰角	兰 / 绿	1936 年版， 1938 年印制	100 × 55	六和塔	背面：“大”、“Y”、“L”
3	伍角	红 / 兰	1936 年版， 1938 年印制	120.5 × 59.5	中山公园	正面：“大”“伍”、“东”、“书”、“张” 背面：“B”、“A”、“局”、“大”、“东”

序号	面值	颜色	年份	票幅(mm)	图案特征	暗记特征
4	壹分	兰/绿	1938年	66.5×41.5	直式币	背面：“王”、“J”、“二”、“大”、“T”、“东”、“E”、“Y”
5	贰分	绿/兰	1938年	67×41.5	直式币	正面：“L”、“大”、“E”、“东”、 背面：“大”、“东”、“E”、“L”
6	伍分	红/兰	1938年	67×45	直式币	正面：“O” 背面：“玉”、“L”、“J”、“Y”
7	壹元	兰	1939年	133×74	放鹤亭	正面：“二” 背面：“G”、“H”
8	壹元	兰	1941年	123×61	放鹤亭	正面：“大” 背面：“大”
9	壹分	绿/兰	1941年	50×25	横式币	正面：“大” 背面：“大”、“东”、“E”、“L”
10	贰分	兰/绿	1941年	52×25	横式币	背面：“E”
11	伍分	红	1941年	54×30	横式币	背面：“大”

备注：各面值品种暗记特征有异，表列内容仅供参考。

抗战期间，浙江地方银行在丽水印制和发行的纸币，正值日机轮番疯狂轰炸丽水，致使机关、学校、工厂、民居、庙宇等大量被毁，特别是在丽水印制的中国最小幅纸币，见证了血雨腥风的残酷战争年代丽水人民所进行的坚忍不拔斗争，是在抗战非常时期为稳定地方经济，抗击敌伪侵蚀，充实抗战力量而进行的经济反击，浙江地方银

行在丽水印制的纸币留存下来的每一张都极其珍贵，是稀罕的抗战史料见证，也是浙西南人民所进行的抗日斗争史。它的印制和发行，表达了中国人民不屈的民族斗争精神和抗战到底的决心，最终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进程并取得伟大胜利。

浮生手记——

流亡碧湖

骆憬甫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浮生手记——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纪实（1886-1954）》，2004年10月上海古籍出版社。作者骆憬甫，杭州人，1886年出生，1954年去世。抗战之前，做过十七年半小学校长。抗战开始后，带领全家流亡至丽水、云和、龙泉、青田一带。作者对颠沛流离的生活及所见所闻都有详尽细致的记载，对我们近距离了解那段历史和当时的社会，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本文中作者以平实 1939年，作者全家在龙泉的合影，抱小孩者为作者骆憬甫。

生动的语言，记录了碧湖市井的所见所闻，以及在流亡中一家人的悲欢离合。

苍翠的遥山，四面环抱，葱笼的佳木，全村掩护，世外桃源般的碧湖被抗战的洪流激荡得热闹起来。政治训练团、青年训练团，把碧湖全镇的祠堂、庙宇，都打了开来，作为讲堂、宿舍；沿瓠江的荒地，辟为广大的运动场。许多沦陷区的青年、壮年，因为失学失业的关系，都跑向这里来受训，预备受训后赶赴前方干救亡工作。我有许多朋友、学生，也都在团里工作或受训。时儿因杭州市中的解散，失学已久，没处去就学，我们也没钱给他求学。听说碧湖青训团招收陷区青年，不但不要纳费，并且还有津贴，所以我们不往别处而来碧湖，原是想给时儿入团受训的。可是来迟了，政治、青年两训团正在改组，改组完成后，青训团竟不再招生，那么我们来碧湖的目标失掉了。但是既来了，不得不暂时住一下再另行设法。

一、古楚旧家一个月

叶济仁君是碧湖小学校长，他有五兄弟，除他的二哥另住对门外，

云霞路二号住着他的大哥、三哥和他及五弟，所以房屋虽大而房间极少。他因和表弟禾、旧生郑相熟的交情关系，所以勉强让出他的书室来给我们暂住，并且让出他母亲的小灶头给我们烧饭，又帮我们买了两毛钱松柴，有八十多块，够半个月烧，又代我们买米一元，有十八斤老秤，这样，我们的难民生活可以暂时安定一下了。禾给湛介绍进团去当书记，安顿了他。流亡的初步，暂告一段落。

二、放下了四颗悬挂的心

到了碧湖，第一要紧的，是要和已离散的骨肉通信，使她们知道我们的住处，我们也要知道她们的近况。4月17日，龙泉方面爱女们的信从政训团方面转过来了。午饭时节，时儿刚往厨房中添饭，接到了信欣然地拿了进来。我们就停了箸看信，真如空谷来了足音，我们第一颗悬挂的心放下了。4月19日，秦儿圣儿的信也从政训团转过来了，知道她们已安抵长沙，暂寓南正路108号，不日就要往汉口去会大婿，第二颗悬挂的心放下了。4月24日，方岩大母舅的信也来了，他报道我承继的母亲在里山安好的

消息，后来到5月间，上海方面我胞兄的信也来了，于是离散五处的骨肉的消息都通，而其他亲友也均有信到，这好像循环系统的血液已遍体流通身体健康起来一般。我们的心终于得到安慰了。

三、回图旧家一个月

在流亡道上可纪念的4月8日后一周月——5月8日，我们迁居到天主堂隔壁的回图旧家屋中。碧湖的墙门人家，他的墙门上框必有“什么旧家”四个大字的匾额，标以郡名，以示姓别，称为旧家，以示门第。同一叶姓，有南阳郡、古楚郡的分别，所以有的称“南阳旧家”，有的称“古楚旧家”，姓李的称“陇西旧家”。我们的寓居回图旧家，房主是姓陈的。这屋有三间楼屋，前后四厢，一位姓岑的老太太统租来，只有大洋八元一月。向她分租了一间厅房、一间厨房、一间厢楼，中厅公用，只月租四元，非常便宜。

在这段时间内，时儿失学，我失业。妻和外甥女儿汪每日除料理三餐及洗涤衣服外，无所事事。时儿劈劈柴、烧烧镬、写写字；我呢，

访亲友、阅书报、写写信，把无聊的岁月消磨过去，把碧湖镇邻近的地方都去巡礼一下。在这烽火漫天，同家危殆的时候，我们有这样一段悠闲的时间，是我从民国元年问世以来所没有过的。

四、碧湖杂写

两月的碧湖悠闲时间，把碧湖的人情风俗观察殆遍。今杂写如下：

(1) 碧湖的鸡、鸭、鹅、猪猡满街散放。人和猪猡杂行 鸡很少，本鸭亦少，而番鸭独多，也是散放。番鸭好像鸳鸯，白的黑的花的都有，非常好看。雌的鸣声“叽咕…‘叽咕’”，雄的哑而凶猛，见人即啄。鹅，白色的少，大都是栗色的，形躯很大。每条巷中必有拦猪猡的石栏，高过于成人膝头，行走非常不便。每天清晨，有妇女在街头巷尾拾猪粪，然而总还是齷齪不堪。

(2) 大樟树。三四人合抱不交的大樟树随处可见，它的年龄恐怕都在二三百年以上。树荫之大，可以覆盖半亩以上的地。

(3) 小行日、大行日。他们还保有古代赶市的遗风：逢丑日辰日赶市，丑日称大行（音杭）日，辰日称小行日。他处有逢五逢十为行

日的，独碧湖是逢丑逢辰，颇难记忆。而且丑和辰当中只隔两日，辰和丑之间却要隔八日，这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事。在大街的后方，有一大方空地，称为行基，是行日各小贩在此设摊或置担交易之所。货物行情，都有人在规定，并且还有人在收行佣钱。到了行日，四乡的人都担着他的土产品到这里来求售。蔬菜、谷类、农具、家庭用具、动物……应有尽有，譬如阴历五月间分龙日过后，连小猫也有得买。

(4) 畚族。碧湖人称他们为苗发。男的面貌衣着悉和汉同，至于妇女，却显然和汉族不同。妇人头上，梳着很古怪的发髻，衣服都镶着阔边的五颜六色一寸阔的丝织品条子。一双天然足，赤脚而扎裤脚。体格很健壮，一百多斤的柴爿，挑着如飞而行，就是小姑娘儿也有四五十斤或五六十斤能挑。逢着大行日，处处可以看到这些畚民，小行日稍微少些。他们的言语，和碧湖人说，能讲流利的碧湖话，他们自己相谈，则完全是畚话（碧湖人称为苗话），连碧湖人也听不懂，莫说我们。他们处在深山穷谷之中，和汉族只通贸易，不通婚姻。据载，这些畚民是

从海南岛来的，那么他们或许是黎人吧。

(5) 巫。巫，各处都有。但处州府属的巫，似保存着原始的巫风。碧湖人有病、不信医，只信巫。巫亦系在家人，不过他能通神。巫本人并不懂医药，而附在其身的神则能治病。巫来必有二人，一巫画符请神，一巫代神说话。甲巫画符时，乙巫吸旱烟和人闲谈，等甲巫快画完前，乙巫伏桌而卧，甲巫把符在乙巫的头上方和左右下方一张一张地焚着，符焚完了，乙巫欠伸而起，双眼白向上方说鬼话了。开始一句，必是“吾乃XX神也”，仿佛是旧剧中的戏子向台下报名一样，其后的说话，也和旧剧道白无异，半文半白，虽说的碧湖话，但有时连碧湖人也不懂。说话时手执茶杯，连连喝茶，求神者跪着一面和乙巫对话，一面连连斟茶给乙巫喝。甲巫坐在乙巫对面，执笔而待。开药方时，乙巫口报，甲巫笔录，鬼话说完了，又和戏台上说话一般说道：“吾神去也，打道！”然后头和两手向后一伸，甲巫急忙趋前把乙巫的头托住，然后对着乙巫，口中念念有词，念毕，双手在乙巫头顶空

中一拍，说是神去了，乙巫仍伏桌而卧，徐徐欠伸而起，喝茶，吸烟，谈闲天，恢复本人的常态。

(6) 唤狗。“喔！啲啲啲啲！”这种怪声，常常可以听到。我们初到碧湖，听到这种怪声，真是莫名其妙。喊的人无论男女老少，总是立在门口，直着脖子。这是什么事？原来是把小孩的大便在地上唤狗来吃的呼叫声。

(7) 两座不同宗教的寺院。一座是天主堂，就在我们住的回图旧家左侧，这是十九世纪欧美式的屋子，明亮清洁，宽敞高爽，花木森然，环境幽静。住堂的是颀而长穿黑色长袍的加拿大人。我们常常去游玩乘凉，可惜我们不是基督教徒，又不能说外国话，所以虽属邻居，陌如路人。一座是圆通殿，大殿仿西湖丛林式建造，宏畅光明。中座是塑的观音像，美丽庄严，令人起敬。前后左右各院子，植以四季花树。住着两个女尼，俗称小普陀，离碧湖市镇一公里，在田畈之中。我们到了这里，重新唤回当日在西湖遨游灵隐、净慈、虎跑、六通各寺的旧梦，每逢朔望，此间必有佛会，梵呗钟声，悠然可听。我虽不佞佛，

然身逢乱世，流亡奔波，备尝艰苦，无可奈何，有时顿起厌世之念。可是佛法无灵，佛出世的印度，不免亡国之痛，号称七佛地的杭州，被蹂躏于敌骑之下，茫茫宇宙，何方净土？芸芸众生，谁能普渡？那么除了重行入世自救之外，尚有何法？这两座不同型的寺院，一座是西洋式，一座是东方式，它们的建筑，都是碧湖第一，这是我流亡岁月中所不能忘情的地方。

五、两月的离合悲欢

流亡的苦剧，还在一幕幕地展开，当然其中的离合悲欢也随之一幕幕地演出。短短的两月碧湖，孤寂的生活中，忽然又如空谷闻足音。

(1) 芳的别后重逢。5月6日，那天是立夏节。在家乡的立夏节，不是要吃夏饼、青梅、红樱、乌米饭、长脚笋，饭后并且要称人？今年的立夏节，可怜正在流亡道中，而且骨肉分飞，哪里还有闲情逸致来过节！不过徒然：悲戚也无益。于是买了些苋菜、肉、笋、溜。小菜和肉烧好了，我同和、汪、时四人刚刚团坐预备过节，酒未一巡，忽然芳和一位生客进来了。问讯之下，知系姓屈，是和芳同来碧湖受训的。

又据芳说，梅儿也同车来，可是她还没到，想是往别处去转了再来。芳不是于3月17日在场口龙潭庙下花桥江上别去和红、梅、婉、美、石等同去龙泉的吗？今日重见，刚刚五卜天。于是举杯相劝，欢慰异常。美中不足的是候至晚梅儿未到，原来她直接往丽水去了。

(2) 梅儿过境不入，来而又别。

梅儿不来，倒也死心了，最难过的是过境不入。听说她明日会来，于是我同和于5月7日上午往天后宫旁的汽车站去接，可是丽水汽车到了，哪里有梅儿的影儿！下午我独自再往汽车站，哪知汽车未至，大雨倒来了，不得已往就近碉堡中避雨，避至下午三时，梅儿终于不来，我亦回寓。禾弟知道了，颇为之恻然，因此于5月9日那天电丽水代问，哪知回电也没有。5月10日，梅儿回电来了，说将二于明日返龙泉，不来了。接话的是禾弟，劝她必须来一转安慰双亲，5月11日的午刻，梅儿来了。相别五十六天重行相见，我们自有说不出的快乐，可是梅儿呢，“儿女情短，英雄气长”，毫无留恋地说明晨就要回。饭后，时儿陪她往政训团看芳和屈，

后来芳和屈借了采办名义出来回望梅儿。芳并邀请甥女汪和梅同去龙泉帮红儿的忙，照顾石孙儿。我们买了肉，由和亲自烹煮了一罐她的拿手菜——干菜肉，预备晚餐时给梅儿吃，并另备一罐要她明日带去给在龙泉的各姐妹。“恶毒”的刘孟壬。他来邀梅儿去指导一出哑剧，吃了夜饭才回，害得我们空欢喜一场。别了五十六天的爱女，连天伦之乐的晚餐都不让她同享，我们恨极了，恨他破坏了我们的天伦之乐。他是一位热心救国的青年，他虽然过了一个月—6月11日惨然病亡故在碧湖，但是我为了一点钟爱女儿的私心，总有些恨他。夜间梅儿和母亲同睡，只亲热了一夜，明晨又将久别。

(3) 骊歌又唱，别泪重挥。黎明即起，吃了早餐，梅儿又别。这次连追随我们半年以上情同亲生女的外甥女汪也要离我们而去。此后在碧湖的只剩我同和与时儿三个人了，形影相吊，异乡此后的生涯，将更孤寂而凄凉。难怪和与她俩临别之际哭得两眼通红了，那时是5月12日上午七时三十分。我同时送她俩过江上车，眼看汽车如飞般

载得两爱女别去，直至形影不见，我才同时儿惘惘然归寓，此时和犹在倚闾挥涕吧。

(4) 大舅母来了。我的生母，见背三十年了，我哪一日忘得了母亲！可是哪还能见得到！我的承继母亲，在横溪一别，也有五十多天了。云山修阻，千里睽隔，若再相逢，总要在胜利之后。胜利遥遥无期，重相见亦颇不易。我虽是五十三岁了，也老了，然而还需要有母亲啊！禾孝友为怀，他的母亲，还在富阳稠溪，他恐怕他的哥哥独力奉养为难，而且稠溪难免有风鹤之惊，所以他不远千里地去接不了她出来。他人有母，而我独无，一见到慈祥如母亲般的大舅母，怎不令我快乐！

(5) 刘孟壬死了。我恨刘孟壬，但毕竟是私意，他屡次破坏我们的天伦之乐，并不是为了他私人而是为了救亡，所以我一面恨他，一面又敬他。他对于国家，那么地热心奔走，苦干实干；他对于话剧，那么地热心赞助，积极提倡；他对于朋友，那么地披肝沥胆，热忱相助。他的仪表，那么地轩昂英伟；他的说话，那么爽直恳挚。然而天不假年，竟不幸罹病而亡，真有“出

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之痛！他身后萧条，并无长物，一母一妹，后来也不知往何处去。孤棺一具，葬于碧湖，万世千秋，有谁吊奠？人生到此，天道奚论！

(6) 别了碧湖。在抗战之前，连丽水也不大知道，何论碧湖。但在碧湖住了两月，倒也和他发生了情感。可是好像命运注定了我们，不久又将重上流亡之途。一、因为时局危急了，碧湖终非安全之处，不可久居。记得我们初到碧湖的时候，训练团正在庆祝台儿庄胜利，哪知不久之间，胜利已成昙花一现，而失败的消息却陆续报来。徐州、开封、信阳失陷了，丽水汽车站炸光了，碧湖也有敌机光临了。平静的碧湖也骚动了。二、我既然失业，尽管呆在这里，等到逃难费用光了，不是一家人都饿死在碧湖？三、龙泉方面的儿女，也想到我们前途的危险，所以都写快信来叫我们到龙泉去别谋生路。这样我们不得不走了。

阴历五月十五，小普陀又举行佛会了，我们陪了大舅母去进香。大舅母向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虔诚叩问时局，求得大觉楼灵签第

七十八签：“镜合生尘未遇人，光明渐减黑沉沉。幸逢良匠来磨琢，孤月高悬照万民。”

真的，时局现在正是“光明渐减黑沉沉”的时候啦。不知谁是良匠？哪年哪月重见光明？我们一面通知龙泉诸儿女，告以来龙泉的日期，一面收拾准备，候期启行。凑巧得很，芳受训已毕，亦将回龙泉，乃趁此机会，和他同走。临别的前夕，禾在碧湖镇雅园的三层楼上饯别，同席者还有荃、郑及郑的未婚妻王女士，欢宴至夜九时始散。次日即6月26日一早，旧工友楼贵斌来协同挑夫将行李挑往南山站，帮送上车，酬以劳金，固辞不受，义侠可感。表弟禾贤伉俪且渡江来送行，高情厚谊，永矢勿谖。别了别了，我第四故乡——碧湖，何日再来？！

六、离碧赴龙的又一动机补叙

我既失业，时儿失学，钱将用光，留在碧湖，将有饿毙的危险。适有龙泉方面儿女们的信来邀请完聚，此时不走，更待何时！这是离碧赴龙的根本动机。还有一个动机，上面没有提及，因此在这里补叙一下。这一件事，也是我生活史上、流亡

道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在碧湖时，有一天的下午，正在受训的芳来访我，他说：“有一位朋友他要来看您，但是他不认识您，所以要我先来介绍介绍，您如同意，我明天陪他来见您。”我听了这话，觉得很奇怪。我说：“既然不认识我，为什么要来见我？他姓什么？哪里人？要找我有什么事？”芳说：“他姓张，名X，是龙泉县X室主任，他现在政训团当教官，任务完毕，人要回龙。他奉了县长的命来传达县长想请您去任龙泉县教科长的职务的意见，所以他要见见您，征求您的同意。“哦！好的。那么请他来谈谈！”第二天他们来了，那位姓张的朋友态度很诚恳，寒暄既毕，他就传达了X县长的意思。我说：“恐怕我才不胜任吧！…‘您老太谦虚了。您有七八年的教育行政经验，办理这小县的教育哪会吃不消。您如同意，县长一定很欢迎。“那么我就试试看。”我答允了他。“欢迎得很！我马上打电话给县长，一面请您老早一点去龙泉！好在令婿令媛等都在龙泉，他们都接洽的。”他说。

原来县长是个开明县长，刚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时候，他秉承

上级的意旨想仿行解放区的政策，贯彻抗日的任务，所以他接任以后就邀请了许多爱国青年帮办政务。所有县政府的秘书、科长、科员、政工室职员、队员、民众剧场、民众教育馆、小学校，各区指导员，全系热情、勇敢有为的爱国青年。龙泉的政务蒸蒸日上，龙泉的抗日气氛非常浓厚，龙泉的民众都站起来。因此触犯了卖国党派即中国国民党 CC 派，它们在阴谋摧毁龙泉的新生命。南封建地主结集的龙泉县党部首先发动，再结合地方的封建势力，向浙省 CC 派头子许绍棣（省党部委员兼教育厅长）接洽摧残阴谋，先向教育科开刀，说教育科长邵荃麟是红色的，许绍棣命令 X 县长必须撤换教育科长，换成旧派人物，想从此一步步地进攻，把龙泉的新派人物全部打倒。这样一来，弄得 X 县长窘极了。他要搞好新政治，打好抗日后方基础，非新派人

物不行，况且他所延揽的，个个是人才，他怎肯无理地摧残呢。但上级的压力又那么重，如果不理它，以后关于教育方面的呈报、呈请等公事必定件件碰钉子；如果依了，那么教育方面的一线新萌芽必定被摧毁。邵教育科长愿意离开，免得使 X 县长为难，于是共同想得一个办法，拟物色一个新旧咸宜，双方都能接近的人保荐上去。协商结果，有人介绍了我，认为我在省县和省会办过了七八年小学教育、七八年教育行政，对教育颇有成绩和经验，旧学略有根底，与旧派士绅也可以接近；年龄虽老，而头脑颇新，子女们都走上新的道路，与新派亦能气味相投，X 县长认为是最理想的人物，因此就请张 X X 来征求我同意。我同意了，他自然是很高兴的。这就是我离碧赴龙的副动机。

孙多慈在丽水的尘影往事

叶剑平

上个世纪的40年代，丽水这座美丽的山城成为浙江抗战的大后方，曾经容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才彦俊杰和名门闺秀。邵荃麟、汪海粟、王季思、吕漠野、郁达夫、王映霞……，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使这座山城的人文



孙多慈抗战时期在丽水

历史更加厚重。而著名画家、一代名媛孙多慈与许绍棣在丽水的一段往事，却一直鲜为人知。

孙多慈，又名韵君，1913年出生于皖东寿县的书香名门。她的父亲孙传瑗，曾任大学教授、教务长，国民党安徽省常委，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私人秘书。孙多慈从小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她从中央

大学美术系毕业以后，因和徐悲鸿的师生恋闹得沸沸扬扬，于1937年底和她的父亲随省教育厅来到丽水。此时，她的父亲因遭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通缉而判刑入狱，刑满之后，承蒙省教育厅长许绍棣的关照，在省教育厅当书记员。孙多慈到丽水之后，在丽水县碧湖镇的浙江省立联合高中担任美术教师。在联高

的日子里，孙多慈教学之余，背个画夹，穿梭于碧湖的乡村田野，拼命作画，以此排解心中的郁闷和对徐悲鸿的思念之情。南京是个既令她牵肠挂肚又使她十分痛心的地方。为了徐悲鸿的名誉，为了化解各种无形的压力，她来到浙西南美丽的山城一隅，独自吞咽各种苦涩，以画解忧，以画消愁。

说到孙多慈在丽水的故事，还要提及郁达夫的美貌妻子王映霞。1937年，杭州沦陷后，王映霞带着几个孩子逃难来到丽水。由于教育厅长许绍棣的关照，她租下了县城燧昌火柴公司的两间房子，和许绍棣比邻而居。许绍棣对王映霞关爱有加，时常登门看望，送些水果等礼物。这给王映霞带来了麻烦，引来了人们的风言风语。

但王映霞认为身正不怕影子斜，未加理睬，我行我素，她对许绍棣印象尚好。许绍棣，浙江临海人，生于1900年。自幼父母双亡，靠伯母抚养成人。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到富绅方家当家庭教师，方家大人看

重他，遂把女儿方志培嫁给他。

1936年，方志培患病去世，留下3个女儿，许绍棣辗转千里，来到丽水。许绍棣在任浙江省党部宣传部长时，曾因行文通缉鲁迅而遭世人诟病，对他的负面评价似乎已成定论。而王映霞更多地看到的是许绍棣的儒雅谦和和乐于助人。

1938年元旦，王映霞与浙江省政府秘书李立民的女儿李家应相遇。李家应也毕业于中央大学美术系，异乡相遇，自然话多。李家应告诉王映霞，她有个同学叫孙多慈，父亲在省教育厅当书记员，为陪伴父亲，在丽水碧湖的联高当美术教师，已经25岁了，托王映霞为孙多慈找个对象。李家应还告诉王映霞，曾闹得沸沸扬扬的孙多慈与徐悲鸿



孙多慈在碧湖联高的画作

的恋情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徐悲鸿是有妇之夫。经李家应这么一提醒，王映霞这才想起在丽水时曾多次见过的这位风姿优雅、气质不俗的“相门闺秀”，遂不顾郁达夫的反，为许绍棣做起媒来。

孙多慈也对父亲的这位上司有些许的好感，也想在乱世飘零中找到一个依靠。更令孙多慈感动的是许绍棣对她父亲的处处关照。每当日机空袭丽水城，许绍棣总是安排孙传瑗夫妇住到建有防空洞的丽水中学宿舍。当孙传瑗提出辞呈，要到长沙去，许绍棣立即批准，除命令财政处支付3个月薪水外，又特批大洋80元，作为补助金。这一切都令孙多慈深为感动。考虑到自己已经25岁了，也算是待嫁闺中的老姑娘，不能不去面对这个现实的问题。于是，孙多慈答应和许绍棣先通信，增进了解。

恋爱的生活是缠绵的。在王映霞的引见下，孙多慈和许绍棣在碧湖见面了。从孙多慈晚年的回忆录中可以知道，在碧湖联高的4年，是她一生中难以忘怀的日子。她和许绍棣风尘仆仆地奔波于景宁、庆元、云和，致力于抗战模范教育县

的建设。工作之余，两人留连于浙西南名山大川。许绍棣忙着题字，孙多慈带着画夹潜心画画，两人相依相偎，湖光山色，诗情画意。这对离难的男女沉浸在幸福的意境之中，暂时忘却了乱世的烦恼、离乡的忧愁。

孙多慈是个多情的人。即使在热恋之中，她也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内心秘密告诉远在长沙的徐悲鸿。1938年4月，孙多慈向学校请假，只身往长沙会见徐悲鸿。在岳麓书院外的古山亭上，孙多慈说出了王映霞为她与许绍棣做媒一事。徐悲鸿提醒孙多慈说：“许绍棣这个人我在上海见过，人并不很讨嫌，有些文人风度，在北伐战争中还立过功。不过，他因曾行文通缉鲁迅而为世人所诟病。你没读过鲁迅、曹聚仁、郭沫若等人批判他的杂文与时评吗？”此时的孙多慈的内心已多少被许绍棣所占领，她要竭力为许绍棣辩解。孙多慈苦笑地摇摇头说：“我在丽水倒是发现许绍棣热心于抗战事业，为办战时流亡中小学而不遗余力地奔走，从不讲究个人物质享受，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就多次公开表彰他。他对客居丽水的

进步文化人士也给了不少关照，可见人是复杂的，不可因一事而论之，以偏概全。”

凭心而论，孙多慈对许绍棣的感情是复杂的，这从她晚年回忆录中可略见一斑。“急雨狂风避不禁，孤舟一叶独沉沉”，这是她心境的真实写照。一方面，许绍棣有恩于她的全家，对她也疼爱有加，在这离乱之世，找一个疼人爱人的依靠也不容易；另一方面，徐悲鸿给她心灵的撞击实在太深刻了，她永远忘不了她和徐悲鸿那种超脱世俗观念的纯清而热烈的恋情，而许绍棣此时已有3个女儿的现实也让她感到难以接受。正由于这些原因，许绍棣苦苦追求了4年之后，孙多慈才和他成婚。

在孙多慈晚年的回忆录中还有这样一件事情：1942年，日寇为了避免本土被炸，发动浙赣战役。日本频频出动飞机轰炸衢州、丽水飞机场，丽水城内和碧湖经常遭受日机轰炸。而当时的省教育厅置几百师生于不顾，不肯拨款作学校撤退

之用。有一夜，学生们得知许绍棣回碧湖寓所过夜，在当今享誉海内外的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的带领下，发动全校学生与许绍棣谈判。谈判桌上，孙多慈对许绍棣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得许绍棣答应拨款。加上联高师生到大港头义演得来的报酬，总算凑足了联高撤退的费用。1942年8月，联高迁到温州文成，孙多慈也结束了在丽水碧湖4年的联高生活。1945年抗战胜利，受国民党丽水县党部的委托，孙多慈设计的丽水抗战胜利纪念馆矗立在府前行基广场，文革期间被整体拆除。

孙多慈于1949年随丈夫许绍棣去台湾，成了知名的画家，生有两子。徐悲鸿于1953年9月辞世于中央美院院长任上时，远在海外的孙多慈痛不欲生，为他守孝两年。晚年，她常居美国，与同床异梦的许绍棣更加心灵疏离。而许绍棣也无奈地默认妻子心灵的背叛，仍真心地爱着她。1975年孙多慈去世。1980年许绍棣去世，与孙多慈的骨灰合葬于台湾阳明山。

莲都乡村建房风俗

王永健

俗称“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身为上世纪70年代的知青，笔者初到农村，曾有幸目睹了生产队里一位农友整个建新房过程。

倘若要新建房屋，先得选择房基。一旦房基落实，必定请风水先生选定宅基，定出朝向。一般房屋以坐北朝南为佳，并根据地形、地势，对门户的启闭和沟渠的排水等，都有一定的禁忌，这叫趋吉避凶荫及子孙。而破土动工这一环节，也颇慎重。要请风水先生择吉日，祭祀安神。安神时，主人家要事先准备一根方形木桩，由风水先生在木桩正面书丹蛛符籙，木桩顶端包裹红纸。在破土前将木桩插入宅基中堂后方的正中部位，并在宅基点香烛，设祭以安神，并杀活雄鸡一只在宅基四周淋鸡血后，泥工方能破

土。

破土动工后，房主首先就要选购用于屋架的栋梁杉木，一般要到山林或深山去选。择定做梁的树木后，栋梁树不能横躺在地面。待栋梁树运回家，房主要用红纸将树木下部围贴，并忌人跨越、忌讲恶话。做栋梁要请手艺最佳的木匠师傅做，并要给“红包”。

经过木匠师傅数月的精心劳作，整座房屋的栋柱、抬梁、桁条基本就绪，木匠就在屋基拼接屋架。上梁前，要挑选两名父母双全、兄妹众多的十余岁男孩帮助上梁。吉辰一到。屋上屋下木匠将事前用绳子系着已拼接的柱梁徐徐吊上屋顶，两个作头木匠护送两个男孩爬上木梯，口中还要念吉辞如“脚踏云梯步步高，后步总比前步高”等语，

每念一句，站在地面上的木匠和帮忙人员都要齐声接上一句“好哇”。当男孩和作头木匠爬上屋顶端时，木匠把栋梁榫头对准并垫以竹箬，由男孩用状元捶在榫头处轻击三下，作头木匠就用大斧猛击栋梁，把榫头击实。上梁后，在栋梁正中钉上七星椽，然后盖瓦。梁上的器物要挂满七天。上梁的过程中，鞭炮鸣放不断，呈现一派喜气洋洋、吉祥如意、人财两旺的景象。上梁后，有些作头木匠还要在梁上贯馒头和撒五谷。作头木匠也要念吉辞，如“发子旺孙延千载，五谷丰登万万年”等，边念边撒五谷、馒头。地面的木匠、帮忙人员同样以“好哇”之语应和。此时鸣放鞭炮，群孩争抢落在地面上的馒头，欢欣喜乐气氛充满新宅。

贯馒头后，看重礼节的主家会在新宅设一方桌，上供三牲、酒菜、并点燃香烛，向鲁班先师致谢，表示新宅落成。宴席后，主家要送“上梁红包”。甚至加送作头老师一扇糖糕，表示酬谢。

时代在变迁，如今建房的材料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涌现出新型建筑材料。昔日的黄土垒墙和杉木盖房如今基本已被钢筋混凝土所替代。但在乡村，上梁请风水先生择良辰吉日和在栋梁两端各挂一个三角形的红色布袋（俗称“五谷袋”，袋中装有谷、米、豆、麦和十三个铜钱或硬币，寓有五谷丰登之意）及在屋檐挑梁下各悬挂一盏灯笼，并点亮七天七夜的习俗至今仍被沿用。